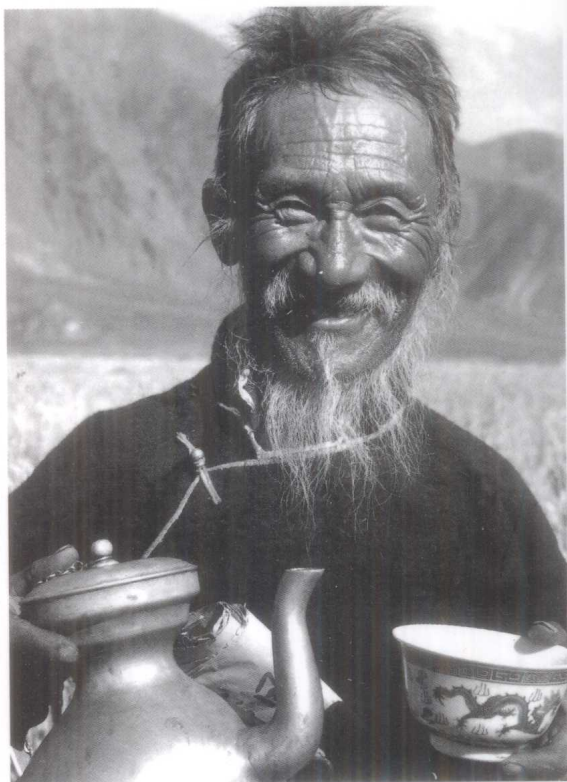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百万农奴
站起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孟黎莎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平叛并废除农奴制，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土地与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建立了人民政权。

1959年叛乱刚刚平息，经国务院特批，在外交部、人民日报领导的率领下，一个以外国记者为主要成员的团体访问了西藏，美国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成为团员之一，当时，她已是七十四岁高龄。

《百万农奴站起来》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那次采访后所撰写的一本书。作者从其进藏前后，接触中国军政要员，到实地走访新旧西藏的各阶层人物，入乡村，进寺院，收集到大量的实例。透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我们再次了解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渊源以及当今中央政府对待西藏的特殊政策，感受1959年那个变革中的真实西藏。作者以铁的事实驳斥了西方“西藏独立、永不改革”的谬论。此书前言作者艾思瑞尔·爱泼斯坦说：“读斯特朗的书，人们可以了解到西藏人民是怎样，又是为什么最终选择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

ISBN 978-7-80253-177-2



9 787802 531772 >

定价：25.6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万农奴站起来/[美]斯特朗著;孟黎莎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53-177-2

I. 百... II. ①斯...②孟... III. 社会主义革命-史料-西藏-1959
IV. K29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1156号

百万农奴站起来

[美]斯特朗著 孟黎莎译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965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千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177-2/K·219

定 价:25.60元

序言

亲切的斯特朗，熟悉的西藏

卢小飞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我们深为景仰的新闻前辈。

最早听说这个名字还在少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让我们记住了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谈话的那个女记者。而她，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在当时整个文明世界对于中国内战的缘由尚未认识，甚至还存在人为歪曲的政治态势下，向世界传播了来自延安而非西安的声音。在后来国际反华舆论对中国实施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她坚持尊重客观事实，甚至敢于逆势而上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体现出一个优秀记者坚持真理的高贵品格和无畏气概，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斯特朗先后六次来中国旅行采访，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使她最终选择中国作为人生的终点。这本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书是她七十三岁时的作品，反映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的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变迁，记录了西藏如何从一个反动黑暗的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其史料素材全部是作者亲自采访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并以此正面回答了那个时代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西藏话题，这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为一名政治记者的强项。这些，使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始终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由于工作的忙碌和家务的缠身，及至打开厚厚一摞书稿往往就到深夜了，加上间或出

差外地，不方便带上书稿，出差回来不免要翻回前面的章节重新温习，每一次都带着急不可耐的心情，那里面的地名、人名几乎都认得，熟悉而又亲切的酥油泥土气息每每扑面而来。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记者笔下是那么富有活力。对于我们这些将青春抛洒在西藏，且又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心生景仰？一切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难怪爱泼斯坦称它“是认识 and 了解西藏的最佳读本”。

本书的架构以推翻西藏封建农奴制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为轴心，以探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与执行”“平息西藏叛乱与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这样一些热点问题为切入点，以西方记者的眼光扫描当代西藏的变革。书中自然要涉及众多历史人物，既有当代西藏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诸如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有贵族妇女、工作队干部、基层农牧民和寺庙僧人等等，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都镌刻在当代西藏历史画卷上，成为钢铁筑就的历史见证。这些采访对象的选择与发问，为我们勾勒出斯特朗观察西藏社会的轨迹，让我们体味到一个优秀政治记者如何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如何善于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如何在语言不通且采访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拿到自己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得出完全属于自己从而属于客观世界的结论。斯特朗从丰富的采访经验中锤炼出一种敏捷的思维和锐利的眼光，并以准确而细腻地描述人物和事物见长，甚至细碎到自己如何克服高山缺氧、如何被人抬着登上布达拉宫，这使得她笔下的西藏社会保留了原汁原味。难怪爱泼斯坦叹服她以撰写历史见长，而深入地调查研究，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与那些对中国革命带有偏见，进而抹黑新中国的西方媒体形成鲜明对照。

与通常的走马观花式的采访笔录完全不同，斯特朗深入许

多农奴家中，走访了过去的差巴、堆穷和朗生，了解农奴制度的组织结构，进而对阶级关系状况进行了剖析。对农奴制庄园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后，她又去采访西藏的寺院，深入了解寺院内部的组织结构，僧侣之间的阶级关系，僧侣集团的财产占有，寺院上层对领地内农奴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等等。对于整个西藏农奴制社会寻根问底式的采访，以及对农奴中不同社会阶层状况层层剥笋似的探究，完全没有生涩环境下经常出现的那种囫圇吞枣。她对朗生、差巴、堆穷都有详细的分析，是真正的有“分”有“析”，并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了比较，指出了奴隶制、农奴制、自由民的异同，于是得以对西藏社会作出深刻与透彻的观察，这正反映了斯特朗采访作风的深入扎实和做事的一丝不苟。不要说一个外国记者，就是我们许多前往西藏采访的中国记者，又有多少能够清晰地说出“堆穷”“差巴”和“朗生”这些统称为农奴的下层百姓究竟有些什么不同。而她，一个凭借着两道翻译挖掘素材的美国记者不厌其烦地做到了。

当成百上千家西方报纸轰炸似的渲染着西藏“问题的严重性”时，她以记者亲历的笔法生动描述了百万农奴在获得翻身解放后的精神面貌。对于人物的描写恰恰反映了作者的立场和观察视角。她娓娓讲述了差巴德吉的遭遇，以及德吉和丈夫彭措次仁的苦难家史，尤其是彭措次仁被庄园管家指控偷了领主女儿漂亮的马鞍而被先后关进庄园的地牢和布达拉宫脚下的蝎子洞，惨遭皮肉之苦的故事；讲述了噶厦出尔反尔撕毁《十七条协议》的前后以及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仁增因为拒绝参加叛乱活动，而被野蛮鞭打的故事和大昭寺贫苦僧侣的集体控诉；讲述了拉萨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把山南地区当作长期游击战的总指挥中心和基地，但是却忘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广大农奴长期饱受压迫剥削和野蛮蹂躏，这决定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与西藏人民的选择是背道而驰的。她描述了平叛改革后翻身农奴的由衷喜悦，诸如小伙子向

姑娘抛送秋波，主人虔诚地敬献哈达，老人好奇地摸摸作者的下巴，秋后人们在望果节上的载歌载舞，这些细节刻画出西藏老百姓的可爱与率真，只有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记者，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对新生活的赞美，

有意思的是，书中介绍的许多人物也是我采访过甚至十分熟悉的人，由此产生的亲切感拉近了与这位大记者的距离，只不过我采访的时间延后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而这恰恰印证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比如，书中多次提到的娜珍，作者笔下正处于热恋期的美丽姑娘，一个来自四川巴塘藏区的女工作队员，当时正在大昭寺蹲点开展民主改革工作，尚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到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的妇联主席，我那时正是一名年轻的跑口记者，多次参加妇联的活动，年富力强而又正直善良的娜珍不仅给了我许多帮助与关照，还给了我许多人生的启迪。再比如，书中多处谈到的朗敦夫人，恰是我好友白姆的妈妈，她们母女给予西藏民主改革的贡献有口皆碑，这也印证了民主改革对于爱国上层人士产生的积极影响。书中引述了阿沛夫人对妇女状况的态度，居然与笔者今年在她家里访谈时的观点一致。阿沛·才旦卓嘎是全国妇联第四届至第七届副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她始终支持和理解丈夫的选择，为西藏妇女儿童事业尽心竭力。她认为民主改革后，西藏妇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藏妇女的解放与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试金石。

陪同斯特朗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马宁轩曾经是我的同事，在我还是西藏日报社一名年轻记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西藏日报社藏文部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马宁轩回忆陪同斯特朗采访的经历时十分感慨，“她已七十三岁，头发全白，拄着拐杖，略显疲惫，但精神矍铄，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目光中深藏着追求新闻的执著。”“老太太拄着拐杖，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但她没有间断过一天的采访。就是在办公后的休息时间里，也随时蹒跚地走到院里，仰望巍峨的布达拉

宫，用眼采访，看平叛的炮火是否毁了建筑物。她看到达赖喇嘛的寝宫、佛事殿等布达拉宫所有建筑物完好无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对斯特朗的职业素养赞叹不已。在短短一个来月的采访时间里，斯特朗对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庄园、领地、农奴、农奴主代理人、贵族、寺院、地方政府以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颇深的了解。光是为了搞清楚乌拉差役、苛捐杂税、高利贷和还不完的子孙债等剥削情况，她就在蔡公堂的农奴协会与农户们整整算了一天的账，有时一个数字反复核对四五次，直到没有问题为止。

今天，此书得以再版，要称道译者和编者以及出版者的眼光。全书字数不多但在史料价值方面毫不逊色，对于今人认识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书中关于寺院僧侣集团阶级矛盾的描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管理寺院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书中关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具象描述，令后人在观察西藏问题时具有了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眼界；书中各类人物的细节描写印证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些民主改革老照片的真实性。给予我们许多遐想的，是她在书中透露的西藏建设天堂的计划和提出了宗教改革的目标，并大胆设想西藏境内的两千多所寺庙全部停点酥油灯，而改用电灯替代，让西藏人民享受充足的酥油茶。这些袅袅的余音都留待读者继续品味。当然，它也提醒我们这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尤其是很多因为带“长”而不愿到一线采访的新闻人，千万不要忘了，七十三岁的老记者斯特朗具有的职业精神。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有人仍在继续着以有色镜片透视西藏的行径。斯特朗的老朋友、著名左翼作家爱泼斯坦早在当年此书英文版的序言里，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某些反华分子散布的“藏人被毁灭”的谎言；同时，他也批评了自由主义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暧昧，诸如“北京好歹还是给西藏带去了些好处”的言论。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时隔五十年，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已然不再是当年那样一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而敌对势力的本质却并没有在强大的事实面前有丝毫的改变，甚至与当年的叫嚣如出一辙。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五十年前的那些老话，无视五十年里西藏所发生的进步。这样一种结果恰恰又回到了斯特朗当年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的话题。历史的讽刺是如此绝妙。

二〇〇九年十月

一九六五年英文版序言

艾斯瑞尔·爱泼斯坦

人们可以从不少读物中了解“世界屋脊”上那场惊人的变革，但最佳读本仍要数《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这本目睹记写于一九五九年，正值西藏变革的关键时刻，当时农奴主的叛乱被平息，民主改革刚开始。该书于一九六五年又可喜地再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经历了漫长的筹备过程，终于成立了，该书的再版正是这一时刻的自然产物。随着生产权力回到农奴、奴隶手中，随着各级选举的结束，农奴、奴隶自己政权的建立，西藏人民开始从胜利的民主改革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以撰写历史的笔触来报导一种长期存在的本质是少见的，可这正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报导习惯。年满八十的她从过去丰富的经验中锤炼出一种从眼下事物的发展中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未来的本领。这是她自己的“秘密”所在，也是她充满活力著作的“秘密”所在。这“秘密”几乎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指引她了，那时她偶遇革命——列宁主义的革命——那是人民的黎明，是让人民充满信心，不断让他们快活的曙光。这种“秘密”加上她擅长表达的天赋以及接近事实的决心，使她成为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年史编纂者。这是因为她把接近真实和实际的发展真实地统一起来了。

我刚从西藏回来，在那儿住了一个月，这已是我第二次访藏了，我只想对该书已提供的丰富背景加些注释。

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自然的描写是正确的；对变革的重要性及不可抗拒性的报导也是正确的。西方和其他反动派依然在散布“藏人毁灭”的谎言。自由主义者已开始忠告：“北京好歹还是给西藏带去了些好处。”而安娜六年前就把握住了这场争论的大趋势，并理出了这场争论的头绪。她的书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许多民族，在获得解放后，是怎样满怀激情来帮助西藏的农奴、奴隶获得自身的解放的。

二、随后的几年里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些突出的成绩我综述如下：

人口的增长，现在西藏有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人，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还多；文化的提高，能用自己的语言识字的人至少增加了二十倍；政府的组阁，领导者已不再是一小撮僧人、农奴主和领主，经过民主选举的劳动者掌管着全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各种事务。七十一名县长中有十一名是女县长。过去的几年中培训出一万六千名藏族人才，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前的农奴和奴隶。这些人才现正从事着各项事业，有搞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有从事教育、卫生工作的；还有搞国防工作的。

生产上，现在的粮食产量比六年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牛羊头数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许多新的粮食品种、耕作工具以及新的播种方法使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畜牧业培育出优良畜种，建立了兽医站，并且采用了管理草场的新方法。工业开始发展，有六十七个地方材料加工厂，有满足基建要求的水泥厂和发电厂。西藏的工人阶级前不久还根本不存在呢，可现已有了两万五千人，其中许多年轻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们告别了压抑人性、贫困不堪的僧人生涯。

在农田灌溉方面，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湍急的水流建立发电站，解决能源问

题。开发水利刺激农牧民开始思考从目前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组向社会主义集体化（这种集体化目前叫合作社，但不久就叫公社了，公社是一种适宜于当地情况的形式，这种形式依然在讨论之中）过渡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西藏计划到一九七〇年，要在每个县、乡或公社建立发电站，这些地方都有有利的条件。目前那种小型的发电站已超负荷。我亲眼见到一个小发电站要提供三个村庄八十户人家的能源，要供给农舍、学校、俱乐部和会堂四百盏灯泡的用电。

拉萨正在变成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不久前，布达拉宫、寺庙和一些巨宅还矗立在一片破旧简陋的小屋之中，到处都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臭水沟。可现在拉萨已有了长长的柏油街道，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城里还铺设了地下排水管道，一九五九年时，整座城连一条这样的街道和排水管道都没有。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家庭照明用电可以得到满足，甚至连烧饭也时常可以用上电。前农奴、奴隶都免费用电。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可容纳一千两百人的大厅，此厅用于会议、演出和放映电影。城里还另有两家电影院。拉萨今年盖起了一个国营贸易中心，是新修的各种商店里最大的一座，在那儿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品小到针线纽扣，大到缝纫机、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这些商品都十分畅销，而买主正是前不久被当作商品买卖的人们。

拉萨到内地有些地区的航线已开通，有了机票销售站。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人们可以乘上西安和上海特造的大客车，这种车有氧气和暖气设备，是专为在高原行驶设计制造的。全区已有一万英里的汽车公路，七十一个县中六十五个县都通了公路。长途客车不仅跑通区内各地的公路，而且跑通内地的主干道，可以把旅客送至有铁路的地方，此外还跑通尼泊尔的国际公路，把旅客送到边境。

西藏革命展览馆是有名的第四建筑工程队在一九六五年修建的，就坐落在布达拉宫的前面。与那座著名的大宫殿相比，

展览馆反倒吸引了更多的“朝圣者”。在五万平方英尺的展厅里，布满了生动真实的展品，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西藏过去落后和今日进步的原因。这里的一部分展品是达赖喇嘛的宝藏，许多都是第一次从布达拉宫的密室里拿出来的，其中的珠宝、纯金器皿、法衣和裘皮简直不亚于克里姆林宫中沙皇的那些珠光宝气。不同的是，沙皇有千百万可剥削的人民，而达赖喇嘛只有百万畏惧他的人民。还有许多其他财宝被他带到了印度。

这座展览馆还介绍了农奴主叛乱以及他们接受外国支持的详细情况；介绍了土地牲畜重新分回到人民手里的详细情况；介绍了西藏人民得到中国其他地区大力援助的详细情况，其中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这是一支既战斗又工作的军队；还详细介绍了当地人民在生产、技术和学习上的进步情况。

一开始进步就如此之大，这是无法用尺度衡量的。在旧西藏，铁匠是最低贱的阶层，是些“无人愿碰”的最贫穷的人。曾经是铁匠和奴隶的达娃如今已成为拉萨新工程的一位极端负责任的保管员。他对我说：“我们不仅为建设而建设，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建设；我们也不是为工资才建设，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从未有过报酬；我们建设只是因为我们建设的是我们工人自己将享用的地方。”

事实上，以现在这种速度发展，整个西藏本身就在转世，是达赖喇嘛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转世，他又怎么可能想到呢！自从他走掉，虽然只有六个年头，西藏却发生了政治性的核分裂，产生了一场巨大的核聚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现已有了许多藏族党员）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引爆这个旧西藏，重建一个新西藏。这种爆破的反冲力震动了旧的农奴制社会，这个社会的毁灭是前不久的事情，十几岁的孩子都还记忆犹新，这个社会连同它封建的政教合一制已属于过去一千年里的事了。

虽然年轻人比较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但寺庙开放、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受到尊敬。然而，上层僧人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如同贵族一样已不复存在了。

自从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以来，没有参加过叛乱的前统治阶级在西藏仍有一席之地，经济上，政府赎买了他们的封建财产，这使他们仍能保持与以改革前相同的生活水平。例如，班禅及其随员，政府以巨款买下了他们以前的房地产（班禅的扎什伦布寺就收到五百万元的赎买金）。但是所有这些人的基本需求是通过他们协力发展西藏而得到。如今西藏已掌握在以往被剥削者的手中，他们占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书中记载道，六年前她了解到班禅与改革的情况，当时班禅曾在他的教区作过许诺，说改革将留给他来搞。

革命的核分裂也是一种融合。农奴制一直是帝国主义者密谋恢复的制度，这一多少世纪来削弱西藏实质的吃人的制度现已被毁灭。如今的西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表现人民的美德、热情，更能发挥他们的潜力。同时，西藏也更加不可分割地加入了多民族中国的共同革命的考验时期。

毛泽东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与此相一致，中央政府代表在新生的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制度……它一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决不是农奴主或其他任何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在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团结一心，正在行使着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踏上了中国全民族所走的社会主义进步大道。

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书，你可以了解到西藏人民是怎样，又是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目 录

- 序言 亲切的斯特朗,熟悉的西藏 卢小飞 /1
一九六五年英文版序言 艾斯瑞尔·爱泼斯坦 /1
- 第一章 飞往西藏 /1
第二章 “豪华型”拉萨飞行 /12
第三章 第一次情况介绍会 /22
第四章 三月叛乱 /38
第五章 在拉萨参观 /57
第六章 大昭寺里的娜珍 /77
第七章 拉萨东边的村庄 /97
第八章 我上布达拉宫 /115
第九章 一座大寺院的改革 /132
第十章 哲蚌寺的僧人 /145
第十一章 农奴自己的第一次丰收 /161
第十二章 建设“天堂” /181
编后 /198
- 附录 陪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记 马宁轩 /200

第一章

飞往西藏

“我们向你们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这趟旅行。陈毅^①同志一九五六年去了一趟拉萨，后来病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人甚至丧命于此行，此非耸人听闻。你们都必须通过体检，还将有一名医生随行，为的是作好预防，即便如此，也不可掉以轻心。有想退出的，请于明天中午前打电话给我们，想去的，请将费用汇来。”

我们在北京汇合，我们是十九名申请访藏的记者、作家、广播电视工作者。不算作为东道主前往的北京人民日报社的代表，我们十九人分别来自十一个国家。只有我是三天前才被批准的，我匆忙跑到北京医院做体检。那座漂亮的中心医院是由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很久以前修建的，看上去非常古老，却成为当今北京设施完善的医疗中心。

我的血压测量结果，高压一百三十，低压六十五，恰好在限度之内，可我七十三岁的高龄却是我的软肋。我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容易适应高海拔。拉萨海拔三千六百七十米（一万两千两百英尺），草原海拔升至四千五百米以上（一万五千英尺），

^① 外交部部长，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赴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飞行的海拔至少高达六千三百米（两万一千英尺）。我的心电图的结果极佳，医生在合格书上写道：“在特殊护理下可以进藏，切忌过度疲劳。”我要是有个好歹，他是不愿意被指责的。

我的东道主们把这份合格书看得很重。第一个特殊安排就是我的翻译曹凤凤将随行。她有时也为全团做做翻译——团队旅行，人人都想得到帮助——当然她的主要照顾对象是我，为减轻我的负担，帮我拿拿照相机，提提我的赫姆斯（Hermes）小号打字机，拎拎我的飞行睡袋，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像鹰一样盯住我，不是说“您现在最好去睡觉”，就是说“我会叫服务员把晚饭送到您的房间来……”

我们先去北戴河疗养，据说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起程去拉萨了，真希望起程的时间能够再往后延延。我需要一整个月的修养，因为我刚没日没夜地赶完《采访西藏人》一书，必须赶在北京八月酷暑之前，否则我就无法完成它了。此书刚送去印刷，我和凤凤就拿到了火车票和北戴河疗养院的订房单。说实话，他们来电话说我的进藏申请批准了，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

我声明，“不休一趟假，我是不会去的”，他们说，“你看着办吧”。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海边，不假思索地对凤凤说：“这种团体旅行往往会推迟，没准我们会有两周的休息时间呢！”

海边，凉爽空气中的第一个夜晚是奇妙的，温和海水中的第一个晨泳是富有魔力的。两个星期的这种日子，哪怕就一个星期呢，都是一次真正的休息。然而，就那么一次美好的晨泳后，北京来了电话，通知我们星期六起程赴西藏。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起床了，乘五点的火车，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去参加了第一次情况介绍会，会上我们再次被告诫要“严肃对待这次旅行”。我在北戴河只休息了二十四小时，只游了一次泳，难道就这样去面对西藏了，想来真不甘心！

见到访问团成员，更加重了我的不安，他们都是男性，大

多都很年轻，后来得知团里还有一名女性，叫爱娃·西奥（Eva Siao），是民主德国电视台的摄像。他们个个精力旺盛、积极能干，可以参加一整天的活动，上午、中午、晚上连续活动，我怎么可能跟得上他们。况且一旦发现我是全团的累赘，那将是不可原谅的！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记者，而且是外国记者前往了解新的“民主西藏”的开始。新的西藏地方政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颁布决议，合法废除农奴制，这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律的实施有待组织，这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一切。

就在五个月前，拉萨爆发了叛乱，领导这场叛乱的是四大噶伦（Kaloons），他们是噶厦（Kashag）的大臣，共有六大噶伦。大寺院大都参与领导了这场叛乱。他们宣布西藏从中国脱离出去，并且用武力，包括大炮，攻击中央政府所在的办事处。这场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一些叛乱首领被逮捕，还有一些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叛乱事件总算打开了通往改革的道路。三月二十八日，占噶伦多数的叛乱首领准备逃往印度，中国国务院颁布特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即解散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地方政府，该筹委会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它比西藏历届地方政府都更具代表性，拥有更广泛的代表，因为它统一了先前一直交战的许多地方。

达赖喇嘛是该筹委会主席，即使他不在期间也保留其主席的职位。班禅额尔德尼为筹委会第一副主席，在等待达赖回归期间，被委任为代主席。筹委会开除了参加叛乱的成员，替换上新的成员。这样不用重新组阁政府，不改变全藏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接受的政府形式，然而，政策则改变了。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当时拉萨的叛乱已平息，但山南（Loka 或 Takun）地区的叛乱还在继续。这次会议只宣布了会议的召开和承担政府责任。筹委会领导成员接着起程赴北京出席代表整个中国政府的全国人大会议。成员中有

几人还是本次人大会议的代表。返回西藏后，筹委会于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这次会议邀请了大批“观察员”，他们是来自各阶层的人士，在这里，农奴和贵族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是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就在两次筹委会会议期间，山南和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也平息了。农民大会在西藏各地召开，表示支持新政府，发去了决议书，要求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

这场民主改革分成两个阶段。首先，立即废除乌拉（ula），一种被迫无偿的个人徭役制；其次，成立以农民为主的地方政府，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再次，分田给耕作者，这花的时间会更长，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身自由的法律。人们必须获得人身自由，团体必须建立自己的法律。

班禅亲自宣布，最令人感动的变化之一将发生在寺院里。寺院法庭、监狱、酷刑制，还有不仅强加于僧人而且强加于俗人的鞭笞制，都将被废除，并将其归属世俗县法院，同时给予僧人做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说僧人有权离开寺院，他们甚至可以结婚。许多僧人儿时就进了寺院，从未享有过自由。毫无疑问，多数下层僧人都将离开寺院，正像筹委会二次会议上人们说的那样，他们是寺院里“穿着袈裟的奴隶”。

班禅·额尔德尼，这位寺院的最高首领，之所以这样宣布，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二十一岁的青年，他已认识到西藏长期衰败的部分原因是多数男性出家当僧人，这抑制了生产和有责任的再生产，还有一个原因是梅毒。梅毒如同瘟疫在寺院中泛滥。他是不是权衡了这样的事实，减少寺院僧人将意味着西藏获得新生？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显然，结婚率和出生率即将提高，多少世纪的人口衰落即将结束。

这些就是七月十七日决议以来的变化。我们是第一批获特准前去见证的外国人。

* * *

凌晨四时三十分，凤凤来叫我，我已经醒了。我们将乘包机飞西宁，它是青海省省会，我们将在那儿过夜，那是此行的第一夜。接下来，我们将改乘小型军用飞机。这是一种适合高原的机型，机舱内无增压装置，氧气只有通过氧气瓶供给。氧气通过管子输送到座位上，每个座位都有氧气面罩。我们将在海拔六千四百米（两万一千英尺）或更高处飞行数小时，将飞越唐古拉山脉，它本身就高达六千零九十六米（两万英尺）。因为海拔高，荒无人烟，天气多变，据说此航线比著名的“缅甸驼峰”（Burma Hump）还难飞。“缅甸驼峰”曾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供给航线。在六千四百米的高空，我们必须将自己厚厚地裹起来以御寒，同时做好随时降落骄阳似火的拉萨城的准备。我的全部行李，加上一台打字机、一个照相机，还有笔记本，必须控制在二十公斤以内。

凤凤是那种极其厚道的年轻女子，主动到行李托运员跟前问：“这些也要过秤吗？”然后她解开外套，亮出我严严实实包裹好的照相机，还打开了睡袋，在这个不起眼的帆布包内我塞进了约八磅（约三点六公斤）重的东西，什么瓶子、拖鞋、睡衣、毛衣等等一堆零碎，统统被她给抖搂了出来。此情此景，连行李托运员都吃了一惊，他不耐烦地挥手让她通过。我的旅行箱装了打字机，托运时重十九公斤，凤凤没有打字机，只有十五公斤。我们俩的行李加起来比规定的整整差了六公斤，我们为守规矩而感到沾沾自喜，相比之下那位捷克先生可就惨了，他带了两架摄像机和一部录音机。一旦有人弄清了捷克先生的工作性质，我敢说，最终会给他特许的。

飞机上，乘务员给我们送来了玻璃杯盛装的热茶和冷饮。不到十一点我们就抵达了西安，一辆巴士已在那里等候，我们被拉到城里的一家大饭店，吃了午饭返回机场，中午准时起飞。整个上午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可是午饭后我开始感到年

龄不饶人了。我打呵欠、伸懒腰、踢掉鞋子，让脚松快，一副要睡觉的样子。我心想，一定是午饭吃多了，不应该睡午觉。后来得知这种不适还另有缘由。

我们的车顺风，每次女接待员走过我们都会说，一直都这么顺利的话，我们会提前到站。两点三十分，我们抵达西宁，乘车去了一家漂亮的高层旅馆，客房内的书桌上摆着饰有花朵的文具，床上铺着华丽的桃红色缎子被盖，上面绣满了黄色的玫瑰。随团医生串门来到我的房间，给我量血压。发现我的血压比在北京时还好，高压一百二十，低压六十五。他祝贺我，问我从西安飞过来时有没有感到缺氧？

“从西安？”我说，“当然没有。”但想起了我有一阵的疲乏不堪、坐卧不安，我说给他听。他说：“你飞越了三千九百多米（一万三千英尺）的高空，这比拉萨还高，如果就只那么点反应，这趟旅行，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你现在的脉搏每分钟六十下，这比不少年轻人的都正常。”听到这番话，我来了情绪。

我去参加了我们与省政官员的访谈会，有不少关于青海省的事想问问。我是第一次得知，西宁这座城市远比青海省的历史悠久，甚至比该省周边任何边界的历史都长，这令我感到意外。大约一千四百年前，西宁是中国唐朝的前沿哨所。那时的西宁是一个区域的首府，该区域的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五个省。“解放”^①时，西宁拥有十万人，只有一半在城里，其余的都在郊区。如今，在我们访问这座城市时，它的人口已升至四十六万，其中三十四万居住在城里，其余的在农区。从新建的

^① 中国的常用词，意思是中國从帝国主义列强的百年占领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此词最早用于抗日战争时期，指人民解放军从日本占领区中解放出来的区域，北京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前，许多年里，解放区就已大量存在。今天，不加引号或不做限定的“解放”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西藏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被“解放”，还需“解放台湾”，只有这样，中国的解放才算完成。——原注。

五百家工厂可见青海省的发展，尤其是以西宁为中心的省会的发展。西宁还没有通火车，但据说当年十月一日就通了……（此在“后记”中得到证实。）

我从另外一位官员处得知，青海省原属一个大的行政区，该区域还包括陕西、甘肃等地方。青海省目前的边界是一九二九年才划定的，当时军阀马步芳与蒋介石互予承认。马是一位贪婪、残暴的军阀，即使在军阀中也臭名昭著。“解放”时，青海省人口为一百四十万，现在已经发展到两百四十万。青海最大的发展在柴达木盆地，那是一片巨大的荒原，也是天然油田，大型油钻树立田间，油田已在开采中。石油将用卡车运出，不久就会用火车运出，再往后会通过管道运出……青海在腾飞！

听了对青海的介绍会使人想起美国西部或其他待开发的区域，他们说：“青海仍然是一个人口稀疏但前景可观的地区。这里是十大江河的发源地，其中包括黄河和长江。我们在这里有一千八百多亩（三百多万英亩）的可耕地，其中将近两万一千二百多亩（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从未开垦过。这里有一千二百万头牲口，而这里的天然牧场可饲养八千万头牲口。这里还有丰富的矿藏。这里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青海与西藏接壤，并与西藏同享“世界屋脊”的称号。虽然青海的东北部，环绕西宁一带，其海拔只有两千四百多米（七八千英尺），青海的南部地区则地处高大山脉及高原河谷地带，因此其平均海拔都在三千九百多米（一万三千英尺）。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八个不同的民族，汉族占多数，有一千四百万人口，超过其他几个民族的总合；藏族居第二位，人口为四十万；回族位居第三，有二十二万人口。青海基本是由各民族地区组成的，藏族占五个区。尽管藏族在人口上列居第二，但其土地面积则占整个省份的一半以上，这些土地基本都在南部高原地带。

因为达赖喇嘛三月六日在印度发表的反华声明中，出于个

人的需要声称，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大西藏”，所以我问道，为什么这五个藏族区划入了青海省，而未划归西藏本身，它们就紧挨着西藏。地方官员笑了，说：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古拉大山脉，明天大约中午的时候，你从飞机上向外望，之后就会明白的。这座巨大的山脉不仅海拔六千米，而且宽广辽阔。多少世纪来，它几乎是一道难以通行的屏障，不过那些不畏艰险的朝圣者确实翻越过这道屏障，它甚至被一些远征队征服过，然而政府机构却从未尝试过。大山脉以北的藏区与以南的藏区在发展上是不一样的。以北的藏区甚至不会讲拉萨话，事实上，即使是青海省内的五个藏族地区，也无法沟通，因为大山脉把它们也分割开了，所以它们是五个地区。那么又是什么将它们连在了一起呢？是什么给了生活其上的人们“藏族”这一共同的名称呢？答案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藏传佛教。这五个地区寺院里的经书全是用古藏文写的。虽然他们血缘不同，发展史不同，语言不同，但他们都是藏族。

我仍然质疑，问：“是不是拉萨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统治过青海的什么地方？”

地方官员回答：“从未有过！历代皇帝都是直接将头衔授予部落首领。”

这话不假，但我仍觉得不太理解。在数百年漫长的封建史上，寺院本身行使着一种松散的世俗统治权，作为大面积土地的拥有者，用出租土地的方式，控制着各部落。寺院高僧带上贡品，从远在蒙古的布利亚特（Buriat）（在如今的俄国境内）出发，前往拉萨朝圣。同样，各部落也要向那些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军阀或君主进贡，拉萨本身自唐朝起就开始向北京进贡了。拉萨最终产生了世俗政府噶厦，其指令从未传到唐古拉大山脉以外的地方。

此时在国外，不见达赖喇嘛的明确字句却以其名义制造了不少言论，声称北京犯下了灭绝藏族人民的罪恶，汉族如潮水

般涌入西藏领地，这些言论的依据在西藏地区是找不到的，因为当地政府并未允许外来户在藏定居，相反与西藏毗邻的省份人口却大增，尤其是青海省，不过这些省份许多世纪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

* * *

与地方官员交谈完，我正感觉兴奋呢，西宁的海拔，虽然只有两千一百多米（七千英尺），却让我吃不消了。晚饭后，我和一位朋友在房间里聊天，聊着聊着，就没了兴致，我赶紧上床躺下。我不敢在房间里走动，怕跌倒。甚至连坐在床上都不行，只有躺下。这也太奇怪了，我没有一点疼痛感，只是动起来不由自主。凤凰来通知我早上四点半起床，六点乘飞机离开。

“恐怕我走不成了”，我说，“因为我下不了楼。”

医生来了，给我把脉，说我心跳正常，没事，会好的。来电话了，说唐古拉山脉有风暴，我们的航班推迟了。

“推迟它一周才好呢，”我说，再次安定下来，睡觉了。

第二天医生带来了令人安慰的消息，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高山反应，我庆幸自己不是唯一有反应的人。“你会没事的”，他说，“乘飞机前要放松”。我还是有点担心，西宁这么点海拔就击中了我，真不知拉萨会把我怎么样呢。其实我过虑了。接下来的行程中我再没有像在西宁那样无可奈何地倒下过。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躺了三天，加上北戴河的一天，共四天休假足矣？事实的确如此！

第二天，没人得空休息，按照安排，去参观了贡布寺（Gumbum），汉语称塔尔寺，因为要去西藏，所以我们用该寺的藏语名称。贡布寺以宗喀巴（Tson Khapa）的诞生地而闻名遐迩，宗喀巴是十四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他创立了黄教（格鲁派），该教是如今西藏的最大教派。他的十大弟子中的两大弟子，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班禅·额尔德尼，他们从十四

世纪（原文如此。实应追溯至十五世纪。——编注）起转世传承。寺中还保留着这两大弟子的住所，几百年前他们就住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一九五六年六月，班禅从北京回拉萨，途经西宁去了贡布寺，主持了所有的宗教仪式，诸如吹螺号，互换哈达，在宗喀巴以及历代班禅像前祈祷等等，然而，他却来到我们在西宁住过的漂亮宾馆住宿，看来班禅也在渐渐现代化！

我挺想去看看贡布寺，但还是听了医生的话。“我不能以当地的一个寺院而冒去不成拉萨的危险”，我说，“还是乖乖躺在床上吧！”这时凤凰问，她能不能替我去一趟？我很赞成这个主意，宣布道：“你会成为一名记者”，并且告诉她需要抓拍的东西。

凤凰很认真地照办了，不足的是遗漏了色彩性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贡布寺的模样，只有一句描述它的话：“面对寺院，才会意识到，这座寺院在峡谷上延伸，情景壮观得多。”从别处我了解到，寺中有一些出名的宝塔，当今的北京政府已拨款，准备为这些宝塔“修一块民族纪念碑”。凤凰拿到了制成表格的有关僧人的所有的数据，还有“改革”中僧人的情况。青海境内的贡布寺比西藏提前一年多实行了改革。对后来拉萨发生的事情，这可能就是一种暗示。

两年前，贡布寺拥有一两千僧人，有人说有三千，后者被县代表否认了。县代表说，“很久以前可能有过三千僧人，但近几年只有一千多了，现在就只有四百九十六名。僧人人数减少的原因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僧人获得了‘人身自由’”。所以许多僧人都回家和他们的父兄种地去了。留在寺院里的僧人也开始了“民主”管理寺院，选举成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该机构分两部分，一部分管理宗教事宜，另一部分经营农场。

贡布寺拥有三千两百八十亩（两万英亩）土地，以前都由农奴耕种。一九五八年农奴获得自由后，寺院得到通知，可以保留满足寺院自身劳动力耕种的土地。寺院拥有相当数目的牲畜，因此，决定保留三百二十亩（两千英亩）土地和所有牲

畜。现在，有的僧人种粮食，有的种蔬菜，有的经营一个奶牛场，有的为城里的寺庙和附近的农民跑运输；还有一些僧人专门修复自己的寺院。贡布寺是一座古老的标志性的建筑，因此，北京拨专款予以修缮。

并不是所有僧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四百九十六名僧人中，五十名已年过半百，三十名未满八岁，他们都不干体力活。贡布寺还有大批高僧，可能有十位活佛，他们是过去有名僧人的转世化身。这些人的时间花在研习经文、主持佛事上，他们也为民间婚丧礼俗当司仪，因为，这种时刻尊贵的活佛身份可以获得丰厚的信徒费。高僧的工资从寺院基金中支出，这种基金的建立百分之七十来自僧人的劳动，百分之三十来自信徒的捐赠。

给记者团全程作向导的僧人说，他现在“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凤凰按吩咐问他，上层喇嘛也比先前过得好吗？他回答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大喇嘛在场，如果有，回答可能是反的。年轻的僧人说，大喇嘛主持佛事，获得工资，还可得到信徒的特殊馈赠，并且拥有最好的房子。但他们再也不能从剥削奴隶的劳动中获得大笔钱财了，过去这样的钱财往往被他们据为己有。也许他们现在已经花光了这样的私房钱，对此向导不得而知，但他知道大喇嘛依然过得比下层僧人好。尽管如此，僧人，即使是下层僧人，过得也比农民强，因为僧人已经有了房子，而且不需要养活大家庭。

好几个僧人已经结婚，但仍然留在寺院里，只在周末回家探妻。结过婚的僧人要想留在寺院里必须经过其他僧人的投票表决，当然，留下了就必须好好工作。总的来说，凤凰干得不赖。

第二章

“豪华型”拉萨飞行

八月十一日晚我们上床睡觉时，西宁还在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天气预报说，另一个省份在刮大风，波及西宁，但已近尾声，黎明时分天会转晴，可以起飞。预报挺准，凤凰五点叫我，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但已是满天星光，空气格外清爽。

她警告说，“穿上你最暖和的衣服，这儿黎明前特别冷，飞机上就更冷了”。她把我们头天晚上装好的手提箱拎进了大堂交给搬运工。我穿上了在北京冬天才穿的棉裤和大衣，带上一双厚得都穿不进鞋里的毛袜子，以备抵御飞行中来自地板的冷气。五点四十五分早餐送进我的房间。

我现在跟别人一样做好了准备，西宁的三天卧床加上北戴河的一天疗养，共四天休息，我觉得行了，可以做这趟旅行了，为证明这一点，头天晚上我下楼参加了地方当局招待我们的舞会，还和青海省的官员及省委书记跳了舞。这纯粹是为了给大家看看。一直盯着我的凤凰容忍我跳了两场后，过来说，“好啦，该去睡了”。我听从了，所以第二天五点钟她来叫我去时，我已经醒来，做好了准备。

我们六点钟离开饭店——中国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看当地

天色，此时还不到四点，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机场。四架苏制的银灰色安尔（Ilyushkin）飞机在蒙蒙天色中排成一行，每架坐八人。我们十九名外国记者，两名中国东道主，翻译、医生，加上几位地方空军司令部的高官，我们现在有三十多人。那几位地方空军司令部高官将乘第一架飞机为我们引航。虽然所有飞行员都熟悉这条航线，但是大山脉以上的天气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本次航行困难的一部分，遇到天气变化，是不允许飞行的，只有待全程天气预报晴朗才可放飞，即使起飞了，飞机也会因紧急情况随时中途降落。

飞机每隔五分钟起飞一架。头天晚上就分配好了架次，我被排在第二架上，与我同乘一架飞机的有《人民日报》秘书长唐利（Tang Li）、伦敦《工人日报》（London Daily Worker）的阿兰·温宁顿（Alan Winnington）和《真理报》（the Pravda）的姆·道莫哥兹基（M. Domogadski），他们两位是头天晚上推选出来的记者主席，负责联络和发言。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医生和凤凰。

当二号机亮晃晃的金属梯子收起来时，天边才泛起鱼肚白。地方空军副司令来检查我们入座的情况，预祝我飞行愉快，我问他：“是不是这条航线比太平洋战争期间著名的缅甸驼峰航线还难飞？”他没有直接回答，但向我保证，“只要天好，一切都会好的”。

我说，“我并不怀疑这一点，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只想知道这条航线比缅甸驼峰航线难飞吗？”

他这才弄明白，笑道：“有点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领航。”昨日英雄的冒险变成今日记者的探险，也许明天就会开通旅行航线。西藏，那片神秘的土地会成为一条常规旅行线路吗？这恐怕还是个疑问，但政府计划今后几年内将修一条通拉萨的铁路。

头天晚上的舞会上就有消息透露，因此，我对飞机内部设置挺好奇。地方空军司令部得知是他们送我去西藏，非常重

视，因为我是他们在这条航线上运送的最年长的一位乘客，他们为此而感到荣幸。不仅要把我安全地送达，而且要保证我的健康，对待我将像对待一件标有“朝上，小心轻放”字样的行李。他们试着为我特制了一种床，以此取代了一般的座位，没看到之前，还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做得到，如果做到了，那将是第一架飞拉萨的“卧机”，颇有点历史性。



我们行驶在著名的青藏公路上

结果我被机舱内的高雅陈设惊呆了，这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奢侈的工作，可能是专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或其他某位高僧设计专用的。乳白色调柔和明快，蓝色图案恬淡宁静。乳白色的拱形天花板上安装了六盏圆形瓷灯，蓝黄色的地毯铺满地板。入口处，厚重的深蓝色丝绒布帘挡住了机尾的寒气。行李间和卫生间设在机尾。宽敞过道的两边摆放着大大的独立的躺椅，每个躺椅都挨着一个窗子，配一幅氧气面罩，面罩接在中央氧气瓶上。过道的一边，在面对面的躺椅之间，有一张足以放几个茶杯的桌子，此外，上面还能放书本和相机。

过道的另一边，对着桌子的地方摆放了一张华丽的沙发



来自十二个国家的十九名记者在布达拉宫下

床，最新豪华款式的。柔和乳白色的沙发床垫绘有蓝色的图案，垫上铺了一床华贵蓝缎面的鸭绒被，被子整洁地套在被单里。床头一对浅蓝色的枕头镶着皱褶的花边，枕头上是钩了花边的小圆垫，这么华丽，我都没舍得用头去碰那小垫子，而是把它们轻轻地挪到一边，这才敢枕上去。氧气面罩随手可及，这可真称得上豪华型拉萨飞行。

天气依然挺冷，我看没什么必要非坐着等起飞，就一下蜷缩进了蓝缎鸭绒被，这时，阿兰·温宁顿紧随我后进了飞机，他为眼前闺房似的陈设喊了起来：“你可得在此留个影啊！”说着就打开了照相机。

我忙说：“慢着，等我躺好了，你怎么拍都行”，边说边舒服地摆出了两种姿势，一是戴着氧气罩的，一是没有戴氧气罩的。

阿兰说：“这简直就是给总理布置的。”

我争辩道：“总理的寝室也不会怎么样的，他们的是不会

有花边、缎子的。这里的陈设不亚于示巴（Sheba）女王的卧室。”

我们的飞机全都聚齐在停机坪上时，太阳刚好出现在清晰的地平线上，呈一个发白的金球。二十分钟后，我们的气压表显示四千五百米，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一万四千八百五十英尺，这比美国的任何一座山峰都高。又过了五分钟，我们升到了五千米（一万六千五百英尺），这时可以感觉到从飞机马达处传入一股暖流，凤凤脱去了外套。嘿！这还是一架有暖气的飞机呢！我们还没人感到需要氧气。这是西宁三天休息的结果。

无论开始怎么吹牛，飞行还是令人疲倦的。高海拔对人体的影响好像不只是通过肺叶。原以为那把躺椅就能让我通过高海拔，但现在看来我得感激有了那张床！我发现景致并非想象的那么精彩，无休止的岩石和白雪皑皑、跌宕起伏的群峰渐渐让人感到乏味。脚下的景致越来越平缓，慢慢变得荒凉，这荒凉偶尔也会被高空美景所打断。第一个美景是飞越大盐湖，中国人如今叫它青海，青海省就是以此湖命名的……而我更喜欢它的古老的蒙古名，库库若尔（Kokonor），中国唐朝也用此名。从高空看，湖水碧蓝一片。再往前飞，景致呈连绵起伏的大山脉，座座冰雪覆盖，一座高过一座。我坐起来一两分钟，观看每一座山峰，然后再躺下。九点钟我们降落在一个临时机场，给飞机加油。一些人因为天气被困在这里已一个星期了，我为没被困在这儿而感到幸运。十点钟我们又起飞了，向最高处——唐古拉山脉飞去。

我们陡直向上升腾，直到六千六百米（约合两万两千英尺），那之后的高度保持不变。唐古拉山脉不仅直上青天，高达两万英尺（六千二百米），且长而辽阔。来往于青藏的人们都躲不过这道巨大的屏障，无论是过去徒步或骑马的朝圣者，还是如今来自中国内地的运输卡车，或是像我们这样乘坐飞机的人们都必须经过唐古拉大山脉。氧气面罩一直是我们的取乐的玩意，这时变得有用了，就这也只是间歇地用用。机舱内的压

缩空气清新凉爽，沁人心脾，比面罩里的气味好得多，面罩里的气味反而显得陈腐、热乎乎的。然而，要是有一会儿暴露于机舱的空气里，就会感到有点头晕，只好又转向面罩吸两口。我不时地往下观望，白雪皑皑的山脉在我们脚下连绵起伏，高空使这些大山变得平缓。我们从干旱的北部山脉飞到南坡，雪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北部的气候受沙漠的影响，南坡则刮着来自远方印度洋的季风。最后，连这些起伏的山峦也变得索然无味了。飞机的第二条腿比第一条先脱出。一点钟，我们的飞机降落在西藏的机场上。被飞行变平了的景致在我们四周升起，壮观的雪峰，绿茵茵狭长的高山牧场，如同上了油彩的图画。

我们的飞机每隔五分钟降落一架，准确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表，这时才知道第五架飞机一直放空跟着我们，万一哪架飞机中途迫降，此架飞机便可应急，不至有人半途停留。凡是人们能想到的都做到了，我们的飞行因而得到了保障。

拉萨接待委员会派了十三辆汽车到机场接我们。几年前，拉萨这座连马车辙印都见不到的城市，如今竟有了这样的车队，这是第一件出乎我们预料的事。第二件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从机场到拉萨还有差不多半天的路程，而且是沿山道行驶。据说机场之所以建这么远，是因为前地方政府不允许北京选择离拉萨近的地方建机场。令我们吃惊的第三件事，是被西方报纸谴责为粗暴镇压西藏的中国中央政府竟听从于地方指令长达八年之久，就连与西藏通航这样事关国防的重大事情，也要首先听从从当地的意见。人们还告诉我们，就是这块经噶厦允许的地方也不为专家认可，因为这里的能见度达不到高海拔所要求的标准，然而，中国飞行员经过细心的演习，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做到了安全升降。

主人把我们领进一个餐厅，那里供应午餐，也提供氧气，在餐厅的尽头放着两个高高的氧气瓶，看上去像两架微型加油罐。虽然这里的海拔将近四千六百米（一万五千英尺），但却没人感到需要氧气。与拉萨河谷较低处的空气相比，好像草原

上的新鲜空气更令人兴奋，这一点在我们返回时得到了证实。

宣传部部长方驰辛（Fang Tse-shing，音译）在午宴上致词欢迎我们，在他的讲话中，“百万农奴站起来”是我最能记得起来的话。他说：“农奴们不仅在埋葬旧的农奴制，而且在建设一个新西藏。这片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封冻了几百年的土地如今焕发了青春，西藏人民已命运在握，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民主的西藏，民主西藏的未来就是社会主义。任何帝国主义的叫嚣都无法阻挡这样的趋势，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我们将在这里建设幸福的明天。”

这下我们弄懂了为记者们推选两名主席的原因，《真理报》的道莫戈兹基（Domogadsky）专门在这种场合代表记者团发言，向空军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组织了这次“英雄的航行”。接下来我们要赶路，要快，一是为了赶在天黑前到达拉萨，二是为了尽快地赶往海拔较低的地方。

大山，我们现在已置身其中，它们远比飞机上看到的更具魅力。高原上空气稀薄，整个自然界好像都浸透了阳光。雪峰、岩石、峭壁、长坡形的牧场都有着十分鲜艳的颜色，比我见到过的任何风景都光彩夺目。高原的颜色比低海拔、被氧气深深裹住处的颜色要鲜艳、丰富得多，天空更蓝，草地更绿，就连岩石都更鲜艳多彩。飞机上所见单调的灰石头、茫茫白雪现在一下变得五彩缤纷了。悬崖峭壁呈红色、紫色，甚至还有橘黄色，这表明可能储有矿藏。牧场上点缀着牦牛、绵羊和山羊。源于融雪的小溪清澈碧蓝，哗啦流淌，跃上公路。总有一天这里会成为地球上的一个度假胜地。

牧人出现在牛群中，或者站在石窝棚旁，从挂在他们身上那肮脏的布条碎絮看，他们极其贫穷，那矮小的石窝棚也难以抵挡夜晚的寒风。然而，他们个个都挺立着，多数还挥手，呼喊着我们打招呼。在一群窝棚的附近，四个小男孩跑上了公路，排成一行向我们致意。我们的来访还没有公开过，这片牧场上，没人知道我们是谁，但他们知道了，是从车队知道的，

知道我们从机场过来，知道我们跟席卷他们国家的伟大革新有关。“百万农奴站起来”在此显得恰如其分，如同大地复苏一样充满活力。

道路宽敞，足够车辆运行，这是西宁—拉萨主干道的一段。抵达拉萨前，我们至少遇到了五十辆七吨载重的卡车。这条公路难得平稳，相比起来更适合吉普和卡车，而不适宜小客车。这段路多处易受河水冲刷或易遭塌方堵截，所以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修路队，队员有男有女，他们总会向我们招手或呼喊表示欢迎。有一伙妇女，她们边唱边干。还有一回，我们竟和一支毛驴队相遇，最前面的一头驴看上了我们车上的散热器，害得我们来了个急刹车。赶驴人过来用棍子把它赶开，愉快地向司机道歉，继续赶路了。

我问那些一九五五年访问过西藏的记者：“西藏人以前也这样吗？我还真没见过比他们更快乐的人呢。”

回答是：“以前，从没像这样过，他们现在复活了。”

从高原牧场到河谷地带，海拔在逐渐下降。在去拉萨的途中，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向右拐的路通往日喀则，那里是班禅额尔德尼的驻锡地，这条路经日喀则通印度。去拉萨的路向左拐。我们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休息，站上供应茶水，有汉族喝的无糖、淡色的茶，也有西藏的咸味酥油茶，我们可以随意选择。离开这里，道路急转直下，进入峡谷。出了峡谷，我们开始路过小型的聚居点，居所附近是长着青稞和豆子的农田。寺庙出现在山坡和峡谷上。

路越来越难走，穿越道路的溪水越来越大，午后溶化的雪水上涨，漫过公路，冲毁路面，所以每当我们的车要蹚过一片水道时，我都会怀疑能不能到达另一边，这种水道常常宽二三十英尺。司机们好像对此习以为常，他们挂低挡小心翼翼地开进水道，谨慎地探着路，汽车发出阵阵隆隆声，缓慢地，稳当地穿过水道。十三辆车排成一队，整齐地间隔开，一辆跟着一辆。

太阳西沉，我们进入一条长长的河谷，路过一座大寺院，这是我们后面准备了解的一座寺院，叫哲蚌寺，是西藏最大的一座寺院。突然，前方远处，一个如同红白宝石样的东西映入眼帘，在残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我们一下就认出，那是著名的布达拉宫，是五世达赖为在世的达赖修筑的寝宫，为故去的达赖建造的陵寝。五世达赖为宫殿选址令人称道，长形河谷中间升起一座小山，布达拉宫依山而建，整座宫殿与太阳朝夕相处，可远眺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者。不仅如此，宫殿的修建也别具匠心，红宫是陵寝，两侧巨大的白宫是寝宫，宽大的宫顶是用金子铸造的。这种建筑形式很新颖，与山融为一体，边上的宫墙向内倾斜，呈坡状。这见证了藏族人天生的一种才能，这种才能有可能从沉睡数百年中再次复苏。

距离布达拉宫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随着落日，我们还要拐许多道山弯，蹚许多条小溪。我们面前闪过越来越多的架子车、农民的驴车，还有回家歇夜的城里人。太阳下山，暮霭笼罩了大地，遮住了仍然遥不可及的布达拉宫。高空和山上依然明亮一片。在拉萨城边，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对肩扛铁锹的民工，他们挥舞铁锹向我们致意。我们的司机说他们是挖排涝沟的志愿者队伍，现收工回家。

他补充说，“志愿者中有僧人”。我们还不知道僧人自愿参加集体劳动被看作很有意义的举动，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新生。

我们到达了布达拉宫，从宫殿的北边绕过，现在的布达拉宫只是一个矗立于峭壁、高大的白色阴影。我们拐进了一个大院子，院子被盛开的鲜花所包围，车在一座宾馆前停下。从花园里我们又看见了布达拉宫，它背依黑沉沉的西天。从西宁出发到现在刚好十二个小时，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飞越唐古拉山脉，着陆于高原牧场，驶入漫长的河谷，这在过去的数百年中要花朝圣者一年多的时间，而我们就这十三辆车便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整个行程，这颇具创举。这十三辆车，有的是一般的小轿车，有的则是吉普车，一路上，没有一辆陷入水洼

地，也没有一辆爆过胎。

主人告诉我们：“明天敬请休息，晚间有宴会和舞会，第三天才有行程或采访。”

休息的理由显而易见，因为我们个个爬楼梯上二楼去卧室便大口喘气。拉萨比草原牧场海拔低得多，但仍有一万两千英尺。英国人曾说拉萨海拔一万两千八百英尺，而中国人说三千六百八十米，我用计算器算出，这相当于一万两千一百五十英尺。无论怎么说，这里也是世界一流的高海拔城市。我们的问题是设法喘气。

给我分了一个单间，两面墙都开了窗户，望出去是一条荒凉的山脉和药王山，药王山是拉萨的制高点，山上坐落着藏医院。房间内铺满地毯，是藏式编织品，色彩鲜艳，翠绿、橘黄加明黄，产自江孜手工艺编织厂。两把厚软的沙发椅，中间放一个茶几。床铺宽大，上铺一床漂亮的被子。房子的一角，在两扇窗子之间，摆放着一张大大的写字台，椅子包了橡胶软垫。房门边立着一个洗脸架，上面的一盆热水是房间服务员端来的。这间房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自来水和布达拉宫的景色。拉萨还没有供水系统，至于布达拉宫景色，凤凤说，想看就穿过大厅去她的房间看。

凤凤对我说：“他们专门为你安排了既朝南又向西的房间，在拉萨人们会需要太阳的。”

我们是需要太阳，需要休息，但最需要的还是氧气。无论怎样转拉萨都是不容易的，即使做成豪华型的也不行。然而，从没有哪次旅行比这次的筹划得更周密，安排得更舒适了，目的就是省下力气迎接下面的工作。

第三章

第一次情况介绍会

开头几天要我们好好休息，适应高原。到达拉萨二十四小时后，主人宴请了我们，开了一次欢迎会，举办了一次舞会。所有人都赴宴了，多数人还参加了舞会，我省略了舞会，因为我还三步一大喘呢。年轻人用一天逛了商场，有的人为此精疲力竭。

他们找到了一个市场，在那儿发现旧衣服里子上可以抠下漂亮的碎银子，这些银子是用古老的方式，手工敲制的。他们还发现许多出售外国商品的印度、尼泊尔商人，显然，他们的商品没有上税，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有兜售蔡司（Zeiss）相机的，一听雀巢咖啡才卖一元钱。可就在他们进入市场一小时后，一听雀巢咖啡就涨到三元，其他商品也跟着飞涨起来。主人不让我们各自采购，因为那样把这个给拉萨人开的市场价格翻了番，所以决定让我们锁定各自所要东西的方位，由他们去付款。一般的日用品可以在我们住所附近的一家国营商场买到。这样我不用进城就为自己的闪光灯买到了电池和一盘新打字色带。那样一个市场和这样一个商场并存似乎不太协调。

头一两天为了避免消耗体力，我们的采访为与军要和政要的会面所代替。他们为我们提供西藏的情况特意召集了第一次

会议，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状况，介绍了过去八年所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三月叛乱以及平息叛乱，也谈到了“民主改革”的新计划。我对以上情况基本上都已了解，因为在北京我就见过当今西藏的三大头面人物，第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不在期间，他是西藏的宗教领袖和政府的代理主席；第二位是阿沛·阿旺晋美，简称阿沛，他是新政府的秘书长和最高行政长官；第三位是张经武，他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五一年八月来到拉萨，专程落实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回归祖国”的协议，该协议是在北京和达赖喇嘛所派代表签订的。相关的整个细节我都写入了《采访西藏人》一书，该书已出版。所以，在此就简要概述这些以便读者了解我们这次的西藏之行。

* * *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这个国家大省份中的一个，西藏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已长达七百年，这是所有中国人所持的观点，这一点不时地也得到所有外国有保留的承认，大多数藏族也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如此，分裂活动从没有断过，但无一获胜，因为无能为力。

历史上，西藏与中国的关系通常从公元六四一年算起，当时西藏第一位英明的国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从那时起，西藏开始向唐朝进贡。文成公主至今都是西藏歌曲、神话以及戏剧中被歌颂的人物，歌颂她“把佛教作为嫁妆带入了西藏”，她还带入了唐朝的蚕茧、水车以及高级匠人。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像也是文成公主带进来的，据说这尊佛像是释迦牟尼生前的八岁等身像，因此而特别神圣。为安放这尊佛像，文成公主专门主持修建了一座寺庙——大昭寺（原文如此。应为小昭寺。——编注）。这尊像至今还放在该寺的一间殿堂内，殿堂为链条封锁着，我曾借助上千盏朝圣者手中的酥油灯看到过那尊佛像，该佛像是西藏最神圣寺庙里的最神圣

之物。

神学专家说，文成公主的确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营造了极佳的环境，在佛教传播方面起了不少作用的还有松赞干布的另一妻子，尼泊尔公主。然而，印度的僧人、学者则为整个佛教教义的传播做了巨大的努力，历时数世纪，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十世纪，当佛教在印度灭亡时，佛经已经译成了藏文。一种号称“喇嘛教”的藏传佛教形式以拉萨为新的基地发展起来。该喇嘛教还包括游牧部落原始信仰的内容，这些都不是传统佛教的内容。

文成公主修建第一座寺庙一个世纪后，西藏的另一个王子迎娶了唐朝的另一位公主，之后唐朝皇帝穆宗于公元八二一年在拉萨大昭寺前立“甥舅同盟碑”，该碑至今仍在。即使在有飞机的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拉萨似乎也远在天边，更何况没有公路的数百年前呢，人们难以想象这样的往来是如何保持下来的。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往来中断了，直到蒙古远征军再次统一中国，这种往来才再次开始。

“是忽必烈汗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按你们西方日历计算，时间约在一二五〇年。”这话是阿沛对我说的。阿沛应当了解这些，他出生于有千年历史的西藏官宦家族。他家祖上起初只是拉萨东部的小首领，忽必烈汗统一中国后，就当上了贵族，在西藏地方政府内都身居要职。阿沛从其家庭教师处了解到，历史上称忽必烈汗的成就为“政治统一”。这种说法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忽必烈汗并没有想到是他“将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他只会认为是他将中国和西藏收归在一个蒙古皇帝之下，该皇帝是一个蒙古统治者。然而，不管是蒙古人、西藏人，还是汉族人都接受是忽必烈汗将三者统一的事实，并立都北京。在“政治统一”中，汉族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人口上都占优势，因此，历史上就称这一统区为中国，此名称延续至今。

从这以后，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蒙古人、汉人和

满族人曾先后继承对中国的统治权。人们从未否认中国主权的不稳固，时常处于纷争之中。整个中国不止一次被战争瓜分。当中国被割据成许多部分时，西藏也被分割出去；而当中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再次统一时，西藏又会被统一回归。中国最后一次被割裂是在 20 世纪初，时逢清王朝垮台，中国再次陷入势力范围的瓜分之中。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宣布“独立”，该宣言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① 西藏军阀为争夺蒋介石地图上标出的一个叫“西康”的省份与四川军阀打起来。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西藏仍未中断向国民党政府报批遴选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灵童事宜。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西藏地方政府均派代表出席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1946 年）等会议。

西藏与中国的这种松弛但却持久的关系得到了各国外交上的承认。七个世纪里，没有一个国家派驻过使节到拉萨，也没有谁承认过西藏是独立的。即使在一九〇四年英国人以武力强占拉萨，在布达拉宫口授条约，索要七十五万英镑，该赔款的账单也是寄给北京的皇上，由他筹款赔付的。连藏传佛教的寺院遴选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这类事宜，也要报请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尽管这些寺庙延伸于蒙古与布利亚特蒙古地带，后者如今已划归苏联，它们都是这么做的。赵朴初对我说，“所有转世灵童都必须经过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赵是中国北京佛教理论研究所的所长。

政教合一，这一西藏政府的形式，也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汗时代。那时，西藏有学问的一位高僧——八思巴协助创造了蒙古人的文字，出于感激，皇上赐予他“佛祖西域的法王”（原文如此。实为忽必烈赐八思巴玉印、封诰，封其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

^①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对祖国一直很忠诚，当时逃生到了青海；昌都的贵族也反对噶厦的统治。

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编注），这里的西域远至库库若尔（Kokonor）地区。如今的某些作家试图撇开中国，抬高西藏，认为忽必烈汗没有“册封”八思巴为王，只“尊其为教皇”，这在概念上不能说完全不通，人们质疑忽必烈汗是否还“尊崇”过什么人，但却不怀疑“帝师”这样的称号是至尊无上的，这同时表明了八思巴的特殊身份。

在久远的过去，在亚洲辽阔的平原和沙漠上，原本没有国家，也没有明确的疆界，那时，游牧部落间为草场纷争而征战，定居者开垦农田，取石筑墙圈地。寺院不仅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还掌控大面积的土地，向部落首领出租土地，由此建立起一种封建秩序。远至蒙古和今属印度的领地，部落因通用的藏语言经文而连成一片。中国的皇帝是最高君主，其帝国的扩张不仅仅依靠征战，还利用了相互间的赏识。忽必烈从事统一的事业，既以武力扩张地盘，又以和安抚部落。为安抚部落，皇帝促进了寺院的发展，同时也限制其对世俗的统治权，尤其限制其对新开发领域的统治权。在中国的蒙古和西藏，寺院控制土地和部落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当今的民主改革时期。

* * *

从忽必烈汗时期起，西藏所有的基础变化都由中国皇帝决定或批准，甚至连达赖喇嘛自身的转世制也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

理论上说，藏传佛教汲取了原始部落的许多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一切贤能圣人都具有转世化身到今世的功能，藏语把这种圣贤叫“曲谷”（chu-gu），梵语叫“谷鲁”（guru），汉语则称其为“活佛”。人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活佛，但据说约有一千人声称享有该头衔，他们在寺院首领中都是出类拔萃者。活佛中有两位顶级人物，他们就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据推测他们是十四世纪宗教革新家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宗喀巴创立了如今在西藏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教派。达赖和班禅是一对

“精神兄弟”，在任何转世中，两人的年龄总是很悬殊，堪称“父与子”，这是一个意味着统一体的词汇。他们与其他活佛的区别主要在于两人享有世俗权。这种权力连同他们的头衔都是中国皇帝赐予的。

自从忽必烈汗统一中国后，过了约四个世纪，第一位清朝（满族）皇帝授命五世达赖喇嘛“统一部落”^①。这样，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第一个享有世俗权的达赖。皇帝正式赐予他头衔的全称为“西部佛土之法王，世间神王，无比智慧，皇帝授命的霹雳王——达赖喇嘛”（原文如此。实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喇嘛”。——编注）。在今天西藏的许多地方，甚至包括那些现在被印度称为已有的边境^②地方，印度因而与中国之间存在疆域之争，土地的名称都可追溯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的中国皇帝将这些土地赐予五世达赖喇嘛，又由他分给地方部落的首领。这位五世达赖喇嘛，可能是感觉到，与迷信的部落打交道需要某种地方的制裁，因而称自己具有“启迪心灵”的力量，即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化身，佛教传入前西藏的自然之神。他还有另一股“启迪心灵”的力量，既班禅额尔德尼，他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另一个面转世化为达赖喇嘛的“老师”。两大转世化身的神秘统一就此流传至今。

班禅额尔德尼的头衔及其世俗权力是第二位清朝皇帝赐予的，他的头衔结合了三种语言，“班”是梵语，意为“智慧”^③，“禅”是藏语，意为“伟大”，额尔德尼是蒙古语，意为“珠宝”，连起来为“智慧巨宝”。现世的班禅告诉我，他的权利与达赖喇嘛的相当，并不是“僚属”关系，中国的几任

① 严格讲皇帝指定了第五世赐予其“达赖喇嘛”的头衔，而在他之前的转世化身并没有这个称号。“达赖”是蒙古语，意为“海洋”，并有“智慧之洋”的含义。

② 被印度宣称为已有的“麦克马洪线”地区是五世达赖喇嘛统治过的地域。

③ 详见印度语“Pandit（梵学家）”。

皇帝都颁布过这道法令。然而，政治上的权力平行是很难维持的，实际上多少世纪以来，在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两人轮流掌权（原文如此。实际上是分而治之。——编注）。

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关系以及二人与中国皇帝的关系太复杂、太多变，很难概述。乾隆皇帝比较欣赏班禅，特为他在热河（Jehol）修了一座宫殿，就挨着皇帝自己的夏宫，每年夏天皇帝都会在班禅额尔德尼的进言和辅佐下，在夏宫内接受游牧民的进贡。十九世纪中叶，班禅额尔德尼再次成为西藏的掌权人，他派人前去向皇帝要一名“调查员”，调查拉萨摄政王谋害达赖灵童的案子，当时不少灵童未成年继位就遇害夭折。

20世纪，达赖喇嘛的统治占了上风，西方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达赖也统治着班禅的领地。这是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一位有能力的人——除五世达赖以外唯一真正施展政治权威的人——另一个原因那时正逢中国衰败时期，达赖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因此，他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的消息，并且杀害或流放了持不同意见的贵族和不支持“独立”的活佛。一九二三年，班禅额尔德尼被迫逃往内地，直到圆寂。现世班禅生于青海，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再次掌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二年前世班禅流放青海期间，达赖及其世俗班子噶厦侵占过班禅的领地。流传于西方的那种观点就源于此，这种观点尤其盛行于英国作家中，他们就认为达赖统治着班禅的领地。一九五九年班禅额尔德尼本人向我确认，达赖喇嘛任何一次占领他的地盘都是“暂时篡夺”，都未经过西藏世俗允许或法律批准，是不作数的。

噶厦是由一小撮贵族组成的内阁，内阁成员名为噶伦，他们组成了达赖喇嘛手下的世俗政府机构，这是经过乾隆皇帝授权的。与之相比，规模要小一点的，名为堪波利杰（kanpolije）的机构，经皇帝授权成为班禅领地上的内阁。数世纪以来，在这些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的那种复杂而多变的关系

现在基本互不相干了。我用了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喜饶嘉措（Shirob Jaltso）的话对达赖及其内阁进行概括。喜饶嘉措本人是藏族，在拉萨进行研究长达三十二年，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

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五世达赖喇嘛是第一位在政界崭露头角的达赖，康熙皇帝（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当政时期，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藏的首领……到了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批准噶厦为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就是这样由中国政府赐予的……而噶厦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

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就这样总结了西藏的历史。

在过去七百年里，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宣告从未得到过广大西藏人民的支持，也没得到过任何外国的承认。

* * *

西藏的现代史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算起，这是达赖喇嘛与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的日子。《十七条协议》肯定了西藏长期以来都属于中国，肯定了她现在又“回归祖国”的事实。英国人的渗透，还有藏川军阀混战那段时期，中国西藏的事实曾遭到各种质疑，真相被掩盖是可能的，然而，《十七条协议》澄清了这一切，西藏“自治”的性质也得到澄清。

无论达赖后来怎么说，他都需要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达成协议，这与北京需要中国统一是一样的。即使在中国衰败时期，日本占领了大部分中国，西藏还向国民党政府请示、寻求批复。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一九四九年宣告成立，显示出统一中国的力量。西藏此时必须明确自身与这个国家的关

系，否则将面临内战。英国曾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通过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促进“独立”的思想，但并不予以“担保”。^①

因此，一九五零年二月，年满十五岁的达赖喇嘛与其摄政亲英派及其大臣发生了争执并产生了分歧，于是决定派一名特使前往北京听取意见。该特使到北京，途经印度，由于不需要讨论的原因而停留在了新德里。年轻的达赖喇嘛被带到了靠近印度边境的亚东，准备必要时溜入印度。同时，藏军司令阿沛被派往藏东昌都，该地区离四川有一个月的路程，在那儿堵截待命进军西藏的解放军。

昌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域，因人口为藏族而被西藏地方政府称为属于西藏的这片土地处于川藏之间，被蒋介石划成一个新的省份名为西康。西藏军阀从四川军阀手中夺取了该地区，但却与昌都地方贵族陷入了争端。一九五零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出兵统一中国边疆，与阿沛率领的藏军相遇，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彻底击垮，部分藏军向解放军投诚，在昌都附近的几支藏军小分队压根没与解放军交火，不仅没有交火，而且一见如故。解放军并没有追击，而是就地安营扎寨长达八个月之久，以等待西藏与北京间的会谈。

藏军司令阿沛原以为这一败必死无疑，没想到解放军待他很好，向他耐心地讲解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阿沛听后认为值得派信差向在西藏另一头亚东地区的达赖喇嘛报告。

在亚东，当达赖喇嘛及其噶伦还在就今后的行动进行讨论时，就和外国代理人取得了联系，尤其是和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联系。后来达赖喇嘛在北京告诉人们，美国人要他到印度请求避难，并在那里向中国共产党宣战，到时美国人才予以资助。英国人则劝他回拉萨，因为只有拉萨是他行使权力的地

^① 托马斯在一九四九年西藏行之后所写的书中说过，在一九五零年五月给噶厦的信中作了更公开的表白，他说杜鲁门（Truman）总统不会承诺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这封信在北京展览过，作者曾亲眼见到过。

方，他们的理由是，“达赖喇嘛好比雪人，雪一旦消失，雪人就溶化了。达赖喇嘛在拉萨有权威，出了西藏好比出了雪地，就会溶化掉”。我这是间接听来的，但似乎合乎情理。

昌都战役结束了这些讨论。昌都战役失败后，达赖喇嘛听到了北京似乎要给少数民族好的政策，于是速命阿沛前往北京，谈判签署协议事宜。另外两名昌都随从与阿沛同往，还有两人也来到北京，他们是长时间逗留印度的那个代表团的成员，阿沛是本次谈判代表团的团长。

后来阿沛告诉我：“我一九五一年四月抵达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对新政策有所了解。谈判在友好气氛中进展迅速。我们签订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协议。六月初我起程回拉萨，因为骑马返回，所以八月底才抵达拉萨。我立刻向达赖喇嘛作了汇报，此时他已从亚东回到拉萨。接着我又向地方政府的全体僧俗官员做了汇报，协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达赖喇嘛得知协议签订的消息后才从亚东返回拉萨。听取了阿沛的全面汇报后，又和西藏地方上层官员讨论了近两个月后，他致电毛泽东，确认协议，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份简单的电文清楚地表明了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接管西藏并非国外普遍认为的“侵略”。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为这是侵略，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人民解放军到了昌都便按兵不动，一直等到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签订了协议，并承认了解放军是国家军队。八年后，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却说该协议是在“刺刀下被迫签订”的。不假，这与藏军兵败昌都连得起来，但是，胜利的解放军并没有乘胜挺进，而是驻扎昌都长达八个月之久，就是为了确保达赖喇嘛、噶厦以及“僧侣、民众”一致同意签订协议。达赖喇嘛致电北京：全体藏族人民“积极帮助”解放军进藏，把此说成“刺刀下被迫签订”是别有用心的。

读一读该协议，那些关于“主权”、“自治”之类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西藏对该协议的结论予以承认，即“中国是西藏的祖国”，接受北京新政府为中央政府。北京承认并阐明西藏的“自治”。这一阐明非常重要，因为“自治”含义很广。开始是英国，接着是印度，都试图把“自治”解释为“独立”，这种“独立”可以使外国享有特权。一九五一年的协议将自治定义为“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正如中国其他自治区——内蒙古、新疆和广西一样，所谓“自治区”指拥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宗教以及选举地方政府，处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选出代表出席全国人大，参与处理国事。“共同纲领”是社会主义的纲领。这样的自治绝非“独立”，也没有允许外国干涉的条件。

协议还阐明了地方政权的问题。“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西藏地方政府通过达赖喇嘛和噶厦同意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向农奴制改革努力，他们尤其同意将藏军编入人民解放军，但此一直没有

做到。

北京履行协议了吗？西藏地方政府履行协议了吗？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发表讲话，对世界说，一九五一年协议是西藏不情愿而强行签订的，而北京很快就违背了这个协议。他没有列举所违背的具体条款，但人们似乎更需要一份翔实文件来说明一下他言过其实的问题。在西藏时依然是这位达赖喇嘛对协议及北京前八年的所作所为过分恭维，每逢国庆和其他周年纪念日，对协议的公正、友善，他都不止一次地欢呼叫好。他在一九五四年八一建军节贺词中说：“解放军部队全心全意地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西藏人民十分爱戴这支武装部队。”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自由平等的权力。”一九五四年去北京参加会议时，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赞美诗，并将这首诗献给了博爱寺，装裱后，一直挂在寺内最神圣的殿堂内。对神圣的“光辉事迹”，用了同样夸张的赞美造物主大梵天（Brahma）思想成就的诗歌辞藻。所以，要么是某种策略，达赖喇嘛撒谎八年，要么我觉得更像些，就是他自幼养成了附和“导师”思想的习惯，现在换了“导师”（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节里结合达赖喇嘛出逃做进一步说明）。

我在西藏遇到的班禅额尔德尼、阿沛，以及其他人都说，北京谨慎地履行了协议的内容，然而，噶厦没有。

阿沛告诉我：“地方政府和以往一样掌握着政权，各级官员的职务也保持不变。西藏境内没有一座寺院遭到破坏。”^①

一九五五年应西藏的要求，中国人大废除了西康建制。这一事端多发的地区，昌都战役就在这里爆发。并同意把昌都划入西藏，但该地区的统治权不移交给噶厦，因为昌都的贵族和民众都反对这么做。已经开始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到时的西

^① 这是指三月叛乱之前，三月叛乱时一些寺院被损坏，但后由北京中央政府修复。

藏将比 20 世纪任何时期的都大、都统一。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该会主席，班禅任第一副主席，昌都活佛任第二副主席，还有五十五名委员，他们代表西藏各地区。为了筹委会开展工作，还在拉萨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虽然筹委会具有建立更大更统一西藏的潜在力量，但由于噶厦的破坏，筹委会的工作没有进展。

班禅额尔德尼向我列举了北京给西藏生活带来的许多改善。和其他人一样，他专门列举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七年间修筑的三大公路，它们将西藏与中国其他省连接在一起，通四川、青海和新疆。这给全国都带来了好处，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络，尤其给西藏带来了好处。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纺织品、茶叶这类商品的价格都下降了一半。阿沛告诉我，为了修筑公路，北京出“高价”买下私人土地，“这在西藏是前所未有的”。农民告诉我，解放军付给我们的筑路工资“非常优厚”，而这类工作以前是无偿的，是强迫农奴干的。前农奴告诉我，他们筑路挣到的工资都可以买一头羊，甚至一头力畜。

班禅说，“整个改革都因噶厦而推迟，然而，变化仍然不小”。他列举了给拉萨和日喀则供电的发电厂、新建医院、学校、试验农场，给农民的无息良种贷款，还有赠送给他们的数千把改良农具。他承认这些改革都遇到了来自噶厦的阻挠，诸如不愿意把土地卖给农场；捏造谣言激起民众对抗汉人开办的医院和学校；种粮一经贵族之手就被克扣，换成从他们库底翻出的陈粮发放给民众；赠送给民众的改良农具被搁置在仓库里，借口是“土壤会中铁毒”。

班禅说：“经济和社会制度没有改变，农奴制一如既往。”所以说，整个改革被延误或遭受挫折，而这一切都是农奴主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指示下干的。

* * *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一在西藏具有数百年

历史的农奴制。但为了弄清一九五一年签署协议后八年里发生武力冲突及其最终导致一九五九年三月叛乱的原因，我必须在此勾勒一下西藏的经济社会基础。

西藏加昌都约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也是一百二十万，人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四分之三的人口聚居于南部，占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他们基本以农耕为业。剩下的四分之一人口居住在牧区，该区域主要在藏北，那里人们以放牧为业。僧侣、尼姑约有十二万（该数字得于拉萨，之前估计要多一些），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其中僧侣人数远高于尼姑，他们差不多占了西藏男性的五分之一。

几百年来，这些人口由两个基本阶层构成，即贵族和农奴。在拉萨，约百分之二是上层阶级，另外还有百分之三是他们的亲信、管家、看守、庄园主以及私人军队。

中产阶级实际不存在，小商人、手工艺人是农奴，他们给领主干活或向他们缴纳税金以获准做买卖或从事手工艺行业。大商人，那些垄断外贸的人，都出身于贵族家庭或寺院上层喇嘛。即使在寺院里，同样有贵族和农奴之分。上层贵族的儿子进了寺院有自己的房子，因为他们家在寺院就有房子。他们渐渐成为寺院的首领。农奴的儿子依然是农奴，正如在改革的控诉会上所说的那样，他们是“穿着袈裟的奴隶”。

西藏的所有土地和大多数牲畜都属于贵族阶层，约百分之二十四点三的土地直接归贵族家族所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归贵族所统治的寺院所有，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九归封建政府所有，这部分土地赠予政府官员或贵族，供他们剥削之用，以此作为政府在职人员的额外补贴。

一切权力都掌控在贵族手里，尤其掌控在最大的农奴主手中。这些使四大噶伦权势地位得到充分保障，他们构成了噶厦——这一世俗内阁政务会。这些还保障了住持以及寺院高僧的权力地位。政府组阁极其复杂，是一个政教合一统治的联合体。噶厦的法令只有加盖了达赖喇嘛秘书处的印章才能生效，

该秘书处是一个神职机构。每个政府职位都要由两人担任，即一僧一俗，其中僧侣具有优先权。

被封为神王的达赖喇嘛是一种象征，围绕他，也通过他，最大农奴主们为权力而争斗。从孩提起，达赖就习惯了被人崇拜，然而其行为却受到上层阶级的左右。他们通过等级制支配他，强迫其例行祷告、诵经、公开露面的公事，这些充斥了他的整个生活。多少世纪以来，上层阶级为寻求出任摄政的权力，甚至借教诲之机害死年幼的达赖喇嘛。

该复杂的政府机制只处理上层阶级的事务，一般的事务则由他们的管家直接处理。每个庄园和寺院都私设监狱，通常都修在地窖里，是一间粗糙的单人牢房，几乎没有光线，也不透气，根本没有盥洗设施，只有地板。庄园和寺院都私有鞭笞和拷打的刑具。头人有权砍掉违规或逃跑农奴的手、脚，可以挖出他们的眼睛，这些刑法都有专门的刑具，此外还有抽腿筋、割脚跟或使农奴变跛的酷刑。农奴连去给像噶厦那样的其他主子做农奴的请求都构成受惩处的罪过。农奴主一般不杀害农奴，但一旦杀了人，也不会有人起诉他们。“农奴主没少杀人”，娜珍这样告诉我。娜珍曾经是一名出逃的农奴，最后来到北京上学。

农奴的种类很复杂，并且会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一种农奴叫“差巴”（tsaiba），早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被列入持地契的农奴，他们身系土地，按习俗有权享有一小块土地，以向其主子出定额劳役的形式缴纳地租。另一种农奴叫“堆穷”（duichun），他们租种主子的土地，以部分收成抵地租。第三种农奴叫“朗生”（lantsam），他们没有土地，只能睡在牲口厩或主子房外的茅厕里。他们在田里当帮工，在主子家里当佣人，和奴隶没有两样。

无论是哪一种农奴，也不管是不是富裕起来了，都必须随时服从其主子的意愿。必须经主子允许，他们才能结婚或外出，哪怕只是短暂地离开也得向主子告假。农奴的婚姻很可能

因配偶被任意调往另一个庄园而被拆散。有土地“权”的农奴很可能被降格为奴隶，相反，奴隶也有可能升格，一切都取决于主子的意愿。习俗要求这样的变化要有一定的依据，但主子的行为并不受法律的约束。一个勤奋且有才能的农奴很可能被提升为管家或看守。同样可能的是他刚到手的牲畜财富会因主子的某个借口而全部失去，进而全家沦为乞丐。对一个农奴来说，富裕是不安全的。

农奴逃跑频繁发生，他们常常会被武装家丁抓住并交还给主子，接下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从受刑到致残，甚至致死。即使逃到西藏的边远地区，他们发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认主子，许多堆穷就是这种类型的农奴。常常为了使自己的处境合法化，获得安全感，他们要向原主子缴税，以获得在新地方生活和受剥削的权利。

许多前农奴都告诉我：“没有主子，农奴就无法生存下去，什么人都可以把你当非法者抓起来，除非你有一个合法的主子。”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于一九五一年协议签订后，并获得该社会的“一致同意”后，在北京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章

三月叛乱

叛乱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中旬在拉萨爆发。稍后，被击败的叛乱分子裹挟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此间国际舆论将打击叛乱渲染为野蛮镇压西藏。一支势不可挡的中国军队被描绘了出来——一家报纸登出，成百上千家报纸转载——“西藏国”遭到了大屠杀，“五万大军分布在西藏原野上搜寻神王”。

我离开北京前就知道此纯属无稽之谈。阿沛早就告诉我压根没打算扣留达赖喇嘛，因为“试图将他从叛匪手里夺回来势必殃及其性命”。北京对达赖喇嘛离开前往印度完全持漠视的态度，此便证实了这一点。人们似乎感觉到他不在会使未来的改革更容易。

我在拉萨得知，武装叛乱分子的总数估计有两万人，且大多数都聚集在拉萨和山南两地，而当时在发生叛乱的这两个地区的解放军部队的总人数不过五千人，尤其在拉萨一地，只有十个连的步兵，其中两个连一直是预备役，还有一个炮兵团。据透露，该团约有一千五百人。而这些兵力足以在四十七小时内打败约七千名武装叛乱分子。

西方报纸没有报道伤亡人数，只是说“大批屠杀者”已在八月份撤离，拉萨总医院只有六十名受伤的叛乱分子，除了那

些可以从野战医院走回家的，该医院经手处理了所有参加叛乱的伤亡人员，后来在一次与军队领导人相聚的私人宴会上，我得知拉萨的伤亡人数可能达到六百。这个数字似乎被城市的总体面貌所证实，城里一些在战斗中毁坏的建筑正在修复中，市民们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说战斗中被杀的人只是极个别的，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情绪。

平息叛乱的胜利对未来而言，其重要性远非战斗的规模或伤亡的人数能表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厦（kasha）由四大噶伦（kaloon）组成，四大噶伦领导了叛乱，然后逃往印度，这使北京从一九五一年的誓言中解脱了出来，北京曾发誓决不变动西藏的政治体制。西藏有六百四十二个贵族、两千一百三十六座寺庙，其中的百分之七十都加入了叛军，但这并不能证明参与叛匪的人数超过两万，其中五成都不情愿参加。曾在藏族人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已经崩溃。从领导叛乱到叛乱被平息，随着农奴主头目的分裂和出逃印度，迅速废除农奴制的道路被打通了，叛乱的平息成为历史上的分水岭——一道一千多年农奴制与未来社会的分水岭，西藏在这个未来社会中将走向社会主义。

这样看来，这场叛乱并非什么“民族冲突”，而是一场主宰不了奴仆的农奴主的叛乱。假如这场叛乱发展成为一场内战，以至于最终拉进了外国势力的干涉，打成了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争，这显然是叛乱分子想要的。然而，这场叛乱没能演变成为那场内战，这是因为北京的战略不仅仅建立在武力上，而且建立在周密的政治策划上，尤其是一九五一年协议签订后的八年里，北京以行动赢得了西藏人民的支持。

* * *

在一个农奴制成为生活方式已有上千年历史的社会里，农奴主统治者竟然于一九五一年同意在北京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进入长期斗争的阶段显然已成定局。双方对这一点从一

开始就绝对心照不宣了，然而，北京的共产党和西藏的农奴主还是都同意签订一九五一年的协议，而且达赖喇嘛专门致电毛泽东，西藏“官方、僧侣和人民大众”一致拥护签订协议，双方都有理由推迟斗争，都指望时间会带来改变。

西藏贵族统治阶层知道其军队在昌都战败，但却通过签署协议赢得继续把持西藏的政权，协议中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贵族们指望通过控制西藏政权、寺院以及民众来避免或拖延改革，西藏民众作为农奴、奴隶，从肉体到精神，向来为贵族所拥有。他们为争取时间而拖延，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会改变主意，或会腐化变质，抑或外国势力会掀起反华运动，至少会赢得他们对西藏叛乱的武力支持，贵族们为此立即着手工作。

北京也需要时间。人民解放军虽然打败了藏军，但并没有“赢得西藏”。北京首先使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祖国”的一部分，然后赢得以“国家军队”的名义驻扎中印、中尼边境的权利，这在当时至关重要，因为一九五一年美国军队在攻打朝鲜，割据台湾，还威胁要打到印度支那，同时，华盛顿与英国如出一辙，也提出“西藏独立”的问题，只是英国提出此问题已好几十年，美国想以这种手段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对北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用西藏人的支持确保中国领土的完整。因此，北京把西藏改革推迟了若干年，同时对西藏贵族加以约束，并使其最终走向改革。

北京深知农奴主贵族憎恨任何改革农奴制的思想，知道他们很难想象什么是社会主义，也知道就连那些挨打挨饿的农奴对汉人也必定持怀疑态度，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加之，宗教信仰让他们相信农奴的苦难是命中注定，即他们的命运是由前世罪孽决定的，因此，要以忍耐修得来世的好命。西藏农奴不敢与贵族同坐一间房，路上相遇也不敢对视，他们做梦也想不

出什么是“自由”。北京期望用政治和经济措施慢慢地将西藏纳入祖国的大家庭，并且期望至少赢得部分贵族，让他们了解，即使是贵族，农奴制也无法提供好的生活，使他们明白最好将庄园卖给中央政府的道理。然而，北京最期望的还是通过让西藏人接触祖国大家庭的蓬勃生活，哪怕是远距离的接触，渐渐地在农奴的灵魂深处产生影响，发生变化。

因此，就是从签订那个“一致拥护”的一九五一年协议起，双方都为赢得西藏人的忠诚而开始了对未来那场冲突的准备。北京以解放军的行动开始了这一准备，修筑几大公路，将西藏与祖国内地连接起来，此举不仅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且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建医院，盖学校，办农场，向农民发放无息种子贷款，赠送改良农具。农奴主则以反动活动开始了这一准备，他们煽动反汉情绪，造谣汉人医院毒死人，汉人学校蛊惑人的灵魂；他们扣留修建试验农场的土地，甚至收回筑路的土地。当这些活动都没能阻止缓慢的改革进程时，农奴主转向阴谋策划叛乱的活动。先是在临近省份的藏区搞叛乱，最后在拉萨本地搞叛乱。

甚至在昌都战役前，北京就开始实施其战略主张了，对待命进藏的四川解放军作了指示。在实施争取敌对或中立人口的战略中，解放军积累了长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们赢得了全中国。一九五零年解放军驻四川部队接到指示，要求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不仅仅是一般的平等和友善，在西藏还必须是特别的平等和友善。陆军上尉杨给我讲解了这一指示，那些年月他从四川调到拉萨。

“第一步是接近当地人，为此，我们学会了足够的藏语，还学会了对待不同社会阶层所应用的敬语，掌握了途经寺庙时的专门通过方式以及尊重西藏宗教的方式。我们决不能进入任何信教区，不能进入寺院，也不能进入藏族家里的特殊房间或角落，因为那些地方供奉着宗教形象”。“最严格的纪律”是严禁在西藏任何地方狩猎或捕鱼，这是非常苛刻的，因为在漫

长的道路上，食物稀缺，运输困难，有大好的山河，丰富的猎物和鱼类，解放军却被严禁碰触，就因为西藏宗教禁止杀生。不过活佛可以躲过此种戒律，解放军可就躲不过了。

杨连长说：“这种纪律很严格但很起作用。我们人没到，名声却传扬出去了，我们甚至被叫作‘菩萨兵’。部分藏军在昌都战役中之所以向我们投诚，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尊重他们的信仰。”

北京战略的第二步是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按兵不动长达八个月，等待一九五一年协议的签署。因为有了这个协议，部队进军西藏，最终挺进拉萨的途中，就能够在每个居民点停留，向人们解释他们是“国家的军队”，是达赖喇嘛与北京签署的协议上写明的。他们用行动告诉民众，这支军队比以往任何军队都更替人民着想，不仅仅杜绝强暴和掠夺，而且给服差役者付费，而服差役在西藏历来都是强制性的，这是政府明文规定的。解放军不问，也不知道所支付的役畜和搬运费是否真的能到干活的农奴手上，也不打听这种费用是否被农奴主自己拿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让农奴知道解放军支付差役费，工资的概念就此产生，此打破了强制性差役的旧习俗。

解放军一到拉萨，噶厦明里设宴欢迎，暗里的破坏活动也立即开始了。部队烧饭的燃油根本搞不到。想自种粮食，虽然遍野荒地，噶厦却设置障碍，使部队很难买到或租到土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解放军得到的是贫瘠的土地，到了第三年才种出自己的蔬菜，却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土地自种粮食，而是历经周折从其他省份运粮到西藏。

北京战略的第三步是修筑三大公路，从军事、政治、经济上把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这给藏族人所带来的好处我在前一章节里已经提到过，诸如改善交通，随之而来的好处就是消费品价格的降低，像茶叶和纺织品的价格都降低了；给农奴付工资。我还提到过盖学校，建医院，办试验农场，发放种子贷款和农具。所有这些新的发展都遭到了噶厦的破坏。两

所小学从未招满过学生；试验农场历尽艰难才得到了土地；医院遭到谣言的中伤，说“汉人医生毒死人”；种子贷款常常从农民转手到了农奴主的手里；以“铁毁土”为借口，农具被搁置在仓库内。尽管改革的进程如此缓慢，但正如班禅额尔德尼告诉我的那样，“民众的觉悟提高了”。

公开对抗北京的活动开始于一九五三年，当时一个名为鲁康娃的噶伦带头要求将解放军和汉人驱逐出西藏，达赖喇嘛撤了鲁康娃的职，鲁康娃随即去了印度，在那儿的噶伦堡（Kalimpong）与外国势力开展联络，准备未来叛乱，同时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获得空投援助以及印度的没有透露数量的物资援助。一九五四年达赖喇嘛和班禅作为人大代表访问了北京。他俩还走访了中国的不同地区。达赖对“祖国的伟大成就”表示十分高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那首浮夸的“致毛泽东的赞美诗”，把毛泽东的事迹与“创造神大梵天（Brahma）”作对比。一九五五年初，达赖沿新修的川藏公路返回拉萨的途中，其随员在川西下车，到那里的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叛乱。

这场“康定叛乱”爆发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之交的冬季，以暗杀政府官员和汉族居民为手段，当时康定没有新的地方武装，解放军部队一到，很轻易地就将叛乱镇压了下去，但被打败的叛匪逃进了深山，最后进入了昌都。估计武装叛匪的人数最多时达一万人。那里曾经是川藏军阀混战的地区，因此，武器很易搞到，至少留下了五万支枪，几乎不需要通过蒋介石空投美国武器，要不是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电台几乎没有用。川昌叛乱于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平息”，但仍残留有沦为“土匪”的小股孤立的叛乱分子，只要有寺院的供养，他们就能维持，只有待地方人民政府成立后才能彻底清除。大部分被打败的叛乱分子进入了西藏，靠掠夺农民为生，当然也靠噶厦的纵容，最后都参加了拉萨叛乱。他们是康巴人（Khampas），或西康（Sikang）军，擅骑，野蛮、放荡不羁、嗜好抢掠。

规模较小、时候稍晚的一次叛乱于一九五八年春在青海和甘肃的藏区爆发，是由寺院及牧场主领导的旨在反对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的叛乱。在此阶段，“民主改革”其实仅停留在减少租金，降低寺院的高利贷，移交寺院开办的法庭和监狱的权利。这次叛乱平息后，“民主改革”开始深入，僧人被授予了“人身自由”，于是大多数僧人离开寺院，回家务农。

在平息这些叛乱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相关的文件，上面显示发自拉萨，内容是通过寺院发动一场反共“圣战”。在死亡的叛乱分子身上和寺院佛像背后都发现了诅咒中共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把叛乱与印度的印刷设施联系起来。一个名为“四水六岗”的组织出现了，其在拉萨立足后就上书达赖喇嘛，声称要从事募集资金的活动。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恐怖组织，从事破坏活动，为西藏叛乱联络空投。

叛乱于一九五八年转入西藏本地，空投美式武器从山南开始，那是位于拉萨东南的一个地区，那里地域辽阔，以“西藏粮仓”著称，其漫长的边境线与印度接壤，便于联络国外关系，而且可以满足军队的口粮供给。山南的武装叛乱分子加上康巴人，他们开始袭击解放军的木材运输队，那些木材是运往拉萨用来新建发电厂的。投诉纷纷涌向解放军司令部，控告叛乱分子恐吓百姓，掠夺、强暴藏族民众。

“所有这样的投诉、控告都提交给了噶厦，因为它是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当地的执法和维护秩序”，解放军官员都这么告诉我，“噶厦总是答应处理这些案子，实际上却纵容叛乱分子的所作所为”。

西藏上层阶级把这种诚心诚意地尊重噶厦的做法看作是北京的软弱可欺。一九五九年二月，西藏传召大法会，庆典历时三周，接着是藏历新年（原文如此。藏历新年实在传召法会前。——编注），他们利用朝圣者从西藏四面八方涌入拉萨的时机，更大胆地进行挑衅。噶厦一名成员竟然要求占领中央政府国贸处的权利，当遭到拒绝时，藏军便架起了机枪，瞄准共

产党的司令部。公开叛乱的阶段就此界定。

叛乱于三月十日上午开始。达赖喇嘛原定这天去解放军指挥部看演出，摄像师、录音师以及各级领导人已在贵宾礼堂外等候，一辆洒水车给达赖喇嘛轿车将经过的道路喷水降尘，他没有来，来了一名无线电技师，技师结结巴巴地说：“反动分子在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把他抓起来了，他们杀害进步人士，正在公园里野餐的人们都在东躲西藏呢。”

路上来了一些荷枪实弹、骑马的西藏人，他们牵着一匹马，上面横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被害者正是著名进步贵族，以此吓唬老百姓。一名在政府办公厅工作的藏族雇员跳起来去拿半自动机枪，大喊：“我们无法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我要跟他们拼了。”

一位汉族说，“不行，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边说边使劲拦住他的藏族同志。强制性的纪律是即定方针，这种纪律需要维持十几天。

来自噶厦和三大寺院的叛乱头目于十日在罗布林卡召集会议，宣布西藏从中国“独立”，并电告印度的噶伦堡，要求将此信传播出去。接下来的十天里拉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叛乱分子以死要挟，四处抓兵。他们在罗布林卡内和市内的山上挖防御工事。他们怀着反穆斯林的民族主义的狂怒情绪捣毁清真寺。十五日接到报告，叛乱分子强奸了大昭寺附近尼姑庵里的尼姑，他们的其他暴行也纷纷报给解放军，解放军照常提交给噶厦，要求噶厦采取措施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在营地按兵不动，紧闭院门。他们边修筑掩体，边等待北京的命令。中央政府设在拉萨的近十处的民政单位——国营贸易处、运输公司、邮局、银行、学校，还有西藏工委——都关上了各自的院门，开始在院内修筑掩体。没有哪个文职人员要求部队帮助或寻求解放军的庇护。他们拥有武器，人员也接受了训练，足以做好第一道防卫。藏族职工要求准许他们携家属从城里搬进单位的院子里，因为城里叛乱分子

沿街施暴。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纷纷把家搬进了大院，在礼堂和办公楼内安顿下来。

十六日这天，一位摄影记者乘军用小车在城里转了一圈，拍下了叛乱分子示威游行、挖防御工事的照片，还拍下一位因帮助解放军运输被挖了双眼的男子，另一位因同样的原因被割掉了鼻子。他们躺在担架上，被送往医院。医院基本上关闭了门诊，日常门诊病人在这个阶段达七百至一千人次，但想就诊的人们现无法通过叛乱分子控制的街区。

在这些日子里，军区政委谭冠山（Tan Kuan-san）给住在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写过三封信，达赖给谭也回复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由达赖喇嘛的诵经师、活佛嘉措林（Jaltsolin，音译）送出来的，等他再返回达赖喇嘛身边时就被叛乱分子抓了。剩下的两封信是阿沛几经周折，通过达赖喇嘛贴身侍从拿到的。达赖喇嘛到印度后才得知三封回信的情况。这些信表白了达赖违心地被叛乱分子扣留在了罗布林卡，表述他愤怒、沮丧、举棋不定，他一会儿想传旨将“反动分子抓起来”，一会儿又想“我有了可信的人就去密见”谭政委。在达赖喇嘛被监禁的日子里，见过他的人后来说，达赖喇嘛与叛乱分子发生争执，拒绝去印度，有一段时间还以绝食相要挟。

十八日传来了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消息，据说“他昨天夜里被叛乱分子绑架了”。他离去的确切情况仍然是个谜，但人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和叛乱分子在山南待了好几天，直到拉萨叛乱告败才离开，跟他们去了印度。后来在印度，他说出走是自愿的。达赖喇嘛是否领导了叛乱的全过程，尼赫鲁（Nehru）接见他时，好像是这么推断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达赖送出去给谭政委的三封信也是蓄意编造的。而在我看来，事实更像是这样，达赖举棋不定，本希望他的神灵能够调和这场纷争，一看不成才顺从了裹胁，在去印度的路上接受了现实，这一切外界是不得而知的，也许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知道。在战斗结束前，达赖就离开了拉萨，再也没有回来过。

接下来的几个月，以达赖喇嘛的名义从印度发表了好几篇反华声明。这些声明的执笔人有达赖的随从反动农奴主，也有他的兄长，他们与华盛顿和台湾的联系是难以隐瞒的。当然也有当着达赖喇嘛面起草的。反华最强烈的一篇声明发表于六月三十日，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用英文向国际社会公布的，达赖喇嘛出席了那次新闻发布会。声明公然抨击北京自一九五一年协议以来对西藏所做的一切，要求“独立”，谋求成立“大西藏”国，甚至拒绝直接和北京交涉，因为达赖不相信北京的话，只有通过第三国，可能指印度，来与北京进行交涉。此声明如此极端，以至于西方评论家这样评论道，达赖喇嘛“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做出不可能返回西藏的选择。

北京唯一的反应就是发表反击声明，同时对达赖喇嘛的言行持保留态度，因为达赖喇嘛就官方政策曾发表过几十篇赞美不绝的声明，所以北京坚持认为他之所以在发表令人遗憾的错误声明，是因为受控于一个罪恶的集团，不仅其信息来源受到控制，而且其行动也受到了约束。这个观点是班禅额尔德尼在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向我们记者团表达的。达赖喇嘛昔日在西藏的巨大威望因此而迅速衰落。达赖喇嘛在拉萨叛乱中究竟充当了怎样的领导和傀儡角色，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令我迷惑不解的倒不是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而是解放军在其营地按兵不动长达十天之久，从三月十日至二十日，任由叛乱分子在拉萨街头为非作歹，杀人逼兵，肆虐强暴，暗杀忠良，造谣中伤，为所欲为。我多次就此提问，当着解放军我再次问同样的问题，回答总是一致的：“噶厦依然是法定政府，拉萨人民的认识还没有统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始终是绝不挑起或扩大纷争，而是让敌人挑起并持续纷争，让全体民众充分认清究竟谁是犯法坏法的人，到那时我们再反击，民众就会站在我们这边，有了他们的支持，纷争就会被缩短，伤亡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就在那十天里，叛乱分子失去了拉萨民众。”

* * *

三月二十日黎明前，三点四十分，叛乱分子的大炮开始了全面攻击，布达拉宫、罗布林卡、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火光冲天，全城顿时枪声大作，炮火连天。院墙内的汉人全被惊醒，睁眼等到天亮。叛乱分子冲击运输公司和工委的院墙，被击退。对其他地方只用炮轰，人们都躲进了防空洞。藏族职工在问：“我们反击要待何时？难道我们的大炮都睡着了吗？”黎明前，一名汉族编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反动集团最终选择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上午十时^①，北京下达了命令，解放军开始反击，仅一个连便直取药王山。药王山的制高点，山势陡峭，叛乱分子在山上挖了战壕，山的两侧和山顶都布下大炮，而且有来自布达拉宫方向的炮火掩护。到下午一点三十分，药王山被收复。山上只有少数叛乱分子被击毙或被俘，大多数叛乱分子逃到山下。拿下这一制高点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这场战斗是整个冲突中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攻克此制高点便使整座拉萨城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下。该连队的指战员对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冲上去的。

付洛民（Fo Lo-min）说：“我是一排班长，带领三名战士冲上山顶，夺取了一间屋子，那里是叛乱分子的机枪窝点。山坡陡峭，我们四人都装备有自动步枪，只用了四分钟就冲到山顶。我腿这儿挨了一枪，但没有停止指挥，直到其他班组冲上来，掩护部队前进。我们冲上山顶后，夺取了那挺机枪，是英国制造的。山上叛乱分子弃枪而逃。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叛乱分子好像都是被迫参战的。”付班长说这是他们之所以快速取胜的原因所在，“当然，还有司令部的正确指挥，藏族民众的有力支持。部队冲锋在前，藏族老乡紧随其后，为我们送饭送菜”。

^① 北京时间，看拉萨的太阳不过上午八时。

重机枪排的机枪手张说：“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攻打山头的部队。重机枪是强火力，用它我们扫除了叛乱分子的火力点。开始我们在山脚下掩护，山顶被攻克后，便在山顶作守卫。当地藏族百姓给予我们很大支持，为了消灭叛匪，他们帮助我们搬运装备。”

拿下药王山后，解放军借助有利地势控制了罗布林卡，那里驻扎着叛军的主力部队，有三千名叛乱分子。新增连向罗布林卡进军，当晚七时将其拿下，更多的叛乱分子被俘，只有少数被杀或逃跑。黄昏时分，解放军在药王山、罗布林卡部署好守卫，于当晚调遣大部队围攻拉萨城区。

二十一日全天解放军都在拉萨围歼叛乱团伙，有些叛军很快投降，有些逃跑，还有些躲进了百姓的屋里，只有少数顽固分子仍在抵抗。那一天打得最艰苦的一场战斗在小昭寺（Ramogia），叛军钻进寺中的碉堡进行抵抗，解放军派谈判小组入寺进行和谈，叛军杀害了几名谈判者之后，战斗进入白热化，数小时后小昭寺被攻克，寺院前围墙和寺顶的一个角遭损坏。

夜幕降临，只剩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中的叛军在抵抗，解放军因此改用政治攻势。始终忠诚的两名噶伦——阿沛和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ewang-retzen）上前用麦克风喊话，呼吁叛军投降，如果投降，会保证他们的性命。叛军就此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九时，他们举着双手走了出来。摄像师已守候在场，拍下了投降者的照片。

拉萨的叛乱就这样在四十七小时内平息了。拉萨部队首长告诉我们，“接下来的两周，拉萨方圆三十英里，部队一边开始拉网式搜捕，一边歼灭山里的叛匪。与此同时，拉萨民众目睹了我军不杀俘虏的事实，纷纷交出了躲在他们屋里的叛军，开导他们出来投诚。截至四月五日，我们清点叛军人数五千六，其中，有些被杀，多数被俘，估计约有一千四百人逃跑；缴获七十九门大炮，两万发炮弹，一万零三百九十五支步枪和

上千万发的子弹火药！武器产自各个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的，甚至还有沙俄时期的老式武器”。

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噶伦领导了叛乱，其中三人把达赖喇嘛带出了拉萨，尽管如此，三月二十八日之前，噶厦仍被视为西藏地方的法定政府。叛乱失败后，对三大噶伦来说，带着达赖喇嘛返回还是来得及的，就说带达赖出走只是为了躲避战争，然后与北京言和。然而，他们依然如故，选择出走印度。三月二十八日北京国务院宣布废除西藏地方政府，指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接管地方政府的权力，此时离达赖在异国印度颁布法令还有两天。正是为了接管权力，一九五六年在一派喝彩声中筹委会成立，两位忠诚的噶伦成为筹委会成员，政府职能的行使因而从未间断过。

达赖喇嘛作为筹委会的主席虽然不在，但其在藏首席地位的名义仍得到保留。时任第一副主席的班禅额尔德尼被委任为代主席，“直到达赖喇嘛的回归”。班禅从其驻锡地日喀则致电中央接受委任，叛乱之灾还未殃及日喀则。他于四月五日下午乘轿车抵拉萨，受到军政教各界要员的欢迎，被迎进舍兹特（Shirtsit，音译）园的“新宫”，在他经过的一路，民众燃点松针，行五体投地礼。达赖喇嘛的宫殿布达拉和罗布林卡两周前还住满叛匪，此时已空无一人，沐浴在阳光之中。

对拉萨民众来说，班禅额尔德尼进入新宫，意味着秩序与和平的恢复。接着是班禅为期两周旋风般的上任活动，六号出席军政要员的宴会。七号在两位随行活佛的陪同下前往大、小昭寺参加参拜仪式，在每个寺庙拜佛诵经，还要告诉与会僧人：中央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宗教，而且会永远尊重。八号他主持了新地方政府筹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会上他宣布：“祖国各民族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改革。”第二天上午他乘飞机去兰州，然后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他是西藏代表团团长。

* * *

解放军现在从拉萨向其他地区进军，不仅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而且以西藏新地方政府的名义前往平息叛乱，新政府在班禅领导下宣布赞成改革。现在无论部队走到哪儿，都没收寺院和领主家藏的鞭具和刑具，将其转交给军管会下的县政府。解放军宣布在所有叛乱分子的领地上，当年的收成归播种者所有，免租免税。这不仅是促进播种的紧急措施，正如阿沛对我所说，而且“是一种没人退缩的措施”。解放军向遭叛匪掠夺的农民大量赠送粮种。

四月七、八日，解放军渡过拉萨东南部的雅鲁藏布江，进入叛匪的主要根据地，山南（Loka），这一大片长方形的粮食产地拥有十六条通往印度和不丹的给养路线，中段是不错的空投地，宽阔、湍急的江河在北部形成屏障，因此被叛匪定为“新首都”，以保障在全藏展开长期的游击战。后来发现这儿的叛军有一万两千人，几乎是拉萨的两倍。解放军在这里两周时间，与叛军交锋四十七战，消灭两千多叛军，其中有的被杀，有的受了伤，多数被俘，占领了四个主要乡镇。

发生在那段时间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叛军的素质。解放军部队剿匪，长时间行军，翻山越岭，多数士兵的双脚不是冻伤就是磨破，下士周和列兵闫因为严重脚伤而掉了队，结果遭遇一支百十来人的叛军。两人凭一挺半自动机枪、一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占据有利地势，叛军向他们进攻，仨领头的被击毙，还有一个受了伤，剩下的九十六人见状都跟着一个小头目投降了，交出了九十四匹马、二十九条步枪、十四把毛瑟枪和七十六把刺刀。两名战士算了一下，他俩“用了二十六发子弹”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和俘虏。他们命令败兵把武器驮上马，人靠边，由两名俘虏牵上马，跟他们一道去追赶大部队，让剩下的九十四名俘虏听从那名带头投降者的指挥，在原地等待他们回来。黎明时分，他们赶上了大部队，报告了战况，移交了战利品。

解放军派人随那两名牵马的俘虏回头找到了其他九十四名俘虏，他们整整等了一夜。这段插曲可见这支队伍士气之低落，他们是被迫当兵的农奴，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武器装备都是杂牌的，他们全都消极厌战，等待被人领导和有人给饭吃。

四月底，解放军在山南的剿匪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采取政治、军事齐上阵的攻势。乡镇张贴告示，召集民众会议，宣讲不杀俘虏，主动投降者甚至不坐牢，也不会因以往的不端行为而遭批斗，在恢复秩序中“立功”者有奖。九十六名俘虏中那名带头投降者获得了一百元的奖赏，奖励他“节约了战斗的成本”。动员城镇居民、农民，还有被俘叛匪本人进山，寻找其他叛匪，劝导他们投诚。

父亲进山领回自己的儿子，妻子领回自己的丈夫，农民把那些“受骗”的邻里乡亲集合在一起。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工作，山里的叛匪很可能毫无商量地首先开枪射击，也可能抢劫或殴打劝降者。然而，当地民众还是很有办法的，成功的事例也不少。对他们来说，领回那些有可能变成土匪的农民是件大事，一位名叫洛桑（Lobsam）的被俘叛军连长现在为解放军做事，他就主动进山，带回了一个叛军头目和他的四十三名手下。在另一个地方，当地七百名百姓参加了解放军的进山剿匪，他们当中一位七旬的老大妈这样说：“你们不远万里来帮我们消灭土匪，岂能等闲视之！”一个叫拉加里（Lajali）的地方，两名叛匪接近一个放羊的女孩，向她打听“解放军的情况”，女孩回答说，有好多的解放军，他们不杀俘虏，两名匪徒于是叫女孩带他们去见解放军，其中一人还交出了一把手枪和一把刺刀。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一个月内三千多人的一支叛军就解散了。

在汇报这个阶段的剿匪运动中，解放军估计山南有一万两千名叛军，其中两千名在第一阶段剿匪中解散，另外三千名在第二阶段剿匪中解散，还有七千名携亲戚、奴仆逃到印度，他们还带走了边境上支差的农民。

解放军分析道：“叛乱并不是为民族主义或宗教而战，而是一场农奴主为维持农奴制的战斗，只有少数头人顽固抵抗。叛军中百分之八十的叛匪不是被逼就是被骗入伍的。叛军内部矛盾重重，西藏人与康巴人之间，僧人与藏军之间都充满矛盾，这些矛盾甚至会引起火并。因此，叛军几乎没有战斗力可言，更谈不上团结，只有少数头目被杀或被俘，不用说整个队伍也就垮了。”

一千名解放军战士被分成二十个团组，分头组织那些说起来还在当农奴的农民，帮助他们做好实行改革的准备。最早管制罪犯的“法律秩序”小组现扩建成“农民协会”，专门落实“三大废除”，最终组建乡镇政府，因为此时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西藏代表正从北京返回，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

* * *

四月初，班禅额尔德尼离开拉萨赴北京的时候，拉萨地区医疗队还在救治伤员和被叛匪强奸的妇女；解放军向被叛匪抢劫的农民发放粮种；解放军部队摆渡雅鲁藏布江，开始山南的剿匪活动。六月中旬，班禅返回拉萨时，人们已在和平的环境里工作了，地里新种的庄稼已泛青，小学的入学率迅速上升，此时中央政府开办的学校已供不应求，拉萨民众自己建立起二十三所“特殊的学校”，各种年龄层次的人并肩学习。

两个月来，解放军、筹委会和工委分成了各种小组、团体，带着各自的使命，走遍西藏各地，而且收集到来自民众的情况、意见和要求。所到之处，人们都打听“改革何时开始啊”？各处的人都知道，没收鞭具、刑具只是改革的最早征兆，允诺收成归耕种者所有也只是最初的誓约兑现。通过法律废除农奴制正拭目以待。农奴、居民和庄园里的奴隶纷纷涌向各地的办事处，询问“我们该怎样开展改革啊？”上层人士也来打听，主动要求先在他们的庄园搞改革。有几个县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六月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回电，“我不在

的两个月里，城乡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为之感动，并说，“西藏人民正在当家做主”。

六月二十八日，在班禅主持下，西藏新地方政府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四月八日召开的，会上筹委会正式接管了原地方政府的权力，第二次会议将通过“民主改革”决议。这回可以充分考虑数百个新组建的“农民协会”的意见，他们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已做好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准备。社会各阶层的六百多人作为“观察者”出席了会议，他们来自全西藏。在他们中间，有一百名农奴，受新农民协会的委派，与贵族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这在西藏是史无前例的。

经过三周的讨论，提出了分成两个阶段开展民主改革的议题。第一个阶段是“三反双减”，即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农民协会在军管会监控下负责落实这两个法令。可以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和寺院商量减租减息，租息不得高于收成的百分之二十。那些参加叛乱的贵族和寺僧，他们土地的收成归耕种者所有，当年免收租子，也不纳税。同时，新的西藏地方政府将与忠诚的贵族和寺院商谈赎买其庄园、牲口、农具的事宜，留出他们自己选中的房屋和供自用的土地。这些工作完成后，民主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即给前农奴分田地。

七月十七日二次全体会议采纳了民主改革的提议，至此大会宣告结束。消息如同野火迅速燃遍“世界屋脊”，农牧民的集会上传颂着这一喜讯，市场新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播送着这一喜讯，拉萨街头，人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

* * *

进行改革的人员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为此北京准备了八年的时间。上万名藏族在中国其他省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他们大多是投奔解放军的农奴。其中三千四百人将返回协助改革，一千五百人于六月初先期抵达，其余的将于六月毕业后抵

达。邻近省份的藏族自治区域将有五百五十名藏族干部、公务员抽调进藏，其中的一百二十五人有足够的资历担任县长或区长的职务。在西藏本地，农奴中的积极分子也在迅速成长，虽然不少人还是文盲，但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们当中甚至还有喇嘛，这些喇嘛不仅参加了平叛，还帮助组建乡村级政府。

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人员队伍，对这片广阔的土地来说，这些人员还远远不足。然而，新人在不断成长和学习，八年前，西藏还没有这样的人员队伍。

五月底在北京我见到过第一批返藏的学生乘专列起程。我问从拉萨赶来接他们的人，叛乱前，他们能安全进藏吗？他摇头说：“他们待在我们办事处就安全，但一下乡就不安全了，因为农奴主的武装侍从会抓捕他们，他们很可能丢掉性命。”

“现在去，只要小心点，不会有安全问题。因为农奴主把所有武装侍从编入了叛军，叛军被打散，有的被俘，有的逃到印度，少数躲进了深山。现在农奴已觉悟，西藏民众会保护改革的”。

抚今追昔，从过去八年间开展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人们不难看出那八个年头是必要的。解放军小心谨慎地接近西藏，这在昌都战役前就开始赢得西藏民众了。解放军在昌都驻扎待命长达八个月之久，直到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部队才进入西藏；在漫长的进入拉萨的路上，解放军挨个走访聚居点，解释到户，公平交易，支付劳役费，开山修路，所筑三大公路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解放军建学校，盖医院，办农场，发放粮种贷款，赠送改良农具，尽管这些都遭到破坏，但却让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从而唤醒了他们，同时，也为开展改革培育了队伍。

在唤醒民众过程中，叛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拉萨爆发叛乱时，西藏民众还未选定立场。叛乱分子开展恐怖活动；汉族严守大院，耐心等待命令；解放军最后的反击以最小的生命

代价平息叛乱，恢复城市秩序；多数噶厦成员逃往印度，北京是在噶厦成员出逃后才授权筹委会，该筹委会是专门设置的政府机构，由其接管地方政权，尽管达赖喇嘛缺席，新政府依然确立其最高领导地位，同时委任班禅额尔德尼为代主席。这一切使西藏民众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由此可见，西藏民众从未在忠于北京还是拉萨之间被迫作过选择。解放军全体出动，遍及这块土地的各个角落，没收鞭具、刑具，不仅以北京的名义，而且也以拉萨的名义向农奴宣告，收成归耕种者所有。民众对忠于谁的问题从未有过分歧，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恨透了旧时的痛苦折磨，也知道他们现在怎样才能获得自由。

第五章

在拉萨参观

我们在拉萨的第一次出行是去罗布林卡参加一个周日野餐会。罗布林卡的意思是“宝贝园林”，达赖喇嘛的夏宫就修建在园内。我们得知他至少有三座宫殿在园内，一座旧宫，一座新宫，还有一座建在池塘上的游乐亭，取名为“赴极乐世界之舫”。与高耸但昏暗的布达拉宫相比，达赖更喜欢他的新宫，该宫建于一九五四与一九五五年间，三月叛乱初期，他就住在那里。三千武装叛乱分子，包括散漫的康巴人也住在那里，可见园内面积不小。打仗把他们都逐出了那里，所以我们做好了里面损坏的准备，损坏程度即使没有外国媒体说的那么大，但也不会太小。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十九名外国记者来到了罗布林卡，眼前一道高十英尺的墙壁是用大小合适的岩石垒砌的，洁净一新，一条漂亮的廊道沐浴在阳光之中。我们得知，罗布林卡是一个全封闭的园林，面积大约半平方英里，高墙环绕。叛乱分子曾在园林内扎营，沿围墙修筑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在战斗中被毁，外墙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损坏，但现已修复，所以看上去很新。

我们没来得及欣赏院墙、门廊的建筑，只见数百名夹道欢

迎的人们，他们大多是孩子和年轻人，手拿鲜花向我们欢呼。我们刚下车，他们就向我们跑过来，人人都向自己的选择对象献上一束花，我的手里迅速被塞满了七束花，大多是孩子送的。这群人好像都是中小学生，还有前农奴，他们身着假日盛装，有着鲜红的衣袖。不过，我还是看见了几名妇女，从衣着打扮、举止气质都表明她们是上层阶级。

我特别记得一位妇女，她发型典雅，容貌姣好，装束大方，衣着得体，举止端庄，表明她是一位贵族妇女，可能平生头一回混在农奴当中转林卡。她开头站在前排，但被人群推到了后排。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向我走过来，没有推挤。我感到她选中我是因为我是女人，而且上了年纪。她不会说我的语言，我也不会她的，她只顾把自己那束捆扎漂亮的鲜花交给我，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我们正在这里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公道评述在这里努力建设美好国家的事实，公道评述我们”。我很少这么感动过。

进了大门，有一条直通前方的道路，路的左边是一片宽敞的林园，树丛中可见人们成群结伴随着乡间音乐翩翩起舞。路的右边竖起一道黄色的围墙，墙高约六英尺，墙的远处依稀可见亮晶晶的屋顶，那些是达赖喇嘛侍从、卫兵、家教的住宅。沿着墙走了一段，我们来到一个门口，这道门直通达赖喇嘛的新宫，罗布林卡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新宫实际自成一体，其长度约一个街区，宽约半个街区，这里仅仅是罗布林卡的一小部分。

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进入了一个精心修整的花园，阳光沐浴下的园子分布着成荫的绿树，花坛中的鲜花绚丽夺目。这宫殿本身就如同好莱坞的梦中之宫，长方形乳灰色的建筑有两层楼高，褐色框子的窗户饰以许多金色的装置，一道淡黄色的围墙将这一切掩饰了起来，墙高足以隐私，却不挡周边的景色，近处的树林和远处的山脉依然可以尽收眼底。可以想见为自己修筑这园子的人有多么热爱它啊！在春暖花开三月的最初

几天里，达赖喇嘛从十三层高的布达拉宫搬到这里，四天后，叛乱开始，七天后，他被叛乱分子带出这里，并带出了拉萨，也许永远不再返回。他的仆人、园丁照常整理着房间，侍弄着花园，达赖喇嘛还会回来吗？

战斗没有打到新宫，因为它建在罗布林卡的深处，但叛乱分子在园林中扎营，不许达赖喇嘛与外界联络。战斗还没打响，就有两颗零星子弹先打进了宫，这是那些散漫的康巴人干的，其中一颗子弹打缺了一个房檐，另一颗打穿一扇窗户，当时达赖喇嘛正坐在房间里，子弹擦头而过，这使他大怒，对“康西军”极其反感，他曾将这种愤懑写进致谭冠三政委的信中，说以保护他为名的叛乱分子正在危及他的性命。被打坏的窗子和房檐都已修复。

宫殿里是一个迷宫，一楼由许多供保镖和仆人居住的昏暗狭小的房间组成，后来发现，这种类型是西藏封建式建筑的特点。宫殿楼上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起居区，冷清而华丽，从没有女人进入过他的卧室，连做清洁的女仆也没进入过，然而，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一戒律。这里的房间布置得更加俗丽，但明亮度和大小都不比楼下佣人房好多少。我发现装饰装修令人不安，不能真正给人愉悦，因为墙壁、地板、天花板的每一寸空间都装饰着雕刻、绘画和挂毯，颜色均很热烈，难以令人安静，到处都涂成大红、大黄和橘黄色。房间的亮度也不过窗口那么点儿大，正如从园子里看到的那样。有的房间还被垂挂物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光都透不进来，还有的房间窗子开在凹进去的墙壁上，这难以令人愉快。

他似乎住在一只又小又窄的宝物匣子里，被华丽包裹着，几乎没有空间，也没有光亮，他的寝室简直就是一个单人牢房，宽八英尺，长十英尺，有一张又矮又宽的镶嵌入墙的床，床上的铺盖依然保持着达赖喇嘛离开时的样子。床上雕有华丽的木刻，色彩也十分艳丽，上面折叠起来的毛毯却粗糙而笨重，毯子下面就铺了一条白棉花被，已有些脏了。他离开时虽

值三月，但依然寒冷，房间从色彩上已足够暖和，处处漆成黄色、金色和大红色，每一寸都装饰着佛像，它简直不是一间适宜休息的房间。

其他房间大多布置成不同的经堂或会议室，那间通往寝室的房间好像是“早读室”，他在那里晨起诵经。“早读室”并不大，可能宽、长各十二英尺，地上铺一块厚厚的橘黄色地毯，墙壁漆成红色，还贴有金色。具有特点的是一种低矮无靠背的垫子，和床差不多，不同的是在垫子的中前部配有一个雕刻漂亮的诵经台，这便于达赖喇嘛跪在垫子上诵经，近处摆了一张桌子，可放多余的手稿和书籍。房间有一整面墙上装了深深的玻璃柜，里面摆放着三尊寓意不同的神像，中间那尊是观音，也叫慈悲佛，她右边那个面目狰狞的神，是著名的“杜拉”（Dula，音译），西藏的保护神，左边那尊是“记载神”。三尊神没有哪个看起来快乐或友善，记载神是记载了罪孽还是罪过，我不得而知。桌上有一台苏造的现代收音机，是苏联大使送给北京的，一九五四年达赖去北京，北京转送给了他。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纯绿色的水罐，是为达赖上酥油茶用的，达赖没带走。

即使是这间房，光线也显得不好，就一扇窗户，挺别扭地开在一个角落上，靠窗处立着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一把填充的黄色小摇椅，椅子摆放得更别扭，是为了透过窗子观看山景，没有人会这么笨拙地摆放椅子，一定是达赖喇嘛为看远处的山峦才这么摆的。

在这间房里首次看到了拉萨别处没见到过的唯一的浴室，里面安装的设备也比较现代，上面标有“香克（SHANK）玻璃瓷”的字样，但没有配套设施，在罗布林卡我没有见到有自来水，拉萨其他地方也没有。据说已计划修建一座城市自来水厂，但还没开始施工。

沿宫殿北侧是一系列的诵经室，在第一间诵经室里再次见到矮垫和漆成金色的诵经台，室内每一寸墙壁都绘制着佛祖的

生平事迹，与该室相通的一间小房里盛放着密宗经典，接下来是这里唯一的大经堂，约二十五平方英尺，设有宝座和“主持仪式”的讲坛，室内同样装饰浓重，涂成大红和金色，厚重的挂毯是深红色的，有着程式化的边缘，墙壁上布满了神仙鬼怪，还有举止怪诞的人类，那个金色的宝座是康巴人以“四水六岗”名义赠送的，“四水六岗”已被证实为恐怖和破坏活动的地下组织。

我简单扫了一眼宫殿东头的房间，一间辩经堂，另外两间是接待政府高官或活佛的。这里厅堂的壁画是历史题材的，讲的是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经过，还有佛教传入西藏的



罗布林卡新修大门前的夹道欢迎

历史。我带着一种压抑感下了楼。从园子里看这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宫殿啊！我为此时走出它，来到阳光下而感到无比高兴！人类古老的罪孽和崇拜是多么的沉重啊！

出了新宫，沿这条路往前走，来到另一个院子，登上了“赴极乐世界之舫”，这是一个装饰华丽的夏日凉亭，修建在一座人造池塘上，池中水基本不流动。人们聚在这里用午餐，我被领到一个事先定好的，带水景的地方，那里已摆好糖果、糕点、水果和茶水，茶水有三种，浅色的中国茉莉花茶，深红色的奶茶，这和英国的相同，以及绿色的藏式“酥油茶”。我尝了一下酥油茶，不喜欢，但我承认它的营养价值，因为茶中有厚厚的稍带腐味的牦牛油，还有叫“糌粑”的炒熟的青稞面，把这种炒面与酥油茶搅和起来食用。我能接受的是发白的热茉莉花茶，这时主人又端上了酸奶和糌粑，还有几大碗牦牛油，按指导，我把这几种东西搅和在一起，称赞这有营养。我没有要青稞酒。



达赖喇嘛的夏宫，他弃宫而去。



罗布林卡内人们表演的古老的藏戏

当我把眼睛从阳光照耀的池塘移开，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是活佛嘉措林（Jaltsolin），他是达赖喇嘛的“侍读/诵经师”，正是他在叛乱期间把谭冠三将军的第一封信带给达赖的，之后就被叛乱分子关押起来。嘉措林是一个慈祥而端庄的人，见到他，我总想称呼他“主教”大人，该称呼的确表达了他的地位。他告诉我叛乱分子曾几次威胁他，但没有虐待他，所谓“关押”实际就是把他软禁在自己的住所里，该住所罗布林卡内，是他作为达赖喇嘛的“侍读/诵经师”专门分到的。叛乱分子试图强迫他与他们一道去印度，但他声称达赖喇嘛交给他一个需要在拉萨完成的任务，这才让他留下来。他待在自己的住所里直到战斗结束。

我问有没有印度达赖喇嘛的信儿，他说没有，我问他觉得达赖喇嘛会回来吗？

嘉措林回答：“按过去的愿望，他是愿意回来的，但他的处境很难，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走开。”

我问嘉措林有什么想对外国人说的，他想了一下，开始了一大段陈述，其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愿世界人民热爱和平，没有压迫”。接着他特别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西藏这里，有人曾利用宗教剥削他人，活佛想的是如何谋取更多的土地、农奴和占有更多的财宝，这与佛教教义相



在阿沛夫人打算自留的住所拜访她

悖。大寺院压迫小寺院，上层喇嘛压迫穷困僧人，这不是宗教自由，我本人不喜欢这样，过去就不喜欢，据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他也不喜欢这一切。我们现在渐渐明白了只有废除了剥削制，才能真正遵循释迦牟尼的教义，是共产党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宗教自由，因为如此，我现在能够为人们服务了，可以遵循真正的佛教教义了，我为此而感到万分高兴……”

“告诉美国人民，西藏人民已经得到完全的解放，现正向幸福迈进。”

我告诉活佛，不仅仅是在西藏，在我所知道的各个地方，有钱有势的人都曾利用宗教压迫人民，同时，在各地也有不少宗教人士，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服务于人民，我提到一些我所认识的这样的美国人，嘉措林听了显得很高兴。

离开“赴极乐世界之舫”，在公园里漫步，想找到唱“藏戏”的，处处可见成群结伴的人们，他们在树下，或在林间空地上，跳着各种各样的民间舞蹈。他们告诉我，过去达赖喇嘛每年只对公众开放一次罗布林卡，是逢（藏历）六月的一个节日，如今罗布林卡可能会更经常地对公众开放。新宫则不对外开放，非达赖喇嘛的私人客人不得入内，而我们是进入新宫的第一批外来者。然而，就在我们结束西藏行之前，新宫也不定期地对外开放了。政府当局似乎在处理这样的事务方面摸索方法，检验大众的需求。

穿过公园，来到一片空地上，这里用一块白色大篷布遮住直射的阳光，篷布用绳子绑在树木上，在远处摇摆，这种方式是我准备了解的西藏的风俗习惯。顶着阳光，篷布上绣制的“吉祥符”黑得很显眼，因为是双层的。好几百人的观众围坐在这片空地的地上，我们荣幸地得到了一个有椅子的地方，这里不仅晒不着太阳，而且有松柏的景色，还能观赏到远处的蓝天和山峦。

群舞表演者在高高的篷布下临时搭建的戏台上旋转，他们头戴心形面具，身着黑斑纹的戏装，踏着狂野的舞步，给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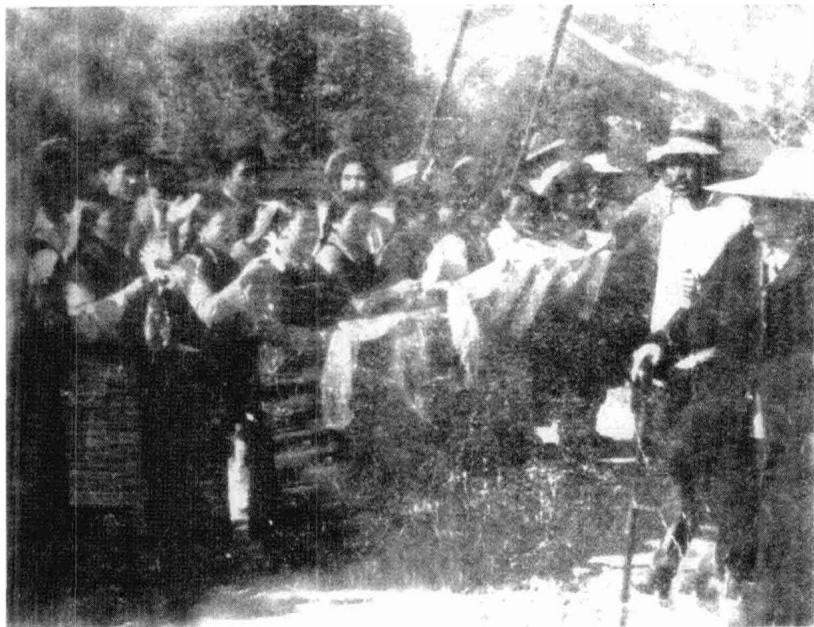
印象特凶悍，我还以为他们在“跳神”，这是西方术语，我没发现西藏使用这个术语。后来才得知，这是一出反映藏王松赞干布向文成公主求婚的戏，舞蹈者都是宫廷演员，紧随其后登场的是一群身着黄丝袍、头戴大红帽的表演者，他们的舞步同样狂放不羁，扮演藏王的侍从，正准备前往唐朝都城长安。藏王本人也是其中的表演者，人们可从其所持的“权杖”识别他，那是一根长长的魔杖，顶端带一个音匣子，匣子发出小小的声响。藏王与身着奇异戏装的大臣的舞蹈眨眼间混入了另一场剧情，一千五百英里之外的大唐朝廷呈现眼前。

唐朝皇帝是我在舞台上见过的装扮最难看的一个，那位公主也是，两人都戴着巨大的头饰，上面用线扎起来的纸花突出去，足有他们的四个头大。在皇上和公主出场前，许多国家的特使已出场，他们专程前来向文成公主求婚，无疑都是冲着公主的美貌而来。印度求婚者携一群起舞的苦行僧到来，还有当今时代已无从知晓的各种部落的人马，他们都是来求亲的。松赞干布在求亲的应试中成绩最优异，终于，金佛像被虔诚地放上了轿子，由文成公主相伴随，踏上前往拉萨的漫长旅程，全程一千五百英里。在一群欢蹦乱跳的牦牛簇拥下，这对夫妇在隆隆的鼓声中退下舞台。每头牦牛由两人扮演，一人扮牛头，一人扮牛尾，两人顶一张牦牛皮。因为扮牛尾的人看不见外面，在为金佛和公主双重收获而欢腾跳跃时，有的牦牛的前腿和后腿分了家，不停地在观众面前打架，匆忙地退下场去。

这是一场富于活力的表演，是西藏最古老剧目之一，也是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剧目之一，由拉萨一流的专业剧团演出。

* * *

第二天，我们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办公楼里拜访了阿沛·阿旺晋美，人们通常称他阿沛。一座富丽堂皇的四层楼建筑，有着西藏传统建筑的金顶和屋檐，是为筹备委员会修建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公园内，正对着布达拉宫。



在拉萨参观

阿沛，这位筹委会的秘书长，今后西藏的行政长官，在一间大大的会客厅里接见了我们，厅内深黄色的地毯确立了会见的基调。从窗户望出去，可见高耸碧绿的群山，还有所有窗台上摆放的盆栽植物。一面墙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另一面是中国地图，第三面墙上是一面巨幅的红旗，上面书有藏文。

阿沛本人就是一名贵族，拥有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两千名农奴，同时他又是一个即将废除农奴制政府的行政长官，我们向他提问，将以怎样的方式让这种变化出现，贵族对此持何种态度。他也详细介绍了前噶厦是怎样阻挠一九五一年协议的，并且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自己庄园内实行改革的。

阿沛说，百分之三十的贵族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叛乱，是进步派，他们认识到了农奴制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为了西藏的未来，必须废止农奴制。中央政府在其提案中作了非同寻常的周密安排，提出赎买忠诚贵族的财产，而非没收，“进步

贵族”因而对改革持基本支持的态度。对叛乱分子的财产实行没收，但此并非意味没收全部财产。财产所有权是复杂的，一个家庭财产可能属于好几个兄弟及其子女，其中可能只有一名参加了叛乱，在那种情况下，只没收参加叛乱者的那份财产，然而，清理账目是要花时间的。

即使是进步贵族，依然有难处和疑虑，地方政府在寻求缓解这种疑虑，降低这种难处的办法，这些主要涉及改革后期的问题，贵族们担心他们能得到多少补偿的问题。地方政府仍处于通过委员会做决定的过程中，而贵族本身是委员会的成员。中央政府正在为赎买基金作准备，大约要调拨一个多亿美金的资金。

对第一阶段的改革，进步贵族的意见已基本统一。在这一阶段，地租、利率大幅降低。他们认识到西藏这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已远离当今世界的习俗，是西藏进步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今年地租不会超过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二。这使贵族总收入锐减，但这种损失将以两种方式得以平衡，第一，解除噶厦曾经赋予贵族的重税和劳役，这些沉重的负担又由贵族转嫁给农奴。封建政府曾经极其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第二，如今都是由中央政府供给军队，支付政府运输费，甚至支付西藏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开销，所以要求贵族偿付的税金已大幅降低。地方政府本身的组建更讲求实效，铲除贪污腐化，做到机构精简。

而且，在旧制度下，贵族生活挥霍无度，总是有好几个侍从跟随左右，这并不是为了提高舒适度，而是为了显示其地位身份。现在进步贵族带头介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样，今年即使地租、利率锐减，大多数贵族的生活并不比以前生活差。头人们现阶段担心的是被农奴拉上批斗大会。共产党承诺过批斗会仅针对叛乱分子，而不关其他什么人的事，因此，进步贵族对第一阶段的改革基本是赞同的。

多少世纪以来，上层阶级把体力劳动看作底层活动，只适

于奴隶干，如今正在开展向这种古老态度作斗争的努力。人们组织起来开展集体活动，给拉萨大扫除，改善灌溉条件，并从事其他有益于公众的好事。上层阶级成员，甚至包括部分喇嘛都开始参加这种集体活动。贵族代表走访内地其他地方后，目睹了劳动创造的巨大财富，他们那种对待劳动的封建态度开始消除。

贵族财产的接管以及在前农奴中的分配要相继进行，新农协对财产的分配要就绪，两项工作的进展要一样快。最后阶段的补偿问题因其复杂性而未最终决定。总的来说，土地赎买价相当于六年来每英亩的净收入。牲畜和农具的价格将走市场价，尽管西藏并没有统一的价格。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源自这种情况，即每个大贵族都是通过许多小地主经营其地产，他们大多是差巴（tsaiba）型的农奴，这些人的利益也必须考虑进去。

初步估计，阿沛本人定会从政府得到八九十万元的庄园赎金，这笔钱足够维持他那个大家族几十年的生活，不仅够养大他的子女，而且够养大他的孙辈，供养他们受教育并立业。即使没有这笔补偿，阿沛身为筹委会的秘书长也会从政府处得到可观的薪水。多数贵族并没有这么幸运，有的会发现补偿不足，尤其是那些缺乏教育，也没有行政经验的贵族更是如此。鉴于他们的情况，政府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政策规定，不能让忠诚的贵族通过改革而遭受生活上的损失，当然他们会失去成百上千的农奴侍从，然而，新的电厂和现代工业会给生活带来方便，这种方便即便是贵族也未曾享受过。

进步贵族已经树立起这样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会听到更多的情况，我将在“阿沛自家选择保留的住宅”里与阿沛夫人一起喝茶。这种观念通过八年与北京的接触得到了发展，许多贵族都参观了内地的其他地区，目睹了现代生活更加便捷的事实。

阿沛说，噶厦千方百计地阻挠履行一九五一年协议中的誓

约，藏军编入解放军的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关于逐渐向民主改革过渡的各项任务，也从未见其落实过。相反，他们破坏建学校、盖医院、办试验农场，甚至阻挠落实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

例如，一九五四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行的有五六十名西藏官员，他们逗留数月，周游各地。那时西藏代表自己都说藏军纪律涣散，是人民的包袱，要逐步重组这支军队，首先引进解放军军队体制和教育机制，然后将藏军并入解放军。成立筹备委员会的建议是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提出的。将昌都纳入西藏的建议是西藏代表团提出的，并经过全国人大同意。噶厦滥印自己货币，导致西藏通货膨胀的痛苦，因此，提出了货币流通的建议，提出停印现行货币，用四百万银元赎回正在流通的货币，而这笔巨资应由中央政府拨给。中央政府还要年拨款七十万银元，支付噶厦的行政费用。

所有这些都是西藏人提出的，是以达赖喇嘛收到的西藏各地许多电报内容为基础的。然而，就在中央政府同意这些建议，达赖喇嘛及其随行回到拉萨后，噶厦便阻挠各项改革建议的落实，但不敢公开地反对，因为这些都是西藏人自己提出的，背地里的破坏却一直在进行，通过煽动下层官员和几大寺院的喇嘛，反对各种改变，并且威胁那些试图落实改革建议的进步官员。噶厦继续印制货币，币值不断贬低。噶厦无法阻挡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因为西藏各地都选出了代表，所以不敢公开反对，然而，只要有哪位噶厦代表在筹委会里认真履行职责就会遭到撤职。因此，筹委会的组织工作以及将西藏建成自治区的工作没法开展。同时，噶厦开始组织叛乱，此活动始于一九五五年西藏代表团从北京返回拉萨的路上，途经四川时。

这是因为噶厦主要受西藏最大、最反动的农奴主操纵，农奴主根本就不允许改革出现。

阿沛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庄园实行改革。他在拉萨十分繁

忙，其属地距离拉萨又较远，无暇亲临各个庄园。因此，他从他的庄园管家、小地主和农户中选了十五名代表，把他们召集到拉萨，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改革，同他们一道制定了方案，提出以四千平方公里的大庄园为单位，可以自行处理各自的事务。他盘点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农具，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赎买工作。

废除个人奴役制是第一阶段改革的组成部分，阿沛释放了他家的朗生（nantsam），即家奴和地奴。这是一个比看上去复杂得多的过程。阿沛说：“仅仅释放朗生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他们房、食物、地和农具，否则他们会挨饿的。”朗生以前只能睡在厨房或马厩里，他们也需要分到一块地。有的朗生可能留下来作家庭仆人，但可以得到工资并且享有离开的自由。有些朗生最终可以进城去工作。

阿沛的讲述清楚地说明了废除农奴制不是颁布一道法令就能完成的，即使政府采取了非武力赎买政策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和调整过程。将家族千年拥有的土地和农奴进行重组，并且正确地考虑开始现代的生活方式，阿沛感到这一切关系到他的荣誉，他打算在西藏作一个榜样。

茶桌上这番长长的谈话后，阿沛领我们上了四楼，参观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办公室。按照传统，他们的办公室必须建在楼房的顶层，不允许其他任何人高于他们。达赖喇嘛虽然去了印度，但他仍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席。他的办公室保持他随时回归的样子。这是一个里外间的豪华套房，外间办公室的地板上铺一块深红色的地毯，一张大写字台是给秘书用的，白金色的松软椅子是为小型会议预备的。套房的里间自然是私人空间，供休息之用，那里有一个大大的包金卡垫，末端有漂亮的雕刻，摆放在花色地毯上，还有两个雕刻精美的柜子，两把蓝色包面的椅子摆放得当。房间色彩、图案与罗布林卡新宫中的没什么两样，然而，效果却截然不同。这里的窗户开设合理，给人明快宽敞的感觉，放眼望去，可见漂亮的山脉

景致。

身为筹委会副主席和现行代主席，班禅额尔德尼的套房在同层楼的另一头，样式几乎是达赖喇嘛的翻版，只是在装饰装修上稍有区别，另外窗子朝向不同，班禅的套房朝向西。穿过大厅是一间大接待室，是达赖喇嘛或班禅召集或出席会议的场所。这种翻版和平等重复了理论上的平等地位，这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总能得到的。

* * *

应阿沛夫人之邀，我来到阿沛的家里，与阿沛夫人及其他三位贵族妇女一起喝下午茶，阿沛的这个家是他们家人挑选留下的，坐落在拉萨东北头上一道缓坡的顶端，山坡直冲拉萨河，坡上视野宽广，河谷南面的景致和远处的山峦一览无余。换了我，也一定会选住这里的房子，这是我在西藏见过的最方便的现代住家。

一进大门，我的眼睛便落在那座巨石垒成的三层高的城堡上，一开头我还以为那里就是阿沛一家住的地方。它依然为阿沛家所有，他的几个孩子有时还在使用它，然而，阿沛夫人说：“那老地方一点儿也不舒服，如今农奴都解放了，我们不能住在一层都是又小又黑佣人房的城堡里，不如让政府买了去，随他们去改造，改成宿舍也行，改成办公室也行。几年前，我们为自己盖了新房子。”

新房子盖在城堡的一边，结构朴素，样式很像加利福尼亚牧场矮平房，主要建筑是一个方形的一层楼，附属建筑是左边的长形配楼。几步低矮阶梯通向一个门廊，门廊连着客厅，从客厅可见左边的配楼，厨房和佣人房间分布在那里，家人的住房靠右，分布在客厅的四周。备好茶水的起居室足够容下一个家庭、几位客人，但要搞矫饰的娱乐就够呛了。整面南墙都是平板玻璃的窗户，鲜花盛开的花园尽收眼底，还可观赏花园远处的山景。硬木地板上平展地覆盖着优质的地毯。天花板是蓝

色的，墙壁是暗黄色的，还带有三英尺高的暗绿色木质基线板。这种大胆而品味细腻的色彩若是在好莱坞也是能够通过的。厚重的褐色窗帘镶有黄色的丝线，掩卷在窗边，窗帘里还有一层白色的纱帘，上面缀满紫色的丁香花。

厅内的座位多是低矮的卡垫，上面铺着优良的毯子，这是一种藏式的座位，但靠近窗户摆着一个与西式坐椅等高的卡垫，填充松软，配有靠垫，边上还立了两把舒适的木椅子，质量优良，装潢考究。靠近椅子摆好了咖啡桌，阿沛夫人领我到桌前，微笑着说：“这是为外来的宾客准备的。”

阿沛夫人穿一条咖啡色纯毛连衣裙，露出两条橘黄色的长丝袖，裙装上扎一条褐、粉色相间的条纹围裙。她身上的珠宝有金手镯、金手表、钻石耳环和一条三排联的小珍珠项链，就我的拙见，她那串珍珠项链与我的一串很相似，我那串是在英国伍尔沃斯百货商店（Woolworth's）买的，估计她那串更昂贵。不过，在西藏搞到真珍珠比去伍尔沃斯百货商店要容易。

女主人向我介绍了朗顿（Lang Tun）夫人，她穿一条黑色的连衣裙，配一件套头花毛衣，显得比阿沛夫人老，其实只比阿沛夫人大三岁。我得知，她丈夫是西藏现执政的筹委会成员，实际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儿，被委以保管记录的重任，因此，他能够作为拉萨会议的见证人，见证从未批准过的西姆拉（Simla）会议决议，被印度宣称为己疆界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很早以前就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否决了，麦克马洪线从来就不存在。崔科（Tsui Ke）夫人，一位妇女筹委会成员，显然是位上年纪的妇女，在整个座谈中一直静静地织毛衣。桑顿（Song Tun）夫人是一位进步贵族的妻子，这位进步贵族曾被叛乱分子打伤，我没来得及了解故事的经过。

阿沛夫人告诉我，她出生在一个农奴主家庭。她说：“我和我丈夫的家庭收入均来自农牧民的劳动。我丈夫虽然一直做官，但薪水不高，真正的收入来自庄园。我们的庄园农区有，

牧区也有，我们既可以从农民处，也可以从牧民处得到收入，这对我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认为这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一九五一年前，阿沛夫人从不过问政治，认为那不是女人应该涉足的领域。家里虽然有家教，但从不学习识字。她说：“我学习记账，只为能够清点家产。没人认为女孩需要书本知识。”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开始学习字母，那时她年近四十。

自打参观北京起，阿沛夫人开始觉悟。一九五一年她随丈夫阿沛从昌都赴京参加谈判，当时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九个孩子，是个男孩，后来就生在北京。她不顾有孕在身，花间目睹了中国各个地方的许多事情。

她说：“内地的许多地方刚刚结束了土地改革，处处听到人们议论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好处。亲眼看到劳动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比西藏人民幸福得多。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少数人过得好，多数西藏人却非常悲惨。我清楚地认识到不仅富人有权过好日子，劳动人民也有权过好日子。”她开始学字母，然后学会了识字。一九五四年她成为“西藏爱国妇女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该筹委会，西藏妇女开始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我吃惊地得知阿沛夫人生了十二个孩子。她带着微笑确认到，“十二个全是我生的，都活着”。她补充，“西藏妇女一般都生很多孩子，多数都活着的不多”。她认为她的孩子之所以都活下来是因为“一直都亲自喂养，精心呵护”。

她的大女儿已经二十二岁，出嫁到印度的噶伦堡（Kalimpong）；老二在拉萨出嫁；接下来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都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上学。她说：“中央政府支付了他们的所有费用。大儿子数学成绩好，想当一名工程师。”还有六个孩子在家，其中四个在拉萨小学念书；最小的两个还不到入学年龄。

要是十二个孩子一下子都回家来，他们所选留的这所朴素的房子就会相当拥挤。但阿沛夫人认为所有孩子同时回来几乎

不可能。“女孩要出嫁，男孩要去西藏其他地方工作。儿子不再把媳妇带回父母家来住了。”留下的这所房子刚好符合现代生活的标准，够上学的孩子和偶尔回来的孩子住，配楼下面的几间屋够家佣住，要像过去，有一大堆农奴，这房当然就不够住了。

她笑着说：“我丈夫在噶厦供事那会儿，无论去哪儿都要有四五个仆人跟着，以显示其官职级别，这是过去生活的一部分。”

朗顿夫人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这也许正是她显老的原因吧。一九四七年她把两个大孩子送到印度去上学，一九五一年她又把他们接回来，送到了北京。两个小点儿的孩子一开始就在北京上学。她说：“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学校，孩子们就不用再去印度上学了。因为他们将来要在西藏生活，在北京他们不但可以受到同样好的教育，学到医术，而且可以学到更多有用的政治知识。”

朗顿夫人还在印度时，有一回得知除农奴制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她一九四七年去了印度，送孩子去那里上学。她说：“在印度没有农奴，我打心眼里感觉到我们落后的制度必须改变。我在西藏提出这个问题时，没有得到过答案，这不是女人能过问的事。一九五一年后，我看到中国越变越好，因为如今中国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女人与男人也平等了。我开始学习，后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国妇女组织，再后来我的疑问开始有了答案。现在我本人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

崔科夫人，那位年龄最大的夫人在我们谈话时，一直静静地织毛衣，我转身与她交谈，她说她也是“靠农奴的劳动”生活的，这样的生活自她幼年起就没变化过，然而，这谈不上舒适。她说：“人们漫无目的地开垦，土地利用得特差，产量从未上去过。”

她补充道：“按过去的方式生活的话，人有了病，是找不到好医生的。妇女没有文化，也不会过问政治。有时也听说

过，中国的其他地方女人能识字，还听说那儿的人都乘飞机旅行，但我们无法知道这种说法的真伪，因为从未有过交流。直到一九五一年汉族同志来到拉萨，我才开始学文化，并且有了政治观点。”

我问过她们三人，以前有否想过这个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她们异口同声说，从未想过，“我们从未介入过政治”。但一九五九年后，她们“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到”西藏早就“与祖国相连”，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她们属于强大国家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里众多民族是平等的。

她们说：“如果西藏不是强大中国的一部分，藏族就会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此在亚洲许多小国家都上演过。西藏那些大谈‘独立’的人一直和某些外国有联系。为什么有那么多英美作家如此关心西藏‘独立’这个问题，这是为西藏人好？还是为他们自己好呢？”

朗顿夫人朴实而坚定地说：“现在，这好像就是我们的认识，而一九五一年前，我们妇女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夫人在表明她们对新社会的忠诚时，究竟有多诚恳？谁能说得清她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答案并不明了，然而，她们正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并为了她们和自己的孩子将投身于这场变革，因此，她们对新未来的忠诚程度会不断增长。对她们和对西藏来说，与北京的八年接触使这场变革容易了许多。

第六章

大昭寺里的娜珍

我天天盼着能找到拉珍（Lachin），她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位年轻的藏族妇女，在《采访西藏人》一书的第一章里，我写到过她。她曾经是昌都地区的农奴，十三岁时逃跑，投奔了解放军，随部队一路走到拉萨，后来她被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在那儿她碰巧成为阿沛的一个孩子的同学，典型的农奴与农奴主同班学习。

五月份我在北京火车站为她送行，那时她已二十二岁，是一名年轻的毕业生，为被选中第一批返藏而万分自豪。回想起她那份恬静的热诚，我在我的书里记录了她的一番话，她怀着这股热情说，“为了西藏的新生，为了我的人民，我甘愿做一切”。一到拉萨，我就打听她的消息，可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时，她突然找到了我，她在拉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拉萨报纸刊登了外国记者和作家访问西藏的消息，于是捎话给我，她现在是“工作组”成员，在大昭寺工作。她的名字叫“娜珍”（Nachi），而不是“拉珍”（Lachi）。藏语中，“N，L”两个流动的发音比较容易混淆，把这两个音译成另一种语言取决于译者的发音。在拉萨，人们都称她“娜珍”，因此说“拉珍”自然找不到她喽。

这位年轻的热心人落脚于西藏最神圣的地方，帮助变叛乱的温床为遵纪守法的机构。她建议在她那儿见面，看看她所工作的地方。于是一天早上八点钟，我去大昭寺与娜珍见面，前往了解她的工作，对西藏最神圣的地方作一次私人走访，这天正赶上宗教节日，朝圣的人比往常多。

大昭寺既是寺庙也是寺院，其建筑恢弘，令人难忘，可却找不到一个能观赏其整体的地方。从远处的山上或屋顶可瞥见其似海的金色屋顶，屋顶形状为富于装饰性的圆形和舍利塔形，但从地面接近大昭寺时，发现寺跟前有一条蜿蜒的鹅卵石街道，狭窄的一次只能看见部分矗立在面前的浅色装饰墙，而侧面和后面的墙壁则完全消失在店铺、楼房之中，这些店铺、楼房是数世纪来环绕大昭寺发展起来的，它们依寺而建，鳞次栉比。

大昭寺主要入口处的鹅卵石街道稍宽了一些，便于朝圣者进入。这里正有几名妇女面朝路面，匍匐向前，爬向高大古老的门道。人人都要经过一个收费亭，里面有一个收钱的僧人，他瞅了我一眼，看是一个外国的非信徒，就没再理我，只顾忙着收取信徒的捐赠款。他把每个捐赠者的名字写在一条薄薄的纸片上，然后在现场，当着捐赠者的面，把纸条烧掉，这是说信徒的“功德录”直接上了天，而尘世的账簿就由这位僧人自由记载了。

我走过他，走过面向石板的女人，又走过一名僧人，他正慢慢地前行，一步一磕，以自己的身子丈量着地面。他起来，卧倒，再起来，再卧倒。他是从内蒙古一路朝圣来到拉萨的。如果这一路都这样一起一伏，用身子丈量大地，两千多英里地，恐怕花他一生的时间都不够。我穿过黑暗的人口处，来到一座光线昏暗的露天庭院，接着又穿过一个黑暗的门廊，来到另一个露天庭院，这个院子顶端有一部分用一张高高拉起的绣有“吉祥符”的篷布遮住，这里的吉祥符突出了“转世轮”的符号。西藏常见的古老石头与易损帆布混合搭建的临时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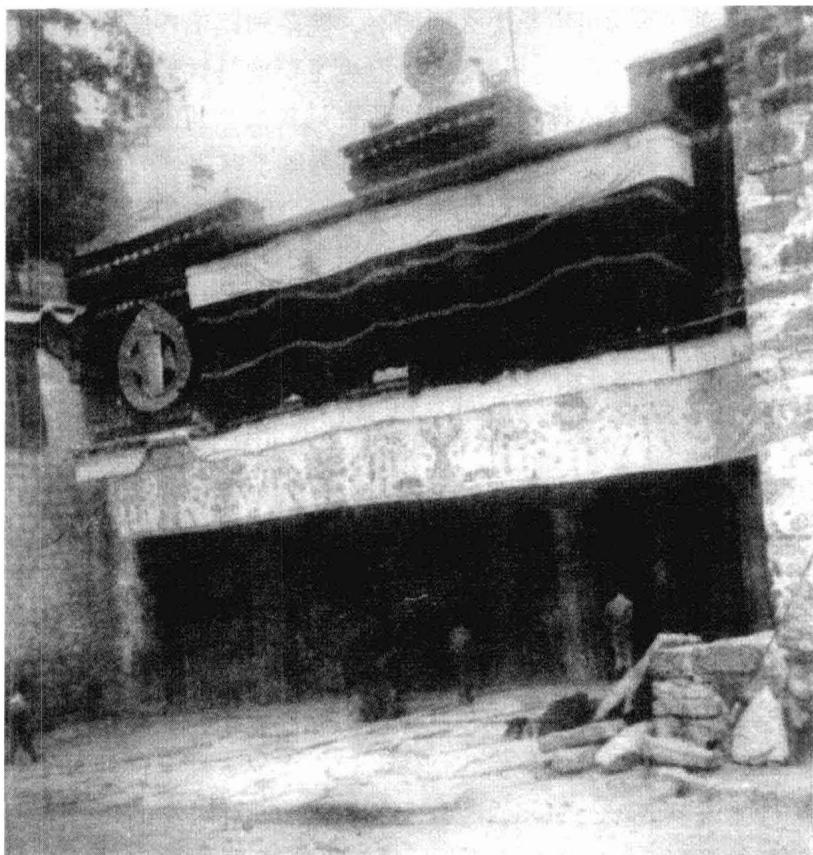
再次出现。尽管天空是那么的明亮，院落却阴沉昏暗，这部分原因是院子上方罩了一块篷布，但更主要的是院墙高大，它使人口院子如同落入深邃的井底。几百只灰褐色的鸽子在院子上方盘旋觅食，不仅遮住了光线，而且弄脏了院落。

我在这道院子的入口处等娜珍。一个肮脏的僧人从我身边走过，拎了一把大铜壶，去他的寝室，不知道他的寝室在楼里的哪个地方。几个打着赤脚、肮脏的男孩来回转悠，可能想捡到或偷到点施舍品。从内蒙古一路磕长头来的那个朝圣者撵了上来，从我身边进入了寺庙。

娜珍来了，穿一条非常鲜艳的蓝色长裙，露出紫玫瑰衬衣，腰系一条漂亮的围裙，围裙上端镶有金色的缎边，横条纹的图案，色彩鲜艳，长长的发辫整洁地盘在头上，用梳子别好。真不知她是怎么待在一个寺庙里的，她长得那么好看，年方二十二。她热切地上前问候我，我称赞她的衣服漂亮，她说是北京毕业时学校赠送的，但围裙是在拉萨买的。这位可爱、富有魅力的姑娘转而变成一位威严的领导者，向我介绍了随她而来的两名僧人。那位面容憔悴，四十多岁，性子慢的男子叫阿旺米珠（Nawan Miju），另一位高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叫洛桑德烈（Losantele），一张干净、红光满面的脸，咧嘴笑时露出两颗金牙。

阿旺米珠是“大昭寺评判委员会”的主席，两尺之外就闻到他身上的恶臭。酒红色的长袍上露出他那张饱经磨难的面孔。他九岁就被领进了寺院，从那时起整整做了三十四年的僧人，但来大昭寺还不到一年。大昭寺经常以从其他寺交换僧人的方式补充人数，这些交换者来到这一最神圣的地方作短期逗留。

阿旺米珠是文盲，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学习诵经”，但基本上全是死记硬背下来的，所学的东西在后来的岁月里便淡忘了，因为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了给上层喇嘛干活上。此外，即使他会“诵经”，也不能看报或阅读任何现代书籍，因为经文



大昭寺入口处，有妇女正匍匐向前，慢慢接近大昭寺。

是用古藏文写成的。现在叛乱平息了，学校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了，阿旺米珠希望识字，还希望学门手艺，比如裁缝什么的。他打算继续留在寺院里，因为除此之外，他并不会其他的谋生之道。他不仅要参加佛事活动，而且要干些能维持生计的活儿。关于自己，阿旺米珠就讲了这些。

洛桑德烈畅所欲言，精力充沛，一肚子他过去受压迫的故事。他也是九岁被领进寺院的，他讲到了细节，他出生在一个“堆穷”（duichun）农奴家庭中，他认为自己所挨的鞭笞“至少上千次”。他挨过许多上层喇嘛的皮鞭和脚踢，但最坏的还要数他的老师，实际是他的师傅。这位师傅常常酗酒，酒后尤

其残忍。这个年轻人的头上、臀部、胳膊上都留下了鞭痕。他说，十二岁那年，有一次，他的师傅找茬，以不好好扫地为由，捆住他的手脚，把他倒吊在房梁上毒打，并抓住绳子的一头，猛拉后再松手，让他从梁上掉落下来。师傅还把他的父母叫来，目睹这一惨状，称他们的儿子是坏孩子，需要惩罚。

洛桑德烈叫出了这个残忍师傅的姓名，此人是被俘的叛乱分子，现在新水电站劳改，年轻人把他列入够上“控诉会”的恶人的名单，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师傅的罪行。我问娜珍，这种想把师傅推上“控诉会”的可能性有吗，她说这取决于要求召开这种大会的人数，“没有时间挨个控诉每一个有罪的人，只控诉那些民愤极大的罪犯”。说到洛桑德烈，我感到事后娜



洛桑德烈，这位曾经经常遭鞭笞的年轻人现在打算结婚。

珍还有好多要说的。

我问年轻人：“寺院里有对你好的人吗？佛祖教诲慈悲为怀，善待所有生灵，难道有人不遵循这样的教诲吗？”

年轻的僧人回答道，在讲经堂他听过大量“善待生灵”的教诲，但“从未见过哪个上层喇嘛对穷困僧人发过慈悲，哪怕少抽打穷僧人几鞭子也好啊。从未见过有上层喇嘛给挨饿的穷僧人吃的。他们对待世俗信徒同样没什么慈悲，甚至更坏。”

年轻人十分坚定地宣布，他再也不想当僧人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对象，打算结婚。他向工作组提出了这个要求，工作组人员劝他再多受些教育，学一门手艺。他的对象同意工作组这个建议。因此，洛桑德烈为成为一名有技能的工人而制定了一揽子计划。这显然是他看上去比别的僧人都洁净乐观的原因所在。他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就是有点爱冲动，或说不够稳重。

两名僧人讲述了大昭寺发生叛乱的经过。三月十日大昭寺的头儿去罗布林卡参加了宣布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会议，然后与市政的一个头目返回大昭寺，命令僧人换上平民服装，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当时，大昭寺有一百三十名僧人，只有十四名僧人真正拿到了武器，其中部分也只有刀子。寺头有一枝步枪和一把手枪。此时，谣言四起，说进步活佛帕巴拉（Pabala）被击毙，汉人绑架了达赖喇嘛。

二十号，寺里来了五百名藏兵，他们在寺庙的庭院里安营扎寨，并在大门前架起了大炮。僧人被命令帮他们在寺顶修筑防御工事。他们还挖了一口井，为长期围困做准备。四个外墙门都布置了僧人岗哨。

两名僧人说：“二十一日士兵从这里开火，炮击解放军，解放军还击。部分僧人分组守卫寺院各道大门，但多数都逃跑，躲进黑暗的殿堂。就连那些受命守门的僧人也没守多久，也跑掉藏起来了。藏军士兵自己二十一日夜晚便逃逸了。所以，第二天一早僧人们就都投降了。解放军逮捕了叛乱的首

领，把他们送到拉萨新电厂劳改，‘修复被他们破坏的地方’。”

接着工作组来了，他们召集僧人大会，给僧人办学习班。大昭寺的住寺僧人通常只有一百多人，但工作组把二十八个小寺院的僧人都安排到了大昭寺，让他们参加政治学习。这些僧人大多数都是盲目参加叛乱的，上层喇嘛下达命令，他们只有服从。现在他们通过集体讨论，弄清了他们参加叛乱的原因及其与上层喇嘛的关系。他们走访其他寺院的学习小组，参加控诉大会，聆听共产党人士的报告，报告结合西藏农奴社会以及即将开展的民主改革，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下一步，人人都必须做出抉择，决定自己在这正在形成的新社会里做什么。一些僧人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但工作组劝他们待讨论学习结束后再作决定。

我问：“在战斗中大昭寺有损坏吗？”

他们回答：“有一点损坏。寺顶有一小块被弹片打掉，还有一个殿堂的顶部被弹片击中。现在这两处都已修复。大昭寺没有遭到大损坏的原因是，藏兵从高音喇叭中听到了他们部队到处受挫，节节败退的消息，于是当晚都逃离了寺院。”

阿旺米珠主动领我转寺庙。我抓住娜珍的手，向前迈入一条黑乎乎的通道，石板地面凹凸不平，黑得看不见脚，还有许多看不清隆起的地方，走不好就会崴脚跌跤。通道里面好像挺大，但这与其说是看出来的，不如说是感觉到的，唯一的光线就是酥油灯。这种灯成千上万，有时可以照出通道的轮廓。每一盏灯的光量只有针尖大点儿，在远处晃动闪烁，无穷无尽，直到光亮被黑暗吞噬。通道上有时可见桶装酥油，油的表面燃烧着细小的灯芯。我们遇到了排成队的朝圣者，他们人人都端着一盏酥油灯，个别崇拜者还端着大钵的酥油，专为进贡大昭寺。

据阿旺米珠说，大昭寺一天要燃烧八百磅酥油，这对一块饥饿的土地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尽管燃掉了这么多的酥油，

也没能照亮大昭寺，人们既没有完全看见寺顶，也没看清过远处的墙壁。当眼睛适应过来后，才看出我被领着行走在一个空间的外边缘上，我发现这圈墙壁串连着一个一个小殿堂，每个殿堂都供奉着各自的偶像，点着几盏酥油灯。因为这些殿堂比主殿还黑，所以我没进去。

我宁愿面向大昭寺最亮堂的部分，那是一个附属的小空间，紧挨寺中心，形似一座三面开放的殿堂，数以千计朝圣者排成渐进的长队，端着的酥油灯要供奉给神圣的释迦佛像，此佛像早在公元六四一年由文成公主带到拉萨来。阿旺米珠领我到近处，仰望佛像，这样可以看见白金铸成的佛像头。这尊佛像从高处微向前倾，存放在立式的盒子里。我匆匆而过，都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我还没被带到跟前，就见人头攒动，人们摩肩接踵，小小酥油灯昏暗且晃眼，时间匆忙，我简直没搞清摆放佛像的究竟是盒子，还是殿堂的一面外墙，也不知道佛像的鼻子是否笔直，在我想象中，佛的鼻子就像希腊塑像一样，从额前笔直向下，形成一条直线。我能记得住的就是人群，排成一支细长的，耐心等待的小油灯队伍。突然这支队伍一阵躁动，人群簇拥，绕佛像一圈，人人争先恐后地驻足于追寻的形像前，但很快就被后面跟上来的人推进黑暗。

走出大昭寺的黑暗，我为看到太阳，闻到空气而高兴。

* * *

几天后，娜珍到我房间来喝茶聊天，我问起她的经历，她便从北京火车站我们分手后谈起。她和另外一百五十三名农奴毕业生，坐了满满两车厢，全都是准备回拉萨，前去帮助即将开始的民主改革的。

她说：“头儿站，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与朋友分手和告别学生时光而伤心掉泪。不久，有人说，‘哭的时间过去了’，之后，我们开始唱歌，一路唱到拉萨。我最喜欢的歌是雅鲁藏布

江，它歌唱我们西藏的大江大河。我们通过火车上的广播车厢向其他车厢的旅客播放西藏的歌曲。此外，我们还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列车工作人员和乘客都对我们的良好表现称道致谢。

“坐了四天火车，我们到达了甘肃省的东峡（Shatung），从那里我们结束了火车旅行，剩下的行程改乘卡车。在东峡我们受到了解放军的欢迎，他们还为我们送行。每辆卡车乘十二人，我们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路上，我们在有些地方的小客栈过夜，在另一些地方则在帐篷里过夜。每到一处，人们都给我们吃的喝的，伙食反倒比学院的好，因为总有肉吃。在每一个住宿点，我们都帮助那里的工作人员抹桌扫地做好事。各站点的工作人员都感谢我们。

“去拉萨，我们走了十七天，非常愉快。在兰州，我们休整了两天，在敦煌去看了著名的石窟。我们为各地的巨大变化而惊讶。一九五六年这一路根本没有房舍，现如今格尔木（Kermo）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了，房屋就修在昆仑山脉（Kunlung Range）顶上，建在雪山上。想想看，我们的祖国多伟大啊！汉族人工作得多努力啊！现在我们藏族人也将进行变革！我们的爱国之情如同一出剧中的唱词，满腔热忱，渴望参与那场民主改革。”

到了拉萨，这些刚毕业的学生们渴望马上投入工作，但他们接到必须全休七天的命令，以便适应高海拔。他们寄宿在拉萨市郊的工委招待所，那里的床位可接待几百名客人。毕业生在拉萨的亲戚涌向招待所，欢迎新人的到来。父母亲带着茶点，淌着喜悦的泪水，看着这些孩子们，几年前他们离开时，还个个忍饥挨饿，冒着危险，面黄肌瘦，眼下他们回来了，面颊红润，身体强壮，受了教育，随时准备重建这片土地。娜珍的父母住在远离拉萨的巴塘，乘车要走十二天。他们没有来拉萨接她，但相互通了电报和书信，而且她在拉萨找到了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她姐姐来接她了。

她说：“所有其他学生的家人对我来说也似亲人一般。”

七天来，政府各部门的领导都来看望学生们，和他们讨论不同行业的工作。第八天公布了分配方案。第九天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告别晚会，学生们拿出了自己路上省下的零花钱，买来蛋糕助兴。第十天他们纷纷奔赴西藏各地的工作岗位，有的分去从事乡村组织工作，有的则参加了军管工作，有的去了山南，还有的去了日喀则。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如果所分工作不合心愿该怎么办的问题，结论是服从分配，尽力做好工作。

好几天后娜珍才得到分配，先干了两份短期临工，之后被叫到工委统战处，办公室魏主任问她愿不愿意和僧人一起工作，她回答服从分配，不过不了解僧人。他问她怕不怕僧人，她说不怕，于是她被分到了大昭寺工作组，花了几天时间看资料，与人讨论寺院，之后她在大昭寺的工作便开始了。

“起初，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从孩提起，就对僧人和寺院怀有某种神秘感，很久以前我认为僧人是神圣的，相信他们有特异功能。现如今分我到寺院工作，帮助僧人摆脱黑暗压迫。进入寺院的第二天我就跟僧人们混熟了，那以后就没再害怕过。我了解到穷苦僧人和其他穷人一样受苦受难。一些僧人因为贫困而进入寺院，另一些是为了逃脱强迫劳役而进寺院，还有些很小的时候应寺院的要求而被其父母送进寺院。那些父母总以为寺院的生活会比农奴的苦日子好，后来他们才发现孩子们得像奴隶一样侍候上层喇嘛，而且要向各自的寺院赊账才能得到吃的。他们像农奴一样挨鞭笞，受酷刑。他们的日子比我很久以前出逃时的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我想尽全力帮助这些贫苦僧人。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积极分子’，他们揭露叛乱的内幕，即使是那些站在叛乱分子一边向解放军开火的僧人也出来揭发叛乱，因为他们是受上层喇嘛的唆使，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本身困惑不解，难辨是非。他们依赖我，期望我能晓之以理，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假如有僧人对我有非分之

想，伤害我，我会找到一群朋友保护我，所以我不再畏惧，我工作的第五天就住进了大昭寺。”

娜珍部分地讲述了她在在大昭寺里的工作。她是十三名工作组成员之一。他们先从与僧人混熟入手，让他们讲述自己过去生活的经历，描述他们过去所受的压迫，一旦发现可供“召集会议的材料”，就展开小组讨论，甚至召开“控诉大会”，声讨那些曾经特别残暴的上层喇嘛，让那些曾经受他们压迫的下层僧人进行控诉。在这样的大会上并没有人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贫苦僧人弄清楚受压迫的根源所在。过去，僧人们听说自己的苦难是“卡玛”（kama）决定的，即命中注定受苦受难，为前世的罪孽而承受苦难，认罪赎罪是他们现世的义务，以此求得来世的好命。通过讨论他们认清了自己苦难的直接原因，随之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实战中被俘的僧人先是被带走，关押起来，随后开始分类排序，那些愿意帮助西藏人民的被送去修建拉萨电站，当时约有上千名被俘叛乱分子在电站劳改，那里甚至没有设置岗哨，而是建立起他们自身的监督机制。劳改者除得到食物，还得到零花钱，时不时地还分小组地被释放。

娜珍说，洛桑德烈曾经是一名非常积极的叛乱分子，非常愿意拿起武器，他不仅想杀解放军，而且想杀所有的汉人，甚至不想放过所有与汉人联系的藏族人。在战斗中被俘后，被送到电站劳改，这才知道他以前的头人也在那儿劳改。洛桑德烈的忠诚之心很快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特别彻底。他表现出领导者的素质，成为电站工地上百名劳改者的主管。显然，他具备许多有用的能力，而且精力充沛。然而，他的变化有点太快，显得不稳定，所以，当他提出要马上结婚时，工作组劝他先学些技能再说。

在娜珍的印象里，至少有一半僧人想离开寺院。她说：“从没有深究过他们对未来的打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等等，做决定前应该经过认真的思考，但我从他们的自愿发言

中了解到他们多数人现在的打算。他们中的有些人，其父母叫他们回家，有些找到了对象，想结婚，还有的想进一步学习，也有的想找工作。对这一切，他们都有选择的自由，是民主改革和《十七条协议》使僧人们获得了‘人身自由’。然而，我们工作组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因为他们都跑来找我们出主意，让我们给他们推荐学校，或者介绍工作，要成家的也许会让我们给他们找间房子”。工作组的方针是劝他们所有的人，做决定前，要认真思考，待大昭寺内的政治学习结束后再离开，学会一门手艺再娶老婆。

十三名僧人，在他们一再坚持下，离开了大昭寺，去了拉萨中学念书，其中三名结了婚。娜珍说：“面对各自与变革社会相关的未来，每个人最终都会做出决定，他们的决定各种各样。”

面对娜珍表扬僧人的那份冷静，尤其是她对洛桑德烈进步的分析，我笑了。我怀疑，她自己该不会爱上了其中的哪一个僧人？即使是处于工作关系，比较避讳这种事情，我还是能够感觉到。所以，我问她，住在高墙大院内，有没有哪个有意僧人接近她，向她求爱。

她说：“从来没有，我有一把手枪，必要时，会用来自卫，但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我直率地问：“难道没有僧人想娶你？”娜珍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她回答，她已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是多年前，孩提时，在巴塘认识的一个男孩，拉萨军管时期，她又见到了他，当时他参加了解放军。对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我常常感到惊讶，惊讶他们的明智，凭着这种聪慧，他们似乎在选择自己的情感之路。娜珍才不会爱上那些不辨是非，最近才有所转变的僧人呢。她挑选到的那个男孩，他们双方家庭世代相识，那男孩的工作也是当时在拉萨难得的好工作。我问他们是不是很快就结婚。

娜珍回答：“我的朋友都说，大昭寺的工作一结束，我就

应该快点儿结婚。这次的任务九月份结束，多数朋友都认为那是结婚的最好时间。而我想先参加民主改革，想先积累些在乡村工作的经验，等土地分配完了再说。现在跟僧人一起工作是因为我被分配到这儿的，还因为，如果寺院的改革搞不好的话，民主改革也会受影响。就我本人来说，更愿意在农民中工作，特别是跟村妇一起工作。我认为，与老农妇和母亲们一起工作，比与僧人一起工作，自己更有信心，能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大昭寺的工作结束后，我希望能被调到乡村去工作，去完成民主改革。”

我问：“那你的男朋友怎么说？”

娜珍回答说：“他说我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疑心他俩的商定未必像她说的那样平静，也可能就是那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的现代青年。

三个月前，娜珍还只是一名热情的毕业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是一名前途似锦，深谙农奴繁重苦役的女子，只是没有担任领导的工作经验，而如今她已经成为新西藏的一名领导干部了。一年或几年后她还将结婚、生子，然而，她是把僧人改革放在首位的，因为，对她来说，在她所属人民的集体生活中，这是头等大事。

* * *

在和娜珍一道参观的间歇，我走访了拉萨南头的一个居委会，发现新兴城市组织机构已经初露端倪，原市政府因其落后、腐朽，加之叛乱造成的千疮百孔，已经土崩瓦解，在临时军管会领导下，市委成立了，成员吸收了有处理城市事务经验的当地市民。崔科是一名进步贵族，曾经是噶厦里的一名干事。就是从他那儿我得知拉萨约有三万五千人口，如今都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行政区和城郊的两个区。除了所有这些区域，就是拉萨了，其面积要大得多，除了城区，它还包括八个县，相当于一个大省，拉萨的面积和人口占整个西藏的十分

之一。

城市的每个区都有工作组在发挥作用，其职能就像娜珍所在的工作组一样。工作组是中共西藏工委建立的，已遍布整个西藏。就像娜珍的工作组协助创建僧人委员会，并通过该委员会行使职权一样，各个区的居委会也发展了起来，目的是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拉萨城有二十七七个居委会。

一座破旧、伪装过却快要垮塌的老楼坐落在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我们在楼里找到了南区的“第六居委会”。该楼曾经是擦绒（Tsrjong，达赖喇嘛身边的神职人员）众多财产的一部分，也曾是叛乱活动的中心，如今已被征用。我们攀上陡峭、狭窄的楼梯，来到楼上，这里曾经是前主人起居的地方，我们和前来欢迎的居委会成员一起坐下来。

居委会主任叫平措（Pingtso），一位不太爱社交的男子，我一直没有了解到他的历史。最爱说话的叫普布（Prubu），一位穿乳白色衬衫、褐色毛衣，戴黑色毡帽的男子，不停地抽烟。他是一名手工艺匠人，专做漂亮的呢子靴。在居委会里他负责“三反”运动，办理失业救济。不是六个就是十个成员出现了，有的来了又走了。几名妇女谦卑地坐在后面的角落里，显然还不太习惯她们新式的性别平等。

还是平措澄清了“居委会”和“国家政权”的概念，所有成员都赞成他的说法。“居委会”并不是“国家政权”，也没想让它成为“国家政权”，只是让它起到与市民保持联系，改善邻里关系的作用，它将有助于建立“国家政权”，并协助其行使权力。这种区别对藏族人来说似乎非常清楚，尽管他们多数都是文盲，只有几周的政治经验，可就在那几周里，他们已经了解到，拉萨的四所正规学校——三所小学，一所中学，都是国家政权开办的，然而却远不能满足他们渴望接受教育的需求，基于此，居委会开办了三十五所特殊夜校和扫盲班，拥有两千多名学生。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开办了一所小学，有学生九十名，一所夜校，有成年学员三十五名。

通过居委会，市民们参与了民主政治生活，唤醒了觉悟，认识到他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政权”的紧急救助，十一万磅（二十四万三千公斤）的“救济粮”调到了拉萨，分给了饥饿的失业者，两百五十万磅（五百五十一万三千公斤）种粮无息贷给了农民，普布（Purbu）就亲自组织了部分救济粮的分配。“国家政权”修复了拉萨战事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以及其他建筑造成的损坏，还修筑了六英里的新公路，而居委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组织社区大扫除，清理街道、院落，将滋生疾病的沼泽地变成了菜园子，使穷人有了吃的。是居委会给无家可归者安了家，把六十九名孤儿送进了“国家政权”开办管理的小学校。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十分明朗。

该居委会组建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叛乱平息才两周。它管辖区内有二百九十八户人家，其中九十三户是手工艺匠人，五十户经商人家，十五户贵族，还有一百四十户“穷人”，他们主要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该居委会的地盘从朝圣的外环道林廓（Lingkor）延伸至内环道八廓（Parkor）街的边缘，正对大昭寺，朝圣者面朝地面，用自己的身子丈量环道从外环绕入内环，直到大昭寺，这内、外环道之间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和胡同，都通大昭寺。

林廓路上有一小片臭名昭著的荒地，无家可归者曾经聚居在那里的窝棚或破烂帐篷里，甚至露宿在那里。这片地是居委会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普布说：“我们得设法安置这些人，给他们找房、找工作，分给他们救济粮。许多人返回了他们的村庄，那里民主改革后将分给他们土地。”

我问：“你们到哪儿给他们找房子？盖新房吗？”

普布答道，“拉萨有的街区盖了新房，我们街区不需要，因为有许多叛乱分子的私有出租房产，正好拿来给无家可归者居住”。此引出了一场住房的讨论。普布说，“街区里的所有住房原来都属于噶厦、贵族或寺院，人们必须缴纳租金才能住

上，租金极其昂贵，就拿我来说，仅搬入费就是我年收入的两倍，之后每年还得支付一千零五十两银子，这还不包括要为房主出差役，背水、扛大包”。

叛乱平息后，居民们并没有改变房屋的所有权，因为没有赋予权力给他们，但不用缴纳房租了。房屋的小修补他们自己做，如需大的修缮他们就去找军管会。待到民主改革完成后，藏族人民创建了新的自治区和永久政府时，房屋所有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到时人们住房不用交房租、出苦役，只需不断维修就行了。人们认为叛乱分子的房产必将充公，然而，房主逃到印度或被俘，只要家眷还住着的房屋就让他们住，因为他们也得有地方住呀。如果他们有多余空着的院落、房子，居委会可能会要求他们给邻里让出来。这样的住房安排都比较临时，因为一些人会回家乡去，另一些人会去工作。这样一来人们就都有了住处，林廓路上的那片碍眼的破窝棚、烂帐篷就可以清除掉了。

我甚至不用问，这种住房变化是否采用了军事征用的方式，很显然如有必要，采取军事征用的手段也是可能的。为了接管次穷（Tsrijong）房产作司令部，居委会就可能获得过正式的文件批示。同样很明显的是，叛乱分子的家眷宁愿迅速同意街坊邻里合理的“临时”使用，也不愿意招来军事征用，因为那样会更严厉，征用时间会更持久。地方的主动性与军管的实际结合看来是一种以最少的摩擦获得预期效果的正确方式。

居委会的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开垦一英亩田地和三分之一的“荒地”，居民们排干了荒地上那片死水塘的水，种上蔬菜，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菜园子，还围着菜园子和沿主要街道种上了树，并挖了引水渠，用以浇灌蔬菜和树木。人们成立了“卫生监督组”。以前街道和巷道肮脏恶臭，因为大家都随地大小便，现在建起了“公共厕所”，整个居民区都动员起来，禁止不良行为，保持街道的卫生，人们轮流打扫院落和相连的街区。

我问：“谁收获园子里的蔬菜？”普布回答，种菜的人都有

权按劳获得相应的蔬菜，但实际上，许多人帮助种菜并不是因为特别想得到一份蔬菜，而是出于美化居住区的想法，这些人会把菜送给穷人，我没来得及了解这是出于慈悲之心呢，还是发扬社区精神，或者是轻视蔬菜。

人们会对居民区里的那十五名有房产的贵族怎么样呢？居委会得到了关于他们的充分报告，于是着手对过去进行简单的调查。普布说：在原政府的统治下，市民不能抬头。噶厦任命了一批头人，对每一个手工艺作坊进行控管，他们是一帮随心所欲殴打工人的打手。除了强加于人们的繁重租子，还有繁杂的苛捐杂税，特别时逢“传召大法会”，大昭寺（原文如此。应是哲蚌寺。——编注）的“铁棒喇嘛”授权控管拉萨市三周，会有多达六十多种新税向人们课征。女人因多梳一根辫子而被征辫子税，人们因穿皮鞋而被征皮鞋税，因为拥有狗或者猫而被征猫狗税，如果狗脖子上拴铃铛会被加征铃铛税，养殖盆花的被征花盆税，而且每盆都被征。传召大法会正逢新年，往往会下雪，如果你所在的街道、院落下了雪，你会被征“赐雪税”，如果清扫了积雪，你还会被征地湿税。逢事若是拿不出纳税单，就会挨鞭笞，或遭受重罚。

旧市政府参与组织叛乱，三月十日那天，向全市男女老少下命令，叫人们到罗布林卡集合，保卫达赖喇嘛，阻止他前往军区大礼堂看演出，散布谣言说，汉人要绑架达赖喇嘛，敦促所有善良的西藏人去罗布林卡守住达赖喇嘛，甚至躺在他的车前，用身体挡住路。没有参加叛乱聚会的人要被罚款，女人罚五十两银子，手工艺人罚五百两。后来市政府开始征召所有的男人当兵，年龄从十六岁至六十岁不限，不入伍者罚。他们称是在捍卫宗教，保卫“西藏国”，因此开始多数人都应征了，但后来他们亲眼目睹了叛乱分子自身将圣地变成了战场，看见他们强奸尼姑，挖出市民的眼睛。

“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贵族和噶厦使藏族人民深受苦难”，普布得出了结论，“现如今生活好起来，不是贵族的功

劳，而是共产主义者的。”

接着这个开场白，普布说在他们住宅区有房产的十五名贵族，有六名没有积极参加叛乱，其中三名是进步贵族，一名重病缠身无法参与任何活动，还有一名离家出走，第六名刚旅行归来，因为回来的时间不够长而未被纳入任何地方活动。这几名贵族的生活一如既往，他们的家产也没被碰过。

九名贵族是叛乱积极分子，其中三人逃到了印度，另外六人在战场上被俘，被关押了起来。这六人中的一人曾是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的高级官员，叫仁巴（Ramba），他参加叛乱后表示后悔，获释，又回到了家。另外八名贵族房产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家眷住这些房子。住在居民区里的叛乱分子的家眷都平安无事。神职贵族无家室，像次雍（Tsrijong）这样的，他们的房产根据地方的需要，有可能被居委会征用。

召集了几次“批斗大会”，声讨两名贵族，夏扎（Shadza）和皮绕巴（Piroba），还有两名头人打手，一个是船老大，另一个是木匠老大。整个南街区的人们都赶来参会了。还有一个大叛乱头子，叫察绒（Tsarong）^①，住在该居民区，要求开他“批斗大会”的呼声很高，但察绒已经年过七旬，还没来得及开他的批斗会就毙命于中风。

普布说：“人们还要求召开另外六名贵族的‘批斗会’，但没开成。”好像是因为“三废除”的运动已近尾声，所以不再召开“批斗会”了。收割庄稼的日子即将来临，接着是民改。“批斗会”的目的不是惩罚所有的贵族，而是唤醒民众，找出过去受苦的根源，让人民认识自己有力量结束这种苦难。这样

^① 对来藏的外国访问者来说，都熟知察绒，知道他并不是出生于西藏非常古老的贵族查绒家族，他曾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园丁，得宠数年。原察绒因效忠中国而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从布达拉宫宫顶扔下，一同扔下去的还有他的儿子，这样便断了察绒家族传宗接代的根。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一古老的贵族名称连同其财产、女人都赐予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轻的宠儿，该宠儿娶了察绒的两个女儿及其儿媳，成为西藏最富有的人。该察绒一直与美国保持联系，是劳沃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在西藏的东道主。

的目的通过控诉罪大恶极的贵族而基本达到了，没有必要控诉每一个人。

在这些居委会里遇到的最兴奋的人是那些常年遭受拷打的人，他们突然焕发了生命力，在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值得关注的人类故事，只是有的知道怎样讲得好，有的则不知道。

兰多（Lando）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名三十六岁的妇女，生来就是一名家奴。八岁时，她父亲被打瘫了，卧床不起。工头上门叫他出工，看到农奴起不来，就以“装蒜”为名，在床上鞭笞他，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八岁的女儿见父亲死去便依偎着妈妈痛哭，工头见状，边骂边朝妈妈的腹部踢去，拽着女孩就走，强把她拉去当了农奴。她放羊，和羊睡在一起。她多次遭强奸，被发现怀孕后，被打得死去活来，后以“除掉羞耻”的名义被卖给了另一个主人。一次是她的主人强奸了她，这引起了主人夫人的嫉妒，于是她被吊在房梁上被打得昏死过去，之后又被卖了。兰多过了二十八年这样被毒打的日子。她曾祈求上苍赐予她死亡，她恐惧自杀，害怕来生遭受更大的苦难。在这些岁月里，她一点都不知道她妈妈是否活着，因为不识字使农奴之间很难交流。

当工作组渐渐结识农奴时，问兰多是不是受过压迫，她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从来也不曾有人谈到过“压迫”，只是说“命”，她认为所发生的一切是她不可避免的“卡玛”，即命中注定的。

于是，工作组简化了问法，问：“你的主人是鞭打你，折磨你呢？还是送给你粮食、种子呢？”这下兰多明白了，她用极其生动的表述，喷吐出了她的苦难生活，这使她成为所参加的第一场“控诉会”上的最佳演讲者。她使整个会场呜咽抽泣，人们高呼“打到农奴制！”她被一致推选入平息叛乱、增产增收委员会。

兰多成为有名的“积极分子”。她感到生活刚刚开始。工

工作组帮她找到了她认为已经死了的母亲。两人现在生活在一起。为了改进农业种植或做些买卖，兰多将学文化，学政治。共产党打开了她的新生活，她对共产党忠诚的热情高涨，显而易见。

人类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的觉醒在以往的社会中常发生，但这通常是以人类付出沉重代价，以流血起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很少有像如今西藏这样经过如此精心的社会工程设计而实现的。要不是遇见这些新觉醒的农奴是无法充分理解派送工作委员会的意义的，工委就像军事上所称的“特遣部队”，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去承担特定的任务。这支部队是由中国共产党派出，进入根本没有共产主义者，只有农奴和其主子的西藏，它的任务就是以最小的人类代价解放和改变这个西藏。

这项任务的完成仅靠一场昌都战役的胜利是不行的，靠政府发号施令也是做不到的，只有靠唤醒全西藏可以抓住生存机遇的人民来实现。这就是一九五一年没有强行改革，容忍农奴制长达八年的原因所在。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的贵族，至少使他们同意将庄园卖给政府，这就足够了。不管他们是完全还是非完全忠诚，有他们的参政，足以保证西藏从过去向现在的和平过渡。忠诚和活力、动力将会来自农奴。这些通过工作组全都一一实现了，如今叛乱也平息了。

忠诚的贵族，经过教育的僧人，组织起来的手艺人，作为新兴的工人阶级都赢得了各自的地位。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场革命的准备阶段，这场革命正在乡村掀起，要靠觉醒的农奴来完成。

第七章

拉萨东边的村庄

我们先要采访的地方之一是拉萨东边的一个村庄，要去和一个新选出来的农民协会的成员会谈，向他们了解以往各种类型的农奴。我们的车在大昭寺的右边转弯，进入一条狭窄弯曲的城市街道，街道两边是石头砌成的墙，经过摆在路沿上的市场，还可见在楼房之间隐蔽处的店铺，来到跨越拉萨河东的一座桥上，这里可见一千五百英里长公路的起点，该公路穿过十四座大山脉，跨越十一条不同的江海河川，通到四川，建于一九五四年。我们在桥头停车数分钟，因为桥身狭长，只允许单车道运行，人来车往只有靠桥的两头进行控制，我们排在一长队进城赶场的农用板车和毛驴后面，附近散停着几辆加宽的运输卡车。桥下河水湍急，波涛翻滚；远处，湛蓝色的天空上，白雪般的云朵翻卷蠕动，与青色山峦遥相呼应。

翻过山冈，驶过草原，反复地绕来绕去地开了几英里，来到一座叫蔡公堂（Tsa-kunmtan）的乡镇，名字来源于两座庄园。我们在这里被一队老乡拦住，他们敲锣打鼓，挥动小旗，前来迎接。我一下车，老年妇女就上前抓住我的手，表示欢迎，小孩子们围上来，欢快地跳起了舞。

我们徒步继续向前，大股举旗的人们尾随而来。转过一片

牧场，来到一片绿树掩映下的露天草坪上，近处有一座快要坍塌的楼房，显然是一片杂乱无章庄园的附属建筑。一张巨大的白色篷布，用绳子支撑开，捆扎在周围的建筑物和树木上。篷布上绣满了藏蓝色的经轮、万字符这样的“吉祥符”，高高地悬挂在草坪上方，如同一片飞起来的屋顶。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就是有名的典型藏式天篷，用于夏季野餐，遮蔽直射的太阳，又便于通风和观景。天篷下摆放了一个长方形的矮脚桌，上面摆着茶、点心，桌两边是典型的藏式卡垫座位，用小块、僵硬的厚垫子做成，这种垫子中间有一折合处，可以一折为二，很像土耳其的脚垫或大跪垫。这些都方便于聚会，便于携带，地面不平也可以很稳当，可以坐两个人，摊开变成床垫的高度就可以坐四个人。这种垫子外表破旧肮脏，但他们很快为我们覆盖了一层色彩鲜艳的手织毯子。这里总体效果虽显临时，但仍不失为绿树环绕中，草地上的一个节日宴会厅。

欢迎我们的队伍解散了，围绕这个庆典的圈子边站着，而我们被介绍给各位领导。彭措（Puntso），五个月前还是一名家奴，现在成为乡农协的一名委员，农协已经开始行使地方政府的职能；普布，任该谿卡（Chika，藏语庄园）农协的主席，从前是堆穷（duichun）农奴，这是我们即将了解的一种农奴类型；旺多（Wangtu），是本乡农协的另一位委员，从前是僧人，现已离开寺院。在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后——之所以短是因为讲话要翻译成两种语言，先译成汉语，然后是西方语——彭措告诉我们，乡农协有三个分会，一个设在叫蔡（Tsai）的大庄园，另一个管辖两个庄园，公堂（Kumtan）是其中的一个，第三个分会负责三个较小的庄园。

该乡有三百二十九户人家，一千一百七十二口人，其中六十九家曾经为差巴（tsaiba，由于村与村方言发音的不同，该词的发音也有所不同）类型的农奴，这类农奴拥有相对稳定的自用的小块土地，他们以向主子出定额的劳役的方式缴纳地租。一百一十七户人家是堆穷类型的农奴，与差巴相比，这类

农奴的土地不太稳定，他们以部分收成缴纳地租。一百三十户人家是朗生类型的农奴，这类农奴就是家奴和田奴，与奴隶没有多大差别（十三户是上等阶层）。

该乡可耕地均按藏克计量，共有七千九百二十三藏克土地。“藏克”是粮食的计量单位，一藏克地即可种一藏克粮食的土地，一藏克粮食似乎重二十七至三十磅。我们粗算了一下，一藏克约为中国的一亩，合六分之一英亩，这样算下来，这里的可耕地约为一千三百多英亩大小。这些土地曾经属于十三户领主，领主既专指贵族家族，也专指寺院头目。该乡贵族中的四人和五座寺院参加了叛乱，他们的土地因而被没收。这一年，这些土地里的收成将全部归农奴所有，从那时起，农民开始组织乡、村一级的地方政府，这为未来的选举做好了准备，未来的选举应该是建立永久性的西藏自治区的体制，并为最终的土改制定出方案。

我们所在的这个公堂庄园，还有周围的土地和农奴曾经属于西藏大贵族之一的凯墨（Khemey），他家世代做官，拥有众多庄园和农奴。凯墨是达赖喇嘛特使团成员之一，随达赖赴京签订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后来凯墨成了一个谜，再后来成为叛乱的公开组织者，并随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尽管这里距拉萨很近，但他没有住过此庄园，实际上都不怎么走访这里。他把自己的各种庄园交给随从管理，自己则投身于仕途。在该乡他不仅拥有此庄园，而且还有两座略小的寺院。

个人拥有寺院，我对此不得其解，所以问：“你是指凯墨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支助吗？向寺院进贡吗？”

回答：“不是，我们是指寺院给凯墨进贡，寺院向民众搜刮财礼，而且还放高利贷，凯墨享有喇嘛所得的五倍，只要是寺院所得，他都翻倍索要。”

在该庄园，算上小孩，凯墨共拥有三百零三个农奴；拥有二十二户差巴，四十五户堆穷，十八户朗生。这些农奴每年耕种两千五百藏克（四百二十英亩）土地，其中九十六英亩由凯

墨的随从直接管理，由其朗生出劳役；其中二十二英亩分给他的差巴耕种，差巴以出劳役偿还地租；剩下的三百多英亩出租给差巴和堆穷耕种，后者以部分收成抵地租。官方对租子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并不繁重，不过占收成的四分之一，然而，在农奴最终交租子时，他们偿还的不仅是租子，还包括借贷的种子、农具、牲口，还有口粮，所有这些都要加上高额的利息，约占他们所得的百分之七十，这样他们的所得不是作为地租、房租，就是作为债务全都进了凯墨的腰包。

三种类型的农奴都必须听从领主的使唤，出苦役，只要领主认为做得不对，农奴就得忍受鞭刑。农奴想结婚必须得到批



德吉，曾经的农奴，如今的“积极分子”和她的丈夫在一起。



拉萨东边村庄里有希望的小字辈

准，哪怕是短暂离开一下庄园都必须得到允许才行。如果领主向农奴施刑，甚至杀了农奴，领主是免惩罚的。当然三种农奴间也有区别，彭措解释说：“差巴和堆穷就像领主的物品，而朗生则是领主的奴隶。差巴和堆穷通常有家住，这是经允许而在领主土地上盖的，按习俗这种居所为农奴所居，但这种住所是盖在领主土地上的，因此自然都归领主所有。朗生没有家，通常睡在领主家的厨房、仓库、马厩或领主

房外什么地方。朗生很少拥有稳定的家，一方面因为没有住处，另一方面因为领主可凭喜好随意拆散夫妻俩，将妻子或丈夫送给别的庄园。差巴和堆穷虽然可以干点私活，但他们常常会被领主唤去出苦役。而朗生是无法干私活的，一天从早到晚

都得听从领主管家的使唤。朗生有时也会卖或被当礼物送人。领主女儿嫁人，会把朗生当嫁妆带到婆家，而差巴和堆穷是无法随嫁的，因为他们与土地拴在一起。”

“差巴和堆穷的主要区别是差巴以劳力偿还地租，而堆穷则以部分收成抵地租。相比起来，差巴的日子要稳定一些，因为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在所有地契上都将差巴列为土地的一部分。堆穷是近代的产物，他们多数都是出逃的农奴，或被寺院赶出来或出逃的僧人。因为在西藏没有主子的平民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出逃的人都要在新的地方找到新的主子，一旦被前主子发现，他们就会被带回去，但往往是向原主子缴纳人头税而避免被带回。”

从他这段解说，我概括出，差巴似乎是最早的农奴阶级，追溯到游牧部落定居平原，地主分给其家奴小块土地，家奴以服侍地主作交换；朗生则是传统奴隶制的产物；堆穷说明了农奴制的解体，一种朦胧的自由业民的崛起。因此，我问：“不能说，堆穷就是中国其他地区解放前的佃农？”

地方领导都摇头否认。彭措说：“不能那么说，佃农可以离开土地，而堆穷不能，除非逃跑，那是很危险的，而且，领主可任意将差巴、堆穷降为朗生，当然这么做是要有理由的，否则有悖传统。然而，领主会强加于堆穷无数的债务，甚至强加于某种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例如此债务含有极高额的利息，这样差巴或堆穷偿不起债务，其房子、财产和牲畜就会被领主拿去抵债，进而就把他们变成了朗生……”

* * *

这个简单的介绍会后，我们记者团分成几个组，分头走访了这些刚获得解放的农民的家。我先选中一位精力充沛、样子聪慧，年龄四十一岁的妇女家。她叫德吉（Deidji），以前是朗生，如今是乡农会副主席，实际上下一步就是新地方政府的成员。她身着特别场合才穿的最好的衣服，一条黑色无袖长袍，

用一种叫氍氍的家纺粗呢制成，袍子里穿一件白色衬衣，料子有些厚，是家织布，腰间束一条色彩鲜艳，有横条纹的围裙，也是手工纺织的料子。她的右手腕上戴一骨质手镯，发辮中辮着一根鲜艳的发带。

我们走过拱形廊道，穿过鹅卵石、泥土混合铺就的粗糙院子，一直跟着我们的一群孩子见我有照相机，都非常愿意被拍照，以至于我难于选到特写镜头或人少点的镜头。农奴制在他们那小小的身躯上留下了营养不良的痕迹，但他们那种热情的精神状态迅速反映了他们对短短五个月自由的激动兴奋。跟着我们的还有几个男子，他们抬着厚卡垫，以备我们随时使用。在他们中间我遇见了德吉的丈夫，比德吉长十岁，个子比她高得多，身穿的衣裤也是用氍氍做的，身上的衬衫也是家织土布制成的，不同的是在一身土布土衣下配一双高筒皮靴，戴一顶宽边的草编帽。

穿过直对着牲口院子的一道门，我们进入被德吉称为“我们漂亮的新家，七天前刚得到的”房内，当我看到这个地方后，心想德吉该不会有意自嘲，然而从她神情表露出来的是自豪感。带着这种自豪，她说：“这以前是仓库，用于堆放干牛粪的，但农会把它打扫出来，分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她是真的喜欢这地方。

从明亮的太阳地乍走进这间黑房子，我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房子里的一切，这房子大约七点四平方米，一块肮脏的地面，土石墙壁，墙上开两个口子，每个大约一百一十七平方厘米，把光和空气送进房内，开口上装有铁条，可挡住大型动物。因为墙壁很厚，墙上的开口又不够高，对我来说，由此引入的光线似乎很不足，因为开口上未装玻璃，我认为这样有时带入的空气又太多了些。房里没有家具，只在角落处见到一张板床，上面铺着黑色的牦牛皮，还有一摞叠放整齐衣物，其他家当放在门口，一个小板凳，一把提壶挂在墙上的铁钉上，可见以前就一贫如洗。我后来去看了她搬

出的地方，才理解了德吉之所以感到自豪的原因所在。那里也是一个土石结构的仓库，但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墙上只有一个开口，房顶是漏的，遇到雨天，地板常常泡在水里，很长时间都干不了。因此对德吉来说，这间七点四平方米的昏暗住所真是“漂亮、干燥”的家啦。

卡垫拿来了，在地板上擦好，我们和德吉、她丈夫彭措次仁（Puntsotserem），两个翻译一起坐下，还有其他所有能够挤进来的人，倾听德吉的故事，听她以往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两个孩子的希望，一个二十一岁的儿子和一个八岁的女儿。

德吉说：“我们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在给领主干活。我先把庄园地扫干净，家具擦干净，然后下地播种，收割庄稼。在地里帮着用肩膀拉木耙，平整土地。还要饲养十七头牦牛和奶牛，要趁新鲜给牛挤奶。还要给拉萨领主背送酥油和奶酪。稍有空闲，就得纺毛线。”讲到这里，她丈夫补充说，我给领主当马夫，同时饲养八头骡子，往拉萨运青稞、盐巴、糌粑（tsamba）、干牛粪，还给晋美城里的马运饲料。儿子从十五岁起就给领主当放羊娃。

德吉接过来讲：“干这份活，领主给我们的报酬是每月每人两藏克糌粑（五十磅青稞面），每年给够做一套衣服的氍毹，再加一双靴子，孩子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从我们的口粮中省出来给他们吃。我儿子当了羊倌后也得到两藏克糌粑，领主原本答应给他衣服，但却从未得到过。没做羊倌前，儿子在庄园干活，本答应给他一藏克糌粑的，但也从未得到过。因此，我们粮食一直不够吃，只好欠债，借着吃。”

我们问：“除了糌粑，你们还有什么食物？”

“我们得到酥油，但不是真正的酥油。领主寺院的僧人喝的酥油茶，在打制时，常把浮在表面的那层油扔掉，放进农奴的桶里，就是这样的酥油我们有时可以得到半斤八两，但也不是月月有，要看扔掉的有没有那么多。我们也得到茶叶，但也是熬过好几道后的。过年我们可以得到些肉和蔬菜。他们招待

我们吃面条，里面放了肉末和圆根。过年的头五天我们每天可以吃两顿饭，没有多少肉。本庄园有二十三户朗生，二十三户全体可以得到一条牦牛腿。如果遇有死羊或死牛，我们就有肉吃，否则全年就只能吃糌粑。

“我们从未从领主那里得到过一个铜子儿，但必须要有一两个铜板、一条哈达，这是获准结婚或请假外出时必备的。逢此时，我们得买烟草、茶叶和哈达献给主子才能提出请求。给领主干活，口粮不足，就得想法子补充口粮。我们求领主的管家租给我们一块地给自己种点口粮。按说朗生是没有权利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白天所有的时间都属于领主，但只要献上一条哈达，连求三次，管家就会租给我们四藏克土地（三分之二英亩）。

“我们租种这四藏克地，必以两点五藏克（七十五磅）的收成还地租。实际领主要的比这个还多，因为领主用的是黑心衡量器，而且送去作验收的粮食也从不退还，所以我们真正偿还的粮食几乎已达四藏克。白天一整天我们都在领主地里干活，只有夜里才能给自己干。有时朋友帮我们出劳役，这样我们就可以种种自己的地。犁地我们得花钱雇牲畜，一头牲口犁地两天，要花三十两银子（约六毛钱）。年景好我们可以收十一藏克粮食，不好，只能收六七藏克，一般收九藏克。收成的好坏还取决于我们出工的情况。我们几乎没有时间给自己种地，所以，一年下来，即使能打个八九藏克粮，也就够抵租子、种子和租牲口的，收成好，可以给自己剩下点，不好，我们还会欠更多的债。”

讲到这儿，丈夫接过话头，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晋美的女儿出城到庄园来住。她有一个漂亮的马鞍子，要求好好保管，于是我把马鞍拿上了二楼（上层阶级都住在二楼，一楼是仓库和佣人房）。两三个月后，管家把我叫去，说那马鞍不见了，称我是贼。我被大号皮鞭整整抽打了一天，逼我承认。这样的指控多数是捏造出来，用来陷害农奴，农奴们

往往屈打成招，而我死不承认，因为我知道是管家本人偷了那马鞍。

“地窖里私设监狱，里面没有光线，没有盥洗，没有大小便的地方，只有土石地面。他们把我拉出来再次抽打。就这样把我拉上拉下，打得我皮开肉绽，大腿上的肉一块块的掉下来，这些伤疤至今还在。见我还不承认，他们就把我拖上了布达拉宫法庭，之后把我投入那里的监狱长达九个月之久。管家封了我的房，鞭打我的妻子和我那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他们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我从布达拉宫放出来时，变得一无所有。”（这里提到的是他的前妻，前妻和老母亲早已不在人世。）

一位与我一道采访德吉的记者说：“这是我头一回听农奴的讲述。我们一九五五年来藏时只能跟执行长官和领主交谈，因为当时北京有协议，不变动贵族的统治权。外来者有机会与农奴交谈，恐怕还是头一回。”

我们问，现在过得怎么样？德吉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享用了无息种粮，再也不用为献哈达、送礼的事犯愁了！晋美是叛乱分子，逃到印度去了，他土地上的收成今年全归我们所有了。以前在晋美管家的监督下，我们耕种四百七十五藏克粮田（七十九英亩），今年合伙干，收成我们都有份。每人一份，而我们还得到了我儿子的半份，夏天，他去内地上学前，也下地帮着干活。这样我们从大田可以得到两份半，还可以从我们自己那块小田里得到收成。今年收成肯定好，因为，我们有时间在地里干活了。今年的收成至少要比种粮多六倍。粮食一下来，我们就会有足够的口粮了。”

德吉的丈夫带着苦涩的表情说：“这种日子本该八年前就有的，但由于领主处处阻挠，噶厦暗地破坏，致使这种好日子今年才到来。尽管如此，我还不能说就过得很好了，因为我们还喝不上酥油茶，虽说我们还喝不上多少酥油茶，但至少现在可以清静地喝茶了，不用害怕什么了。”



“老实交代！低头认罪！”从几百名农奴口中喊出

“三大领主搞叛乱，反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罢免了他们，使劳动人民得以亲手捣毁皮鞭，砸烂枷锁和刑具。我曾被投入监狱，铐上枷锁，他们为折磨我而特制了一副木手铐，这回我亲手砸毁了那副手铐子。

“我们现在还记得当初领主是怎样编瞎话骗我们，诋毁共产党的。他们说共产党吃马肉、狗肉，抢女人，夺孩子，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瞎话。从解放军开始修公路起，我们就知道他们撒谎。领主说公路只对汉人有好处，但实际劳动人民都发现了修路的好处，凡是参加筑路的人都得到了报酬，还得到了衣服和鞋子。人们用修路所得给自己买了金耳环，添置了大骡子。

“甚至从那时候起，一些劳动人民的日子就开始好过了。如今看到丰收，日子对我们来说好多了，相信孩子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好。我原来总想送儿子上学识字，学点手艺，如裁缝

什么的，可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已在内地上学了，将来回来，会成为有技术的工人，他再也不用像我那样，被繁重的负担压弯了腰。就连我那八岁的女儿都上了拉萨小学。”

德吉接过话题说：“过去我们头上有太阳，但那属于领主，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太阳。就连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开始受教育了。我被乡里送到拉萨，当了筹委会的‘观察员’，亲耳听到宣布民主改革开始。在政府的房子里，我和贵族坐在一起，整整二十一天，我听人们说，乌拉（ula）差役不复存在，农奴制不复存在，政府将赎买贵族的土地，把它分给耕种者，我们的农会将成为政府，因为人民必须的自由和法律可以由自己决定。”

“我听到班禅额尔德尼亲自宣布改革开始。二十一天我领悟了许多。”

提到班禅额尔德尼，她迅速低下了头，随着这轻微的动作，她双手合十，做祷告的手势，身子开始前后摇动，双眼热泪盈眶，老泪顺着面颊淌下来，她没有擦拭，接着说：“多亏了共产党，我才能坐在卡垫上，在这间干爽的房间里，谁也不能把我赶出去了。”

德吉说完这番话时，这间小黑屋子里的人都流下了热泪，农民推选她进政府的原因在此是显而易见的。她天生就是一个演讲家，倾吐了藏族人的心声，用激情、诗情和热情表达了人民的要求。

* * *

采访了德吉，下来的采访不会有什么高潮了，尽管如此，我们还得采访另外两种类型的农奴。我们被稍微耽搁了一会儿，因为德吉坚持让我们看看院子那头她以前住过的漏雨的小茅屋，这样就可以比较出地面虽肮脏但干爽有多好了。然后，我们去看了另一个院子，访问了普布，曾经的堆穷，如今庄园农会的主席。

他的房子的确比德吉的好多了。那是一间住房，而非堆粪的仓库。房墙也是土石结构，地面也肮脏，但房子大约十平方米（一百零八平方英尺），有一个算真实的玻璃窗，还有一块门廊样的地方，也是土石结构，没有顶但有一道低矮的石头围墙，给人有家产的感觉，也使人有地方可坐。令人不解的是那里坐着一个女人，高高地坐在一个小型的锯木架上，靠一根从树上砍下来的，剥了皮的细木棍支撑着，她的状况看上去比德吉差远了，她已经完全瞎了，显得非常衰老，我还以为是普布年迈、衰老，快要死的妈妈呢，听普布说这是他的妻子，我掩饰不住惊讶表情。

普布和她结婚时，她是个差巴，即数百年来有较稳定土地的农奴阶级，每年靠劳动偿还地租，她的眼睛失明后，丧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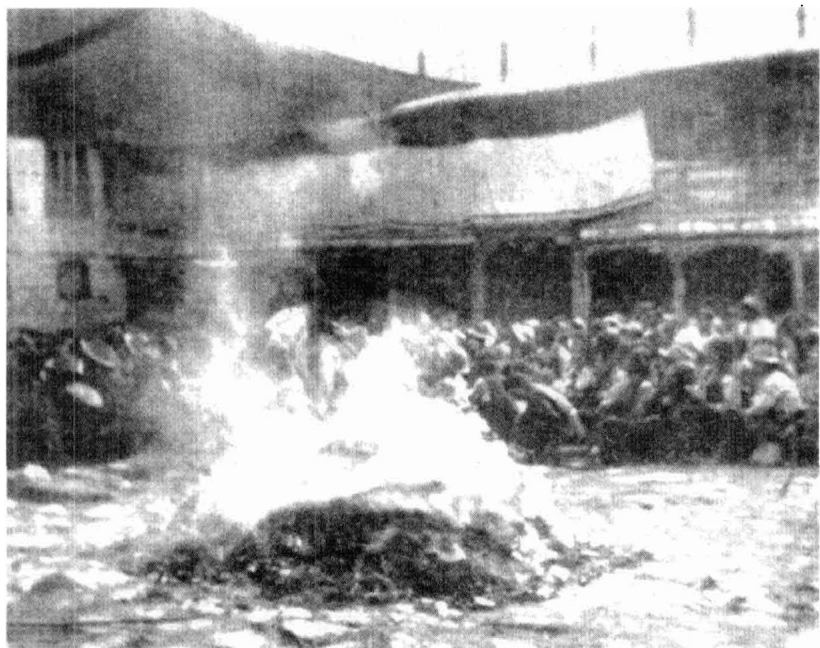
一名女奴在“控诉大会”上控诉农奴主

劳动能力，因而失去了差巴的地位。普布自愿替她干那份活，实际上，在她的一只眼睛因沙眼而失明时，他就在帮助她，而那时的她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她双眼都瞎了之后，普布非常愿意继续干她那份活。出于为自己的目的，而非为普布，管家决定让普布继续干。对普布来说，用劳动还是用收成偿还地租，没多大区别，就随了领主的便利，反正怎么做，农奴都很艰难。但对普布的妻子来说，虽瞎了，只要知道自己的差巴地位还在，土地完好，就心安理得了。

普布属于扎什伦布寺，该寺在班禅的领地上，离拉萨有好多天的路程，虽然他出来了，实际他依然属于那里，靠每年缴纳人头税获准放行。听他的一个邻居说，普布原来是僧人，为了结婚离开了寺院。看得出普布有一段心灵创伤的故事，可能是他曾经与另一位女人结过婚，后又失去了她；也可能是现在的妻子年轻时很漂亮；还可能是现在的妻子曾是有一小块土地的寡妇，她需要有个男人，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抑或是普布觉得，妻子的瞎正是对他人品的一次判断，因而用离开寺院来证实。这一切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怎样，他在蔡公堂住下了，靠向扎什伦布寺缴纳人头税获准离开，并且靠给晋美出乌拉差，靠以粮抵租，住上房，种上地。他的这种命，直到几个月前才结束。如今，他已是一个自由人，成为庄园农会的主席，这蕴含着某些能力。

普布主要向我们介绍了领主对土地和粮食的记账内幕。他耕种八藏克土地（约一有三分之二英亩），用八藏克粮种（约二百一十六磅），年景好的话，可打三十二藏克粮食，相当于种子的四倍。用八藏克收成交租子，乍看起来并不过分，因为那只不过是收成的四分之一。然而，还租子给领主，用的是“大藏克”量器，这比普通藏克多好几磅，而且粮食打下来，先要送样品粮给领主，这种粮食从来就不退回，加上普布借种子欠下的高利贷，还有向领主借来的口粮、农具，这些都要偿还。



在农奴主院落里焚烧债务契约

普布说：“粮食虽然打下来了，但从来都入不敷出。俗话说，‘打完场，粮没了’，我的情形正是这样。”

除了主要来源粮食外，普布还有一些小的收入和支出账目。他收麦秸作饲料，用来饲养自己的两头骡子，也拿些去卖钱。他还收敛骡子粪，晾干后当燃料卖，靠这些维持自己的支出。他要给寺院缴纳人头税；他虽不用像差巴那样出乌拉差，但作为堆穷，他也要出相当部分的劳役，以偿还欠晋美的租子。收割时节，他得给领主收三天庄稼，修两天水渠，但逢汛期抢险，他就得无偿无时地出乌拉差。

还有一种乌拉差是派给农奴所拥有的牲畜的。普布的两头骡子收割时节必须给领主出两天工，逢年过节，他的骡子必须往拉萨驮运燃料，量特别大，骡子要驮好几天才能运完。这还不说，领主会强行让骡子出临时的乌拉差。去年秋天，叛乱分子在山南烧杀掠抢，晋美在那里有一个庄园，晋美命山南农奴

把打下的粮食往拉萨运，同时命蔡公堂的农奴从半道接，拉回拉萨。他要将他的粮食运出“骚乱之地”，而这骚乱正是其随从所为。

我问：“如果说堆穷可赚到钱，用以还债，那当堆穷，或当朗生，哪个强些？”

普布说：“主要的区别在于享有自由的大小。我有两头骡子，虽然骡子要向领主偿还乌拉税，但它们是骡子。我有租来的房子和土地，尽管租金高昂，入不敷出，尽管领主无时无刻会叫我出乌拉差，但大多数时间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活路，对朗生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全部时间都要给领主干活。”

* * *

出了普布家，在路对面是一个名叫朗玖（Ngoju）的差巴家。比起普布家，这家的房子又上了一个台阶，虽然仍是土石结构，地面肮脏，但房间面积相比大多了，约十四平方米（一百五十平方英尺）大，有两扇有真正玻璃的窗子，小石头门廊相比也大些，门廊上手工活正在进行，家人捆扎松枝条，准备拿到拉萨去卖，拉萨节日期间香火旺盛，燃点的就是这种松枝。

朗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有这间比较大的房子，是因为他家有四个壮劳力，他妻子，他两个成年的儿子和他自己。全家从分给四口人的土地上收获十藏克粮（约一点六七英亩/约十点一四亩），腾出一个劳力全年给领主出劳役以抵租。儿子没成年那会儿，成年劳力只有他们夫妇俩，只能分得现在土地的一半，还要出一个人的劳役偿还租子。给领主服劳役，农奴得自备干粮，因为此劳役是抵所租土地的租子。

我问：“你给领主出的那一个人的劳役，谁来定出工的日子？”

朗玖说：“领主定，但有习惯，按习惯，收割时节，领主

不应该占去全部的时间，通常是占五天，让五天，但领主并不总按风俗办，只要领主需要，农奴就得出，除此之外，没别的法子。因此，家中有四个劳力就比较好，腾出一个劳力，整个用于给领主服劳役。”

在朗玖门廊里的其他农民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我们开始谈论各种类型的农奴及其来历。差巴历来就有，他们总与土地拴在一起，这被列在过去世世的地契中。朗生也历来就有，但他们并不总与土地相连，他们可能被卖或送人，或作为嫁妆随领主女儿出嫁。堆穷几乎没有本地人，而是从其他地方坏主人处逃出来，到此处寻找到另一个主子的农奴。

他们说：“在旧西藏，每个平民都得有一个主人，否则，就是一个非法者。”

这样看来，堆穷似乎是农奴制解体的开始，是一种渺小的、模糊的自由制的开始。一个农奴逃跑了，离开家人、朋友，冒着被抓、被拷打，甚至被杀的危险，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寻找另一个可能会好点的主人。然而，一旦被原来的主人发现，就可能被带回去，不过，原来的主人往往同意收取人头税，农奴以此可豁免。堆穷的赎买在西藏不断增加。

讨论从农奴类型转入领主可将一种农奴变成另一种的话题时，有一个人说：“逃跑者刚到时，领主常把他划为朗生，而非堆穷，但如果此人身体强壮，看上去还有逃跑的可能，领主就让他做堆穷。”

另一个人说：“朗生是一种农奴，有的人世代就是朗生，但也有的原本是差巴或堆穷，因欠下还不清的债而被领主降为朗生。落入此境的他们会被收走住房，牵走骡子，抢走鸡，去抵债，使他们沦为朗生。”

在这里参加讨论的一名农民就有这样的遭遇，从差巴降为朗生，但后来又变回差巴。我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是晋美庄园的一名差巴，因纠纷，管家把一部分农奴调到另一个庄园，在其他庄园我没有土地权而被降为朗

生，但后来我攒了一些钱，晋美又准许我再次成为差巴，并给了我一小块地。”

我问：“朗生怎么能攒到钱？”

他说：“解放军来到这个地区，他们需要燃料，这使干牛粪价格上涨，我捡牛粪，卖给解放军，攒下足够的钱，买了一大个的金耳环。（西藏人认为男子在耳朵上戴直径至少有一寸的耳环非常活泼，耳环吊在耳朵上的一只小圈，来回摆动，漂亮潇洒。）我被传唤回庄园，赶紧把耳环藏起来，但领主家都知道了此事，我一回到庄园就被晋美女婿鞭打了一顿，说我不服管教，但我心里明白，是因为我竟敢戴耳环。然后，他说，‘现在我再让你做差巴，但你必须把你的钱都用到我的土地上。’他是说如果我有钱，应该拿出来交付骡子、种子费。”

在场的人都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一名朗生因有积蓄而被升格，这真的少见。有的人则认为，要不是因为他以前就是差巴，晋美绝不会给他升格的。“传统的朗生”是很难被提升的，尽管如此，也有例外。曾经有一个马夫，他赢得了比赛，给他主人争了光，因而成为“宠儿”，于是得到提升。差巴或堆穷可升，也可降，因为他们的收入取决于收成。生养好几个孩子的差巴很容易欠债，因为要借粮喂养孩子，所以被降为朗生。

有少数差巴，占不到差巴总人数的百分之三，人们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富裕，都拥有自己的农奴。这种差巴把逃亡的陌生人“收容”进自己的家，让他们替自己给领主服劳役，偿还租子。有这种特点的差巴很可能被列入管家或管理员的行列，靠剥削其他农奴而爬上高等级。

第八章

我上布达拉宫

到拉萨的头一个星期，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爬上布达拉宫。很显然，布达拉宫是我们此行中最引人入胜的参观项目。看了别人写的书，我对攀登布达拉宫算是泄了气。书上说，布达拉宫高十三层，实地看也的确有那么高，不过无法数清层数，因为宫殿是嵌在悬崖峭壁上的。让我尤为不安的是一位英国作家这样写道：“要爬四百四十英尺高的石头坡道，还要攀登垂直的阶梯，这些阶梯散发着数世纪以来的酥油气味，浸透了几百年里朝圣者酥油灯中滴下的油——滑腻腻的，梯子的扶手晃晃悠悠不说，还时有时无。”

拉萨稀薄的空气，我连爬招待所里的一小节楼梯都气喘吁吁，想想十三层陡直的阶梯，真叫人不寒而栗！要说石头坡道，只要花时间，我还是能上去的，而陡直的阶梯是绝对不行的！

一上午的辛苦访问，下午按计划记者团将登上布达拉宫，晚上还要观看演出，这种日程对我似乎太多了，于是我叫凤凤替我爬布达拉宫，做好参观笔记。假如她去过后认为我可以爬，那我再抽时间自己爬一次，就抽全团其他人去日喀则的时间去爬，我已经决定不去日喀则了。凤凤揣着笔记本回来了，

记下了不少数据，说：“我想你会发现布达拉宫并不比你所做过的其他行程难。”

“从外墙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陡直阶梯，你能一气爬上去吗？还是爬完一层，再爬另一层？”

凤凤说：“我压根没见到什么陡直的阶梯。”我问她上到哪儿？她说上到了顶。

“到了达赖喇嘛的公寓？”

“当然！那是主要参观的地方。”

凤凤的诚实是出了名的，看来那位英国作家为了书好看有些添油加醋。我后来发现其他一些作家也把爬上布达拉宫写得“天花乱坠”，他们精心描写了本不存在的东西。也许与其相信别人，不如亲自去看看。一位十年前上布达拉宫的法国人发现“最伟大的达赖喇嘛的五座巨大陵墓萌生于红宫底层，穿透各个楼层，在宫顶露出五座闪闪发光的镀金宝塔”。红宫中确有好几座达赖喇嘛的陵墓，但只有五世和十三世的陵墓是“巨大的”，两座陵墓穿透三层楼，但并没有穿透宫顶。我的结论来自亲眼观察和实地拍照，我的导游也证实了我的结论。

凤凤说：“他们可能会从宫后的一条路把你带上去，那是达赖喇嘛走的路。他们说那条路要容易些。”我想，那是当然的了，达赖喇嘛每年冬天都住在宫里，他回宫本不该攀爬那些陡直的阶梯的。

我问：“从后面进去能看见整座宫殿吗？”

凤凤说：“无论走哪条路，都看不见整座宫殿，但可以看见它有多少层。要是从上面进入，自然看不见底层的東西，不过底层多是库房、仆人和侍从的住所。你将从达赖喇嘛的宝座殿开始参观。一九〇四年荣赫鹏（Younghusban）曾在此殿堂强行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从此殿堂爬三四层楼就到宫顶了，在那里可以看见达赖喇嘛的公寓和风景，接下来就去达赖喇嘛的陵寝。在下面几层里，唯一值得一看的是岩石殿，里面供奉着藏王松赞干布和他的两位夫人的雕像。你要愿意，可以下去看

看，但那要来回上下六七层楼梯。”

我们决定不去松赞干布的殿堂，提前一周确定参观的日子。

同时，我们每天都在河谷盆地看见布达拉宫。在拉萨，无论走到哪儿，城市、乡村、农场，拉萨的东西南北，布达拉宫永远高耸山巅，总是隐约可见，每一面都不同，每个角度都有着迷人的画面。20世纪初，英国驻拉萨代表，查理斯·贝尔（Charles Bell）先生称“布达拉宫无疑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建筑之一”。他说，宫殿长九百英尺，占据了红山的整个山顶，几乎覆盖了红山的各个坡面。他说，整座建筑施展着某种“令人无法识破的魔法”，此话出自一名英国外交官之口，足见其所蕴含诗意的非同一般。

加之其头顶碧空，脚踏绿谷，群山环绕，“魔法”一词正可谓恰如其分，这正是布达拉宫所产生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效果源于西藏常见的建筑风格，因为这在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据说，布达拉宫采用了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的宫殿样式，宫墙从根基向内倾斜，好像是沿着山的肌理修筑而成，门和窗的框架也向里倾斜，宫殿底部比顶部宽大，这使整个建筑如同从山中生长出来一般，宫殿的一部分就根植于山中。环绕宫殿的群山成为一种自然的背景，布达拉宫宛若镶嵌在巨型戒指上的一颗宝石。宫殿的上半部，中间深红色的部分是著名的红宫，红宫的两边是白色的建筑。再往上是宫顶，占据那里的是宽阔的栗色建筑物，镶着白色的边缘，嵌有四个金色图案。栗色建筑覆盖上带有数个镀金宝塔的金屋顶。

整座建筑都是不规则的，这不仅仅因为宫墙内倾，红宫两边的白色边际也宽窄不一。纵览宫殿整个结构，发现似乎没有一层是连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楼层，就连估量的宫高十三层也是个大约数。我从宝座殿爬到顶层，再下来，就说不清究竟上了三层还是四层，因为有许多楼梯，长短不一。从达赖喇嘛的公寓到陵寝红宫，我们上上下下，时不时爬过的是短小的楼

梯。所有这些不规则性都使宫殿更接近自然景观，就像山一样不规则。

从西藏有建筑时算起，布达拉宫的历史并不算悠久。早在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在此处修建过一座防御城堡，该城堡后毁于战火，其原型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宫殿的大部分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工程耗时四十年，在这个过程中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的摄政王将其死讯隐瞒多年，目的是为了利用民众对“神王”的忠诚，榨取工程所需的无偿劳动。整个工程全靠人力，由农奴完成。红宫修筑于那个时期。红宫东西两边的圆形古堡分别象征太阳和月亮。六世达赖喇嘛扩建并充实了宫殿。他特别增建了宫殿东北边上的一座建筑，即著名的“龙王宫”。在这些基础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于一九一〇年修建了白宫（原文如此。应为五世达赖喇嘛于一六四八年建成。——编注）和达赖喇嘛的私人殿堂。

上布达拉宫的路通常在南面，那是朝圣者走了三个多世纪的一条路。这里巨大的宫南墙，厚重、刷白，向内倾斜，被一条漫长的阶梯坡道所破开，经过一个长长的旋转，通往西边，拐过几道弯，阶梯便进入宫殿的下半部。达赖喇嘛住在宫殿时，就是在这些阶梯上躺着乞丐和病人，他们向来访者乞讨、索要施舍品。新年祈祷大法会时，这些阶梯还要承载庞大的持灯喇嘛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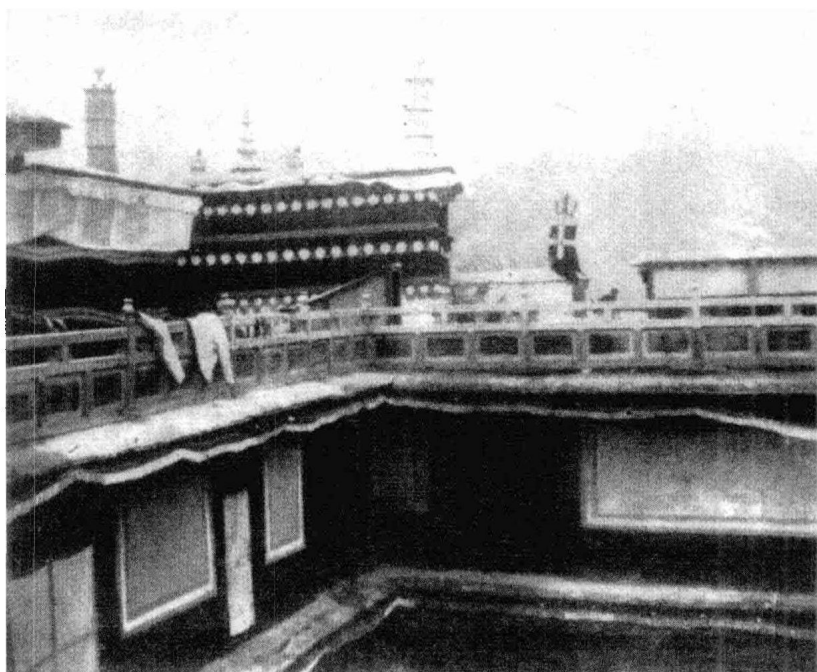
在这条坡道的脚下，沿南墙根有一座破烂的小村庄，住着为布达拉宫的日常维护而劳作的人们，他们清扫无穷尽、不规则的土石阶梯，身背水罐攀爬陡峭的阶梯，给上面的宫邸送水，上面没有水管装置，也没有电灯。小村里设有一个监狱，查理斯·柏尔先生有一次参观了那里，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被囚禁了一生的犯人。那是一间狭小、黑暗、密不透气的单人牢房，他问狱卒，“这种严酷是不是很快就能置人于死地？”狱卒答，“是的”。……前不久，一九五九年三月叛乱平息后，人们在布达拉宫下发现了一座地牢，里面豢养着许多毒蝎子，要想

更快地杀死犯人，就把他们扔进去。该地牢直到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才公之于世。如今这座地牢已成为揭露恐怖农奴制的罪证，在拉萨公开展出。

凤凰对我描述了从南面上布达拉宫的经过。“我们爬了大约两百个阶梯，来到一个挂着两个法轮的大门，进入大门，又爬了五十个阶梯，到了另一个门口，那里也有两个法轮，进了这道门，我们来到一个大型的‘跳神广场’。每逢节日，这里都要举行大型仪式，搭台唱戏，从这里我们开始参观达赖喇嘛的私人殿堂和白宫。我们来到一间大房子，里面乱糟糟地堆了一些肮脏的垫子和悬挂物，这里是东宫大殿，一九〇四年《拉萨条约》就是在这里强行签订的。叛乱期间，叛乱分子司令部也设于此。他们肆意玷污这些神圣的地方，随地大小便，整个地方污秽不堪，臭气熏天。这里还乱扔着盛装弹药和弹壳的空箱子，上面都标有英文。用来盛装圣水，供奉于雕像前的空碗也扔得到处都是。还有喇嘛袍、帽子和噶伦堡（Kalimpong）产的军用皮靴。”凤凰又补充道：“从这里我们爬上了宫顶，到了达赖喇嘛的宫殿，我想这是你将开始参观的房屋。”

我上布达拉宫和东宫大殿的路，不经过那座破烂小村，也不攀爬宫南大墙的两百五十级阶梯，我将从北路上去，走“达赖喇嘛”的路。我们上了南墙根下的一条汽车道，看见一帮妇女正在收割一小片生得参差不齐的青稞——导游让我们注意其中一位妇女，说她是贵族的女儿，现已与农奴为伴——汽车道在西面的一堵石头墙处向右急拐，接着再次向右转，山北面一条陡峭的坡道便出现在眼前，在这条道上，即使挂低挡攀爬也十分困难，最后只好停下来，我们的车再也爬不动了。

下了车，只见我们右面是高耸入云的宫墙，左边是一道护路围墙，脚下是陡峭的道路。从这里的墙向外望去，宫殿脚下，可见龙王宫，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六世达赖喇嘛修建的隐居宫。爬了一小段坡道，见到护路墙上裂出一个大口子，裂口正对拉萨市医院，可见医院院子里散落着空弹箱，还有四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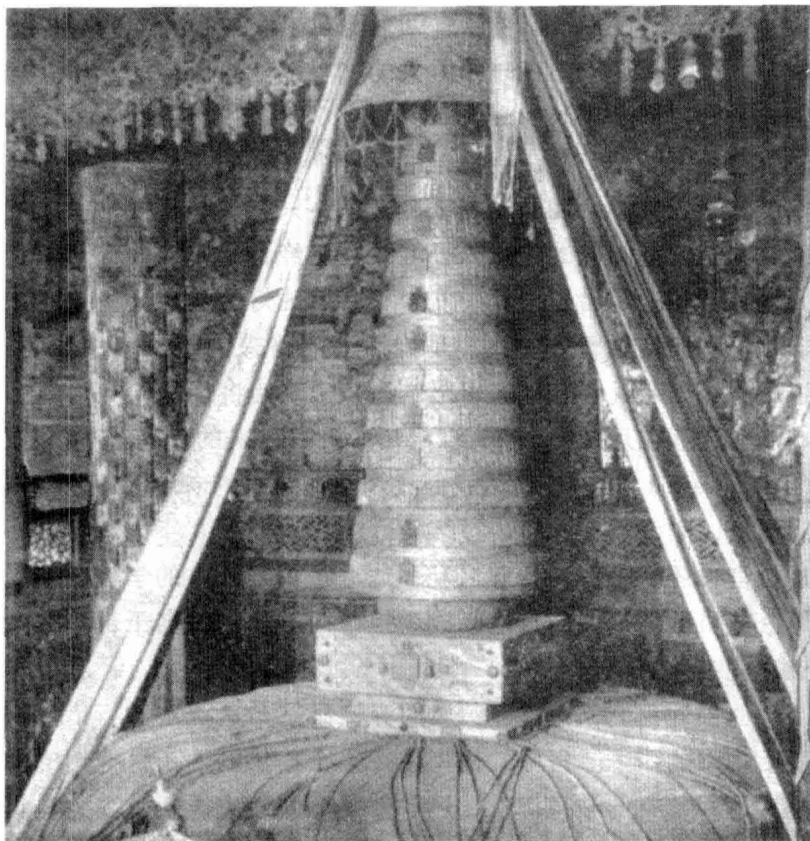
布达拉宫宫顶一隅

扔着的零星衣服。

导游说，“叛乱分子就是从这道裂口向医院开炮的”，其实，不用说，已显而易见，下面的医院就是靶子。

达赖喇嘛从这里坐上轿子，被抬上官去，这在如今的中国已经过时，并被视为一种腐败的剥削，但在西藏，轿子还是一种运输工具，使用它并不是上层阶级的剥削，而是健康欠佳者的需要。我们的车停下后，跟上来一辆吉普车，从上面跳下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看了一眼，不喜欢，又看了一眼，陡峭的岩石道，更不喜欢。我建议多花些时间爬坡，可以不用担架。

凤凤说：“你那样不等参观就会累倒。上次记者团来时，有的人爬到陵寝殿就累得不行了，以至于都没去成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陵寝。我认为那是个遗憾。”这番话很有说服力，我乖



十三世达赖喇嘛真身包金灵塔顶部

乖地躺倒在担架上。

这些人抬起我就走，好像在抬一件行李。凤凤很快就落在了后头。我连看都没法看一眼经过的地方，眼前除了天空，就是宫墙。突然，担架立了起来，我想自己会滑下担架，就死死地抓住担架两边的杆，抬担架者也尽力让我靠着担架撑杆。很显然我们正在攀爬陡直的阶梯。等路平缓下来时，我们钻进了一片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向外伸了一下胳膊便碰到了两边的墙，显然，脚下的道路狭窄，是一个黑色的隧道。我喊道要下去，但抬担架的人没理睬，凤凤早被远远甩在了后头。我只好尽量缩紧身子，不想让这个“行李”被屋顶墙刮下去。

黑暗变成了昏暗，可以看见空地儿了。抬担架的人降低担架，让我下来。我站在一间巨大的，有水泥地面的房子中，房子一边的顶部是斜长形的，光线从斜顶的裂缝空隙处射进来；另一边是搭了篷布的讲经台，带有一个正式的卡垫，差不多被帐子帷幔盖住了；墙面光秃没有上色，只有一些不规则条纹的旧丝绸。大量彩色的丝质帐子堆放在讲经台上，多的都耷拉到了地上。六七个男子，其中几个举着酥油灯，从角落里捡起帐子，把它们堆放整齐。我们是走后面的路来到了东宫大殿的，这里曾经是叛乱司令部。宫殿的清扫工开始将这里收拾就绪。

远远落在后头的凤凤到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土登次仁（Tudentsairo）同志，他是我们参观布达拉宫的向导。他非常熟悉这里，因为曾在这里当过多年喇嘛。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了布达拉宫，还俗了。一九五二年，他进了军区开办的学校，接受了公务员的培训。现在他已成为拉萨西城区的一名干部，布达拉宫就在他的辖区内。

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归属的寺院只是布达拉宫举行诸多佛事活动中的一个。宫中的僧人住在整个建筑的西头，他们的活是做达赖喇嘛的贴身侍从，还有就是照看陵寝。叛乱前，这里有一百七十名僧人，一百二十名都离开了，大多数临时在大昭寺参加政治学习。剩下的五六十名，有些跟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去了，还有些大家都知道的，叛乱结束后回家了，有一名在战斗中身亡。

他说，我们所处的房间是宝座殿，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此坐床，也是在此殿内，荣赫鹏上校迫使摄政王签署了一九〇四条约，当时十三世达赖为躲避英军逃到中国内地。通常，这所殿堂是那些卓有成就者出入的地方，墙上挂满了彩色的丝质帐幔，殿内摆放着长形卡垫，卡垫上铺着毯子，喇嘛就跪在上面诵经祷告。

他说：“过去，不允许带兵器的人进入该殿堂，叛乱期间，全副武装的叛乱分子于藏历二月十一日（西方日历三月二十

日)的上午进入这里,发现殿堂中间有喇嘛端坐诵经,便把他们轰走,将诵经卡垫推至两边,拽下帷幔帐帘,为他们进驻该殿除尘擦灰,然后将这些帐幔堆在角落里,把铁炮武器弹药放在上面。他们就此安营扎寨,殿堂下面几层楼全住上了叛军。他们在佛堂、走廊到处大小便。清扫工们现正在清理这个地方。”

土登次仁这时叫住那些清扫工,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盯着我们看,而不是做扫除。叛乱分子把这里搞乱已经很久了,到现在角落里还可见零星的器械。凤凰告诉我,头十天她第一次来这里时,都无法踏入黑暗的走廊,因为到处都是人的粪便,小殿堂内肮脏污秽,弥漫着恶臭,但现在都已经清理出来了。我从没见过像这些清扫工那么脏的人,但他们极富幽默感。他们中的一个进入套间,为我搬出一把绿色金丝绒的小扶手椅,不知是土登次仁叫他搬的,还是他主动搬的,但从那之后,清扫工就一直全程跟随,甚至上宫顶时都抬着那把绿色金丝绒小椅子,我只要停下,就为我摆好椅子。

我问导游:“你在宫里住了这么久,可能知道布达拉宫里的两个宝库,过去一位英国作家写到过这两个宝库,它们还在宫里吗?一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库,另一个是公用所需的应急库。二十年前一本书中写到过的。”^①

^① 这次参观之后,事实被公布于众,一九五一年,达赖喇嘛就把金库运出了拉萨,运进了锡金,调用了上千辆驴车。在印度,人们对这些金子价值的估计不一,有说值四百万美元,也有说值一个亿,后一个数字是耸人听闻的,具有“闪电战”效应的猜测。一九六〇年初,达赖喇嘛需要钱,用飞机将金库运到加尔各答,金子在锡金的消息就此透露出来。对金子数量极不一致的估计是有原因的,据印度外事部的副秘书长曼诺(Mennon)夫人说,印度政府批准金库“免检”免税进入该国。

公之于众的事实会降低达赖喇嘛在当今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因为他一面不断地向北京表忠心,颂扬北京,给毛泽东写“赞美诗”,将其比作创造之神大梵天(Brahma),一面又秘密在国外储藏金子长达八年之久;该事实的昭然若揭使中国人,或被中国称之为西藏那块地方的人们对印度不会亲近,因为印度此举违反了本国外汇法规,同时也触犯了中国的相关法规。

土登次仁说：“宫内有三个宝库，一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宝库，要从宫顶他的私人殿堂内打开；第二个是应急宝库，要当着全体内阁大臣的面才能打开；第三个是布达拉宫寺院应喇嘛之需而拥有的宝库。解放军从叛军手中拿下布达拉宫时，这三个宝库都锁着但没有加封。这些宝库打开过一次，是军管会当着喇嘛代表的面，为检查库中是否有武器而打开的。那次打开检查很简单，没有详细记录，但据说，里面有相当数量的金子、银子，成筐的银元和大摞的丝绸锦缎。这之后，三个宝库都上了锁，贴了封条。”

我说，“你问过那些清扫工，他们认为这些宝库应该怎么办吗？”

清扫工听到这一提问愣住了，显然他们从未想过力所不及的事，但此时他们交头接耳，迅速讨论了一番，一位年长的清扫工把手中的酥油灯搁在地板上，用两手比划着进行争论。土登次仁用汉语向凤凤解说他的意思，凤凤再用英语翻译给我听。

“他说，这些宝库应该给当今的政府，因为政府能让我们吃饱肚子，而他们的宝库则不能。对此其他人都赞同，一位年轻人补充道：‘过去我们清扫工吃不饱，干活无报酬，而如今我们吃得饱，有报酬。’”

我继续问：“如果达赖喇嘛回来，还可以再次得到他的私人宝库？”

这个问题似乎比第一个更让他们目瞪口呆。向一辈子清扫泥土台阶、水泥地板的人们询问达赖喇嘛及其宝库的事一定有点大逆不道。然而，他们再次快速地活跃起来，进入讨论的愉悦，他们想出了一个答案。

“如果达赖喇嘛回来了，宝库归他与归政府，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笑起来：“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回答得赛过西藏的神谕师。”

离开这间房子前，我尽力想找个角度，希望能在昏暗的光线下拍张照片。土登次仁主动帮忙把光线搞好些，他对一名清扫工交代了一下，几名清扫工离开房间，把坡形屋顶推开一块，让光亮透进来。我很惊讶地看到，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殿堂用粗糙的板材就这么搭了个顶，连个钉子都没钉。

布达拉宫外表有坚硬岩石的基座，而其内部建筑的许多细部却这么脆弱，这种对比随处可见，贯穿始终。离开了东宫大殿，我们爬上了宫顶。这段路线曲折迂回，迷宫般的走廊，不规则的楼梯。有的楼梯是坚固的岩石，好像是山崖或者宫墙的一部分，连接这种楼梯的是一种陡直的阶梯，我们把这种阶梯称“船梯”，这种船梯是木头的，脚掌踩踏的地方都用铁条加固了，这使阶梯变得很滑，所以人们要慢行，倍加小心，好在阶梯扶手还蛮结实。压根没有难爬的阶梯，也没有浸透酥油滑腻的阶梯。

在一条走廊的某一处，土登次仁指给我看一道粗糙的门，上面贴了封条，封条上盖有印章，“这就是应急宝库”，它好像一点都不坚固，但凡有点能耐的贼都可能破门而入。从西藏掠走这些并不容易。许多僧人，还有会拉响警笛的清扫工，他们都有安全意识。

曲折不平的腾空阶梯太多了，我都数不清究竟上了几层楼，三四层，甚至是五层，真说不清，最终走了出来，并不累。我们来到了宫顶，达赖喇嘛宫邸在此展开。放眼望去，可见宽阔的河谷，拉萨整座城市，还有河流，近处是绿松石架桥，远处是大昭寺的金顶和塔尖。这便是达赖喇嘛冬季漫步的宅邸，他的寓所与宫顶相交相织，融为一体，在不规则中展开。

我们先走进像是接待处的房间，沿喷漆墙面，排列着八尊佛祖弟子的雕像，每尊雕像前都放一个水碗，现在都扣放着。“达赖喇嘛入住时，所有这些碗都盛满水，但他一搬至罗布林卡，这儿所有碗里的水又会被倒空，酥油灯也是这样，他在时

点燃，离开便熄灭。他不在时，只有陵寝宫内的殿堂会长燃酥油灯，那里有喇嘛诵经祈祷”。土登次仁边解释边招待我们用茶，还有糖果和饼干。我接受了茶——茶水发白，无糖，是藏族比较喜欢的。茶是用开水沏的，是专为我们从山下带上来的。所有殿堂、房间中佛像前供奉的成百上千的碗水都得爬十三层楼由人抬上来，宫内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也没有电灯。我拒绝了饼干，那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的，好像放了很长时间。

再次回到宫顶，穿过装饰着古怪的镀金动物的露天空地，我们走进了达赖喇嘛的私人殿堂。这是一间大房子，可能坐得下百十来人，然而，房内布满了描金绘彩的大柱子，挂满了丝制曲则（Chutze），一种圆筒状的长形悬挂物，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是用数百块小丝巾拼制而成，这种悬挂物之多，把个天篷台遮得严严实实，要想看见台上的演讲者是不容易的。殿堂富丽堂皇，厚重华丽的地毯，吊满悬挂物，四壁浓墨重彩，雕梁画栋。地板上还立着几尊陶瓷雕像，一切都归置得如同达赖喇嘛在一样。

我问：“叛乱分子上这儿来了吗？”

土登次仁回答，清扫工一看到流里流气的叛乱分子，就跑上楼，放下船梯上的活板门，每一节陡直的船梯口上都有一道活板门，这使叛乱分子没法上来。如果叛乱分子待的时间再长些，或者他们想强行上来的话，清扫工会截断他们的后路，当然，叛乱分子没那么做。

在这座私人殿堂里面，靠左的一个地方，土登次仁掀开黢黑的夹层悬挂物，指给我看一道贴了封条的门。他说，“这里是通往达赖喇嘛私人金库的门，进去后，还要下一层楼才是金库，入口就在这里”。

又一次穿过宫顶，进入私人寓所的其他房间，多数都很小，由狭窄的廊道连接着，处处都是高门槛，很容易绊倒。所有的房间，间间都浓墨重彩，雕梁画栋，铺满毯子，吊满悬挂

物，佛像要么排列着装在玻璃柜内，要么绘制在墙壁上。有一间房子显然是卧室，因为有一个雕刻精美的低矮黑木床架，床铺周围，自上而下布满雕刻，床上铺着毯子，还有一张狮子皮。这间卧房并不比喇嘛的小房子大多少，只有一个窗户，小且嵌在墙内，都无法一下看到景致，尽管寓所高高在上，此窗户却没能透进多少光亮。有一整面墙镶了玻璃柜子，里面供着三尊巨大的“长寿佛”。

远处那间房子，也很小，但看上去像是晨间祈祷室，与卧室的主要区别是这间房子里的那个雕刻精美，盖着毯子的厚垫子比卧室里的床垫小一些，用来睡觉显然太短。该垫子前放了一个诵经台，用来摆放经文，这样达赖喇嘛可以跪在垫子上习经。好几个房间里都有这种低矮、雕刻精美的厚垫子座位，配以诵经台。有些房间稍大点，看上去是用来接待诵经师或诵经者的。所有的房子都浓墨重彩，从地板到天花板都雕刻着佛祖、弟子和神鬼。地板香炉中的香烟股股升腾，在空气中弥漫，香火在我们参观殿堂前就点燃了。刚开始闻，这香气还不错，但后来就觉得太浓了。导游说，达赖喇嘛在时，香火一直燃着。

在所有的房间中，好像只有一间比较适宜居住。那是一间比较大的单间，朝向东南，那里有一面墙，墙上安装了有一半玻璃的门，总算让人在无穷无尽的佛像中得以喘息。房门开在一条狭窄的廊道上，景致一览无余，光线进入房间，拉萨城区，河流山川尽收眼底。在这里，人的眼睛算是有片刻小憩，躲开那些雕刻、浓彩的宗教常规。玻璃门显得不怎么结实，看上去难以抵挡冬季的严寒。在这所精雕细琢、装饰华丽的寓所中，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偶尔可见原始建筑，不能抵挡风雨，与豪华的装饰形成古怪的对比。

* * *

从现世达赖喇嘛寓所出来，穿越宫顶，走上一小段路，下

半截阶梯，我们来到了红宫的顶层，逝去达赖的“真身”陵墓就坐落于此宫。从理论上讲，达赖喇嘛是一个不断转世的化身。就达赖喇嘛的历史作为而言，提起五世或者十三世达赖喇嘛，此并非严谨，然而，说到陵墓内五世或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体，这却是严谨的。

论及陵墓的大小，大多数都一般，因为这取决于转世者在世的时间及其所积累的用于修建陵墓的金银财宝的多少。这些陵墓坐落于昏暗、没有窗户的房子内，光亮仅源于殿堂和入口。陵墓深深地隐藏于雕刻金属屏幕的后面，透过屏幕，隐约可见有着圆顶，有点反光的容器，遗体就盛于其中。与这些黑暗地方形成对比的是一间夹在陵墓中间的小殿堂，雕绘的佛像再次充斥人们的眼睛，殿内喇嘛借着微弱的酥油灯主持祭礼，小殿堂因此而蓬荜生辉。五世达赖喇嘛的陵墓是两大陵墓之一，墓高三层楼，约六十英尺，但还是昏暗难见其真相。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陵墓是个例外，有自己的三层楼，两侧都开有窗户，这使陵寝清晰可见，它也直穿三个楼层，据说有七十英尺高，比五世的稍高一点，我们步入的大空间，看上去是一间三十五或四十平方英尺的房子，房间的四壁绘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房间的中央部分被截去一块，以便陵墓直穿而过，这使外围地面形成类似阳台的一圈，我们可以绕陵墓一圈，从三个楼层，各个方位观看陵墓。来自外墙窗户的光线虽谈不上灿烂，但拍张照也算够了。我还得知了有关下葬以及入殓的一些情况，我想这些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

三层高的陵墓从底部开始营造，最底部是一个金子的矩形台，样子就像一般的墓室或密封的房子，在这个上面擦了一座巨型金子球体，第三层是由一个高高的圆锥体构成，这个部分从金子球体直向上穿，几乎戳到屋顶，乍一看，还以为是顶皇冠，但再近些看，发现那原来是一个铃铛，倒扣在球体顶尖上，这是著名的“卡库布”（Chakub），一个保护的标志，铃铛上部边缘升起月亮和太阳。



哲蚌寺接待委员会，身材壮硕的上层喇嘛、瘦小的下层积极分子僧人，高个男子是工作组人员。

整个陵墓从最底部的矩形墓室到最上层的铃铛形的圆锥体，全都厚厚地覆盖了一层金子，金子上面镶嵌了许多的珠宝。有人估计，该陵墓耗金量上吨重，搞不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遗体呈卧式，被放入底部最大的巨型墓室内，我想为数不多的看到过陵墓的西方人也一定和我的看法一样，然而，出乎我预料，土登次仁说实情并非如此。他说，最底层是一个密室，里面存放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财产，尤其存放着他生前被赠予的礼品、粮食、茶叶以及多种类型的金制

礼品。遗体是放在中间的金子球体内，不呈卧式，而是坐姿，呈坐佛式，双膝圈起，两腿在身前相交，呈盘腿坐姿，被处理成坐佛的金子雕像。

我问：“你怎么会都知道呢？”

他回答说：“我参加过这种葬礼，我是布达拉宫的一名喇嘛，见过准备入殓的遗体。先要用盐揉搓遗体，反复几遍，目的是吸干体内水分，便于保存，然后再抹一层黏土，封住体表的孔眼，把它做成一个胚，包上一层金箔，摆成坐佛样，给金雕像穿上衣袍，在他周围摆上其生前日常用过的东西，他喜欢



哲蚌寺大殿，僧人们正前往参加“控诉大会”。

的经文、纸张笔墨以及其他最贴身的物品，最后将这一切都封入金球体内，如同密封于一间圆形的小房子内。”

我们回头再次穿过宫顶，来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寓所，这位虽健在但见不到的达赖去了印度。当我们离开这座宫邸，经过大门，回到白宫时，看见一名解放军门卫，在寓所外站岗。战士虽不进入，但这样日夜的守卫却不含糊。

土登次仁说：“自从达赖喇嘛出走后，很少有人进入过。这里只对少数或者说只对达赖喇嘛的两名亲随家臣开放，他们掌管着房间里的东西。你们记者团也是少数被许可进入的人。另外能够进入这里的还有负责宫殿保安的人。人们随时准备接待回归的达赖喇嘛。”

我们回到昏暗的廊道，走下陡直的船梯，穿过曾经被叛军盘踞的宝座殿，走出我们来时经过的、黑暗的隧道。这回我拒绝上供我使用的担架。尽管到小车处，还要走很长、很陡、多石的那条道，但好在是往下走。我在有裂缝的护宫墙处停下来，这里曾是叛军向市医院开炮的地方，看着脚下这片沐浴在阳光里的医院建筑，我知道弹痕已被修复，破坏已不见踪迹。

我弄懂了为什么达赖喇嘛不喜欢他的布达拉宫，而喜欢建在罗布林卡内的新宫，也明白了班禅额尔德尼为什么在拉萨选住址，也只是路过一下古老的布达拉宫。我想到了这里忍受了数世纪的那种“生活方式”，在那些岁月里，最高领域——神王的象征和化身，并被赋予了临时的权力——在海拔超过一万两千英尺的地方，他度过漫长的冬夜，睡在浓彩重漆、绘满佛像的小房间里，只有昏暗的酥油灯相伴，只靠铜盆炭火取暖，仅有的水是农奴从不止十三层的宫下，攀爬二百五十级石台阶上来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终结了那种“生活方式”，我不知道这座远望如同宝石一般的布达拉宫会不会成为博物馆而再次对外开放。布达拉宫已经处于世界之巅，必将成为世界最富魅力的博物馆之一。

第九章

一座大寺院的改革

拉萨之西几公里处，在去日喀则的公路边，坐落着哲蚌寺（Drepung）^①。它是西藏最大的寺院，最大的农奴主，也是最大的叛乱之地。叛乱平息后，哲蚌寺正在“进行改革”。我们抽出一整天的时间走访哲蚌寺，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这点时间也只够看它的一小部分。

哲蚌寺是封建集团之中的封建集团。“三大寺院”——哲蚌、色拉和甘丹寺——是数世纪以来反动政治机器的中枢，主导着西藏的命脉。哲蚌寺居三大寺之首，享有任命西藏地方政府许多高级僧官的特权。每年藏历新年都举行为期三周的传召大法会，这期间哲蚌寺的“铁棒喇嘛”都要接管拉萨市的全部行政权力，横征暴敛，随意罚款，借此肥己肥寺。过去中国皇帝都对哲蚌寺政权怀有防备之心，下诏将其僧人限制在七千七百人以内，但是该寺僧人数常常多达九千或一万人。近几年寺中的人数锐减。除主寺，哲蚌寺还拥有七百多座小寺院，这些寺分散于西藏的各个地区和邻近省份的藏区。

之所以称其为最大农奴主，是因为哲蚌寺拥有一百八十五

^① 也拼为 De-pung Daipung，意思为“米堆”。

座庄园，两万五千多农奴人口，还拥有三百个牧场，一万六千牧民。在近期的叛乱中，哲蚌寺输送了三千零五十名武装僧人攻打中国中央政府。此类活动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开始了，一支五十人的团伙被派往昌都，他们纠集反动势力，一路阻击解放军进军拉萨，直至这次拉萨三月叛乱，哲蚌寺出兵两千多名僧人，组成了叛乱的主力军，这便是最大叛乱者的由来。鉴于这些情况，哲蚌寺在军管下开始改革便不足为奇了。改革将探索一条改变哲蚌寺的道路，将把这个法律的独裁者改变成“守法者”，将其作用限制于仅从事宗教活动。

风声凄厉，划破长空，翻卷的云朵与湛蓝的天空拼缀出图案，我们绕过布达拉宫的北墙，踏上西去的公路，右面是一晃而过的中央运输站，透过六英尺高的土墙头，可见公共汽车的顶部，三月叛乱时叛匪试图强攻这里，但被运输工人击退。不多会儿我们的汽车就卷入进城的交通潮流，有驴拉板车、驮货骡子，还有卡车，甚至几辆自行车，后面两种在西藏很新鲜。行程中三五一伙儿的妇女向我们招手，她们长袍内色彩鲜艳的衣袖在阳光下欢快地舞动。我们经过平坦的绿色湿地，陡立的山坡，渐渐看见了哲蚌寺——“米堆”。远远望去，它隐卧于山中，是这块土地上的神圣之地，以一片金色庙宇呈现于我们眼前。之所以称其为米堆，是因为从远处看，其连成片的建筑恰似由某个巨人将一堆白米撒在两山之间形成的兜状处。

离开公路，我们拐上一条泥土路，通向哲蚌寺，很快这条路变得越来越颠簸，越来越陡峭，这令我们的车子十分吃力，不一会儿车便准确地停在一队身着酒红色袍子的僧人面前，他们是前来欢迎我们的。站在前面一排的不到十二个人中有要员，三位最高级别的都佩戴黄色的饰带，饰带绕脖子一圈，胸前垂下，掖入黑红色袍子内。其中两名是堪布（Kanpo），也称主持，是哲蚌寺众学院之一的院长。第三位是堪苏（Kansu），前堪布，现已退休，但仍然保留着他的头衔。学问最高，但不掌权，也没围黄饰带，只戴一副眼镜的一位，是格西（gesi），

即佛学哲学博士，是迄今最高的佛学学位。他的名字叫米乌（Miwo），是一位汉人，曾就读于北京，已在拉萨居住了二十年，如今还担任着中国佛协拉萨分会副主席的职务。这一事实表明佛教界有人效忠于中国是事实，叛乱分子因此而公然抨击，指责所有组织都有混入藏族的汉人。

这四位块头十足、仪表威严、大腹便便的人一直声名显赫，位高禄厚，他们以身躯肥硕，衣料上乘，腕戴手表而与众不同。挨着他们，实际稍靠前，站在这一排人的第一个，是位个头矮小、瘦骨嶙峋的喇嘛，他虽穿着整齐，但长袍破旧。他既没有黄佩带，也不戴眼镜，他与他人的区别就在于骨瘦如柴。他叫曲乃仁增（chuneiran），一名下层僧人，叛乱时因对拿起武器对抗国家不满而遭鞭刑。现在他被提拔为哲蚌寺“平叛委员会”的主席，虽然这是一个临时职务，但等哲蚌寺被宣布为“守法”寺院后，新的行政机构形成了，该临时职务很可能生成显赫职位。到时候，寺里的宗教事务还将有堪布和格西主持，而日常的行政事务则将由某委员会“民主管理”，下层僧人在其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几百年来他们从未有过发言权。

两位堪布作为寺里的头面人物与我们记者团中的两位主席正式地交换了哈达，这使我们再次看到选举主席的必要性。然后，我们开始慢慢上山，沿着一条狭窄的鹅卵石小道，穿过一片糙石垒砌的兔窝式的居地，小道陡而难行。经过一阵艰难地攀爬，我们来到了主殿。这是一座巨大的金顶建筑，从这里望去，可以看见许多殿堂的屋顶。我们将在这里参加情况介绍会，并与寺主们共进午餐。然后，我们将去参观寺院展览厅，将去了解新组建的小僧人合唱队，将去观赏一部新戏剧，是由僧人俱乐部创作编排的，还将去旁听一场控诉会，僧人们将控诉两名前铁棒喇嘛和一名活佛的罪恶。我们可以随时分成小组，采访个人。

位于“米堆”顶部的大殿是一座巨大而沉闷的建筑结构，

始建于一四一六年，据说它在祈祷大法会上曾经容纳过五千名僧人。然而，这样规模的殿堂却被昏暗所笼罩，此为藏传佛教建筑的常见状态，同时还为林立的支顶方柱掩饰住，还有许多的雕像以及祭品悬挂物，这些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从远远的一边看，本以为是上了色的玻璃窗，原来竟是盛装巨大俗丽佛雕的玻璃柜，有三层楼高。光线是从二层楼处类似窗口的地方照进来的。来自上方的光线过滤而下，先照到不规则的建筑结构上，然后照到许许多多的小雕像上，最后才照到眼前的雕像上。其中一个雕像是宗喀巴（Tson Khapa），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另外两个是前世达赖喇嘛，还有一尊非常小的雕像，是一个婴孩，用筒形玻璃罩护着，该佛像前恭敬地摆放了七碗水，原来这是建寺时一位著名格西的“幼儿化身”。这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板凳，只有摆放在石柱之间的长排又脏又破的棉垫子，祈祷大法会时，此可能是给僧人跪着诵经用的，不过别指望能看见领经人，视线全被纷繁的悬吊物遮住。后来才得知，只有上层喇嘛可以坐在棉垫上，下层僧人只能坐在石头地上。

我们通过一个不太雅观的楼梯爬上了这座建筑的第三层，发现“平叛”办事处就设在这里的顶楼上，这是一间长方形房屋，约六百英尺大小，远处墙壁，以柱子为间隔，有类似窗户但未装玻璃的开口，可以观望远景，但别指望这能导入多一点的光线，因为墙壁太厚，还有一块宽大的突出物伸向屋顶。景色本身很壮观，往下看，一片金顶，高大，造型奇妙的镀金柱子和宝塔，再往下，是宽阔的河谷和环绕的群山。就在这片河谷中，一九〇四年荣赫鹏的远征军曾安营扎寨，威胁要用大炮轰平哲蚌寺，否则就必须向远征军供给粮草，僧人因此人人身背肩扛粮袋，在崎岖陡峭多石的山道上，排成大队，给英军送粮食。

将视线从外面的景致收回，转而细细打量这间殿堂，只见一长溜桌子上已摆好了菜肴、茶杯，桌子周围的一圈板凳上铺

就了色彩艳俗的厚毯。尽管出于好客，做了种种准备，但这房子既不令人愉悦，也不适宜休息，因为色彩过于浓烈，装饰过于繁杂，一点都不协调，给人以折磨感。许多柱子涂成大红色，上面张贴了卡通画和宣传标语。地毯底色是鲜红色，繁杂图案的颜色令人闹心。房间吊顶是鲜艳刺眼的蓝色，天花板与吊顶之间却涂成白黄色，所以当人在房间中走动时，天花板成为白黄与艳蓝变幻着的图案，令人眼花缭乱。墙上的许多招贴画是藏文的，我们来不及翻译。

我们用午餐，这个过程穿插了堪布和曲乃仁增的致欢迎辞和讲话，曲乃仁增就是那位瘦削的“平叛委员会”的主席。一位高个儿，身着蓝色棉布套装、皮革外套的男子为我们翻译，他的着装在此环境中显得令人惊讶的现代，由负责改革的“工作组”供给他。他那笔挺的裤装和干练举止是我们在哲蚌寺里见过的最具军人味的东西，因为，虽说哲蚌寺实行了“军管”，但士兵似乎已离开很久，他们完成了发现并没收隐藏在佛像下面的大量武器就离开了。军管就由两个“工作组”代表，无疑他们有军队作后盾，当然这种军管是文明的，成员多由藏族组成，包括在中国内地接受了文化教育的前逃跑农奴。

从他们的致词中，我们得知该大殿建于一四一六年。多少世纪以来，哲蚌寺都享有许多特权，其中包括任命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高级神职官员的权力；它曾经是寺院反动派的中心，拥有自己的法院、监狱及其施刑制度，这些不仅仅用来对付寺院的僧人，而且用来对付与僧人作对的俗人。看见大量的秃鹫向寺院俯冲，我们偶然了解到“天葬”的事情，那些秃鹫正是被天葬所吸引，天葬得名于以尸饲秃鹫，是西藏一种为人们接受的丧葬形式。

我们还得知了哲蚌寺的组织结构。该寺由好几个扎仓（Tsatsangs）或叫经院组成，每个扎仓有许多康村（Kangchun-

gs)，或叫生活区。统治机构叫拉基（Lhachi）会^①，该会分三个等级，小会、大会和超大会。小会内部会有十五个成员，其中十三名是堪布或叫扎仓头；大会的成员在小会的基础上增加八名，其中包括两名其苏（kisu），即财务和商务经理，还包括管庄园的一名喇嘛和两名管制订政策的铁棒喇嘛；超大会的成员在大小两会的基础上增加六名上层喇嘛，其中包括管诵经堂的一名僧人和一名给僧人看病的喇嘛医生。

寺院的这种组织机构并未因军管而发生变化，但“平叛委员会”的职能与其并驾齐驱。“平委会”成员大多由下层僧人和少数没有积极参加叛乱的上层喇嘛组成。该委会是临时机构，其职能是召集政治讨论会，讨论中央政府的政策、西藏的农奴制，尤其根据大昭寺的活动来安排这种讨论会。平息叛乱，废除劳役、苦役，还包括召开控诉会，鼓励僧人说出各自长期受虐待的事实，这些都成为“三反”运动的组成部分。经过六个月的这种教育，僧人自身就期待成立新的寺院行政机构。在新机构中，佛学方面有造诣的人，堪布和格西仍然负责佛教事务，而那些陈腐的办事机构，如那些管理庄园，放高利贷的机构将被废除；对住房、食品等日常生活的管理，将采取委员会领导下的民主管理，下层喇嘛在该委员会中具有发言权。

关于哲蚌寺参加叛乱的情况由曲乃仁增作概要介绍。一九五〇年哲蚌寺派出五十名武装僧人前往昌都，围攻堵截人民解放军，在返回拉萨的途中，他们煽动沿途村民参加反解放军的叛乱活动。一九五二年，哲蚌寺帮助鲁康娃企图在藏组织驱汉活动。一九五六年，哲蚌寺与色拉寺、甘丹寺联合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理由就是它势必带来“民主改革”，而寺院要永保农奴制，并扬言要“誓死”捍卫他们“神圣的制度”。更近些的时候，一九五八年，在山南地区出现了“要宗

^① 不是 Nachi 就是 Rachi，这两个字母在藏语中是流动的，易混淆。

教，不要共军”的反动活动，哲蚌寺曾派出三个全副武装连前往参加。一九五九年初，哲蚌寺帮助召集罗布林卡会议，会上决定软禁达赖喇嘛，不让其与汉人接触。

这些叛乱活动全是在拉基会——哲蚌寺这一最高组织机构指使下所为。在向中央政府办事机构发起武装突袭前，哲蚌寺命令全体僧人念经诅咒汉人。三月十六日，铁棒喇嘛多杰帕达（Doje Paida）宣告“西藏独立”，敦促全体僧人加入军队。他说，“杀一汉人胜造七级佛塔”。

曲乃仁增说：“凡对参战表示犹豫者都受到惩处，我本人就是如此，被抽了一百二十大鞭，理由就是对参战显示出。不满。我们认为那种战斗是违背佛教的。当然直到叛乱平息，我们参加了‘三反’运动的许多次讨论后，最终才弄明白，要我们用战斗捍卫的‘神圣制度’不是宗教，而是农奴制，在农奴制下，我们也是被压迫者。

“如今，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宗教的自由。我们有做僧人或不做僧人的自由。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回家，可以结婚。我有参加或不参加佛事活动的自由。我们可以成立合唱团和戏剧俱乐部，并且按劳取酬。过去我们的命就捏在铁棒喇嘛的手里，他们找茬打我们，如果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杀了我们。如今，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吃得饱，这是前所未有的。”

叛乱前，哲蚌寺有五千六百七十八名僧人，现在只有两千八百名。部分原因在于换季，冬季，僧人们都栖身于哲蚌寺，待传召大法会得到捐赠贡献。夏季，僧人们则出寺化缘，前往收成地，获取粮食。人数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两千多名武装僧人被派往拉萨罗布林卡参战，几乎没人返回，少数身亡，多数被俘，战败后逃回家的更多。还有一些人跑进班禅领地的寺院，以躲避这场叛乱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我们后来了解到，班禅额尔德尼领地上寺院数量有所增加正是缘于出逃的僧人，为躲避达赖喇嘛领地上的冲突骚乱，他们逃跑了。

* * *

午饭后我们所观看的展览，展品塞满了规模与大殿相当的建筑的好几间展厅，第一个展厅，展览的是哲蚌寺参与叛乱的物证，有一大堆英美造刺刀枪，部分史密斯（Smith）、维森（Wesson）三十八响盒子枪，柯尔特四十八响左轮手枪，还有美式斯坦冲锋枪，一挺美国造汤普森半自动冲锋枪，一些英国造埃菲尔德式步枪，德国造毛瑟枪，以及大量达姆弹，还有原装箱标着产自英美国家的软头铅弹，战场上使用这种子弹是非法的，这种子弹能将人击碎，这是没必要的。展厅里还有穿戴真人衣冠的人偶，衣冠上饰有宝石，该人偶代表某个神灵，叛乱分子赋予它许多教诲，歪曲历史，编造“支持西藏独立”的预言。

“经济剥削”的展厅再现了哲蚌寺占有庄园和农奴的统计数字，展示了两万五千名农奴和一万六千名牧民是如何遭受剥削的大量细节。农牧民除一般的以劳役或粮食抵债缴租外，还要缴纳无穷无尽、名目繁多的税费，给戴铃铛的牲口要缴铃铛税，拥有花盆者要缴花盆税，要缴人头税、出生税，还有一种特殊税，即死亡税，要用死者的耳环、首饰向哲蚌寺缴纳死亡税。展出了收租子用的衡量器，让人们看到，借给农奴种粮时，哲蚌寺用小藏克称量，能盛二十五斤粮食，收租子时则用大藏克称重量，能盛装三十二斤粮食。这种衡量器上装置了一块插板，这使其一边凸起，另一边凹陷，重量的差别就在于所用量器的哪一边。小斗出，即用小藏克，能装二十四斤粮（二十六点四磅），借给农奴种子；大斗进，即用大藏克，能装三十三斤粮食（三十六磅）向农奴收回借贷，而这之间的差额就达九磅之多，仅称重一项就占约百分之四十的量。

哲蚌寺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放高利贷，借贷利息原本为百分之二十，但经过许多条件后，实际利息要大得多，粮斗所制造的差只是其中之一。在特别封建的借贷形式中，一种叫其美

吉乃（Chimeijinei，音译）的借贷，是指寺院向牧民租借牲畜，每年要他们以定量的酥油，或毛线偿还租金。然而，拿去出租的往往都是衰老得快要死掉的牲畜，有时连牲畜的影子都见不到，只是口头应允，便开始计租金了。农奴们就这样祖祖辈辈注定了要偿还“租子”，连所借的牲畜都死了也没还清这样的租子。还有一种牲畜借贷形式，叫“生死租”，这种债务要求偿还的租子数量不断增加，指凡租借的牛或羊都必须定期产仔，如果没有或死亡，那位不幸的债主牧民就得赔偿。当这种债务或其他积累成山的债务还不清时，就可能出现“以人抵押”的后果，抵押者从此沦为奴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在恶劣的条件下抵押者是很难存活下来的。

哲蚌寺还有相当数量的贸易，包括引进大烟土。大量展出的烟土是从寺院仓库翻出的。大多贸易是与寺院农奴作交易。当寺院巡视员去远方视察牧场，他们总携带一些像砖茶这样的供交易的货物，强迫当地牧民用酥油换砖茶，通常只要一银元一块的砖茶，要换取十八磅酥油，这比原价高出二十倍。

上层喇嘛都特别寻求获得这种视察差旅的特权，为此不惜出重金行贿，因为在这一差旅中，“视察者”不仅可以从强迫交易中牟取暴利，还可以在各个落脚处收到庄园主的厚礼。不仅如此，所到之处都必须向他们提供妇女，不仅要满足视察喇嘛的性欲，还要满足其随行的性欲，这被称为“服徭役”。曾经陪同外号为“臭嘴虎”视察员的喇嘛们说，他们有一次在一个拥有六十户人家的地方歇脚，以要求“服徭役”的名义，强奸了那里的所有妇女。

每逢为期三周的祈祷大法会，同样的负担也强加在拉萨市民的头。这期间哲蚌寺的铁棒喇嘛行使权力，他们征收各种税费，驴税、狗税、猫税、鸡税、花盆税、香烟税、鼻烟税、水井税、池塘税，甚至征收扎两根辫子妇女的辫子税；他们四处寻觅民事、刑事案件，办案中两头敲诈；经商者不得不以重金获得许可。一旦铁棒喇嘛的铁棒立在了谁家的门口，谁就得

马上送礼，否则，就会被找茬，遭罚款。朝圣者要缴念经税和转经税。可能最怪诞的税要属下雪税了，如果雪落在某人的院子里或房前——正逢二月天，谁家都免不了会落雪——此人必须向铁棒喇嘛缴纳“下雪税”，因为是铁棒喇嘛“给他带来了雪”。新来哲蚌寺的僧人积极分子在“三反”运动中算出，一名铁棒喇嘛在祈祷大法会期间能收敛到六万个银元。

“宗教自由”是另一个展厅的主题，那里收集整理了一些有关僧人入寺原因的统计资料。其中两百二十四人生活在罗色林（Loseling）经院的某院部内；一百二十四人未满十四岁被父母送进寺院；一百〇六人为逃避“服徭役或债务”而进寺，其中三十一人已服完徭役或还清债务；十八人因致残，变瘸，无法干活而进寺，只有六人宣布为宗教信仰而入寺。少数声称宗教是入寺理由的人无疑受到条件的影响，即收集调查表，但数字似乎没什么意义。

为“宗教”而来的更贫困的喇嘛进寺后一定发现寺院的规矩令人灰心，因为，如同展览所示，贫困僧人必须乞求允许，必须伸出舌头，以证明自己身心的清白，未经允许，不得习经。真正存放圣典经书的殿堂从未允许他们进去过。如今，他们之所以欢呼“宗教自由”，部分原因就在于“贫困僧人可以按自己的愿望转动大法轮”了，此举被视为积德之路，但先前却拒绝贫困僧人为之。如今“贫困僧人可以习经并按自己的意愿祷告了”。下层僧人和部分上层喇嘛组织起“文物保护团”，修缮哲蚌寺里的许多殿堂，给宗教文物除尘，将散落的历史原稿资料收好码放整齐。在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散布谣言，称这些文物都被转移了，他们对此义愤填膺。

* * *

“寺院罪行”展厅对外来者来说是最耸人听闻的了。展览以大堆骷髅头开始，至少有上百人的骷髅头，其中好几个受害者的头被做成了鼓，用人皮做鼓面，蒙住开口处。解说员解释

说，人皮是活活从一男孩身上剥下来的，为的是鼓面有韧性，弹力好。一部分头盖骨被做成了碗，镶上了银子，有些即镶嵌了银子，也镶嵌了金子。两只大个的，镶嵌银子的头盖骨杯子属于达赖喇嘛的保镖次雍。

展出的还有用处女腿骨制成的号角，外壳是银子的。我们问：“你怎么会知道那些是处女的腿骨？”他们说这是“寺规”要求的，只有“处女腿骨”能够做号角。寺里专门有一个组织负责收集这种腿骨。甘丹寺的一名铁棒喇嘛被指控为得到这种腿骨杀害了十二名农奴。

两个头盖骨、一对臂骨在这里展出，这是两位被杀害牧民的尸骨，被带回哲蚌寺作证据用的。这两位牧民被派到一个叫热晋（Retsin）的地方放牧，那里非常寒冷，饥寒交迫下，他们杀了一头牦牛充饥，为此他俩被寺院判处死罪。一名叫波达（Boda）的喇嘛带五名帮手前去执行死刑，之后带回了这些尸骨作证据。

凡属于哲蚌寺的庄园都有自己的监狱和施刑制度。监狱里经常蓄意放养蝎子和毒虫。有一种草，叫“蝎子草”，时常被用来施鞭笞，此草好像含一种荨麻素，用它抽打后，受害者浑身红肿疼痛。砍手、剁足，致人残废是一种常见的处罚方式，还有一种致残刑法是用蘸了盐开水的牛皮捆绑受害者的手臂或腿部，牲畜皮变干，从受害者身上揭下时，势必留下终生的剥裂残疾。

* * *

离开阴森恐怖的展厅，我们开始往寺院下面走，下了一层阶梯又一层，终于来到一片屋顶上，僧人们背倚镀金的柱子晒太阳，还有些僧人在吹六英尺的长号。走下屋顶，来到一个宽大的石台阶上，只见由三百来名小僧人组成的合唱团站在那里，他们身着酒红色的僧袍，一名叫次央顿珠（Tsaiyang Tunt-sung）的九岁男孩是指挥，他的名字比本人可老气多了。他站

在下一层的台阶上指挥合唱团，他们放声高歌“社会主义好”。

我们问：“这就是那个合唱团吗？”他们回答，“我们以前从没有合唱团，只会念经，小僧人唱歌会被抓，之后会挨板子的”。

孩子们唱完歌，在石阶梯上坐下，我们这才看见，阶梯下有一个平台，那里搭了一个戏台，男孩指挥就是站在那上面的。一幕话剧正准备登台表演。合唱团的孩子们已坐好成为观众，我们记者团成员也坐下，准备观看事先就告知的那部自编自演的剧目。剧目取材于哲蚌寺生活的真实事件，讲的是一位贫苦农民及其女儿遭迫害的事情，迫害者就是闻名的喇嘛“臭嘴虎”，他曾是哲蚌寺掌管财务和商务大权的其苏。

该剧是那种直白的，有明显坏人的通俗剧。表演者表演得很投入，表现出西藏人的戏剧审美观，如能收敛点儿，表演还是很不错的。穿鲜红长袖衫，住在破窝棚里的女子试图安慰她年迈的农夫父亲，他因还不起债而发愁。老人下跪，向冷酷的其苏乞求，然后对着佛像祈祷，怀着一线希望起身出门，去寻找能够用来抵债的东西。其苏开始向女子调情，女子躲闪开，不让其苏接近。

佛祖并没有显灵帮助年迈的农夫，剧情由此转换到其苏的寓所，“臭嘴虎”正准备在自己的屋里围堵农夫的女儿。他先命仆人把女子投入牢房抵债，然后又称要给女子机会，在其房里做女佣，以此抵债。女子到来，其苏支开仆人，强奸了女子。强奸行为并没有当着观众的面，而是在与客厅相连的卧室干的，通过敞开门内传出的喊声告知大家。合唱团的小僧人，原本平静的面孔，似乎挂着忧伤和空白，此时听见喊声的小家伙们却露出了坏笑，显示他们知道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其苏回到了客厅，有点过于明显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露出得意的笑容，在佛像前祷告。剧情加了好色、残忍而又伪善的情节，将一个恶贯满盈的其苏展现给了观众。

下面的剧情我们已事先得知了，所以没有等到看完。接下

来的故事是，女子将自己的遭遇告到了铁棒喇嘛处，后者不但没有惩处其苏，反而惩罚了女子，说是女子勾引高级喇嘛，斥女子为“巫婆”。

我们将剧情留给那些年轻的、有鉴赏力的观众们。我们下到另一个宽大的石阶平台，由此再往下，是一个更宽的平台，在这里传来了阵阵的高喊声，打断了我们关注的剧情。

第十章

哲蚌寺的僧人

从寺院上面下来，我们落脚的平台是一块长形平坦土地的延伸，宽一两百英尺，掩映在一片大树下，这些树都已上千年。约两千名身着酒红色长袍的僧人在这片绿荫下席地而坐，他们那未曾洗过的身子，在凝固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重的臭味。他们面对小山，那里一块裸露的岩石上搭起了一个狭长的舞台，上面铺着厚厚的毯子。我们记者团在舞台的两头分到了座位，台子中间由主持会议的喇嘛组占用。

在舞台与观众之间站着三个被指控的人，一个活佛和两名前铁棒喇嘛，现在三人全都对着会场深深地弯着腰。这种姿势是西藏的习俗，当受到指控，面对法官时都是这个姿势。我们头次见这种姿势是前几天在拉鲁庄园的控诉会上。我们进入会场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喊声：“就是！”两千只右臂有力地伸向空中，表示赞同。受到指控的是活佛阿旺南达（Nowanamda）。

活佛被认为是过去的智者、圣人的转世化身，这样的人特别聪慧、神圣，死后如果不选择返回救世，可以直接涅槃。大概有一千名活佛聚居于西藏和相邻省份的藏区。他们比所有僧俗显贵的地位都要高，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则例外，他们

自身为特殊类型的活佛，只有这两人在西藏封建等级制中居最高地位，其他所有活佛排列第二，噶伦仅排第三。现在指控活佛阿旺南达的是一名叫洛桑贡巴（Losanggumbo）的穷僧人，后者没有一点地位，和农奴没什么区别。

我立刻注意到，无论怎么攻击，也不能攻击对神圣化身活佛的信仰，经过数世纪的传承，这已成为一个信条。这无论在西藏，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有这个问题，我从未见过人们像早先俄国革命在“反教博物馆”里所见的那样直接地攻击宗教。与会的哲蚌寺僧人认为活佛的在世和神圣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指控的仅仅是阿旺南达本人这个假活佛。

据说，阿旺南达的活佛头衔是通过贿赂噶厦而获得的，所以他的这个活佛称号是个幌子。传授他教义的一位年迈师傅，现已年过七旬，但阿旺南达忘恩负义，敬老养老是所有弟子对师傅应尽的义务，连吃的都不给这位老师傅。阿旺南达的行为哪配当活佛？他声称能通灵，可预告未来，特别是他借口可以治愈一位老妇人的病，拿了她的钱，但老妇人却死了。他强迫许多下层僧人拿起武器对抗合法政府，再说打仗本身就违背佛教教义，更何况是抗击合法政府，这更是罪孽。最后，也是最糟的，他向特别贫穷的僧人出售“护身符”，称“有了护身符，战场上不伤亡”，这些护身符根本不显灵！基于所有这些原因，阿旺南达是个冒牌货！

指控者质问，“难道不是他说教我们参加叛乱的吗？”参会人喊道，“就是他！”两千只胳膊举向空中。

指控者高喊：“你这个假货，坦白交代！”活佛没有直接应答，只顾躲避人们掷向他的小棉布块，这些小布垫抛撒在会场半空中。僧人们把卖给他们的“无伤亡护身符”扔回给他，高喊：“看看，这些东西能保护你吗！”一个被丢弃的“护身符”落在了我的跟前，那是一块发红的小布垫，质地同僧人的袍子，上面贴了一张佛像，看来是钉在衣袍表面或里子上的。

我们一直没有听说阿旺南达是不是认罪了，这对别人没什

么关系，但对他本人就是个问题了。那位指控者此时将位置让给了另一位指控者，后者控诉的是其中一名铁棒喇嘛。这位名叫扎巴拉（Zambala）的指控者说，一次他把衣服穿错了，被指控的铁棒喇嘛就威胁要打他个半死，除非同意签约，发誓从今以后不再跟汉人说话。扎巴拉说着，身子前倾，隔着舞台去扯那名铁棒喇嘛的袍子，摇晃着质问：“难道不是你骗我们，打我们，让我们咒骂政府的吗？”

会场上响成一片：“就是他！”

接着，扎巴拉从自己袍子里拿出一片纸，在铁棒喇嘛鼻子底下晃动着说：“看，这就是你让我签订的誓约。”他当众将其撕毁。

会场响起响亮的口号声：“铲除封建压迫制！”

控诉的内容讲得太快，翻译只拣关键的给我们作介绍。边穷（Bienchun）是第三位控诉者，他向另一个铁棒喇嘛喊道，“有一次，我在寺中喊了一声，你就把我打得有五个月都站不起来”。另一个僧人控诉说，一次他想离开诵经殿去上厕所，为此事这个铁棒喇嘛把他毒打一顿。还有一个僧人控诉道，该铁棒喇嘛只要看见穷僧人头发长了，就罚他们的款。有人说，右边那个铁棒喇嘛有一次曾抽打他三百大鞭，直到现在都“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一位名叫阿旺扎巴（Awanzaba）的下层僧人指控第二名铁棒喇嘛，“有一次，在去诵经殿的路上，我无意推了一下挡道的人，你就鞭抽我，不仅拿走了我的全部财产，还拿走了我弟子的全部”。说着，他向后推开自己袍子，露出肩膀和胸口，喊道：“看看你留给我的鞭伤疤！”

阿旺扎巴此时转向那位活佛说：“你骗人，说能通灵，可与死人对话，以此捞取钱财。你说汉人全会被宰，解放军永远进不了哲蚌寺！假如你是活佛、占卜者，那么请告知解放军怎么来了？”

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喊声：“低头认罪！坦白交代！”

控诉者接着说：“难道是我们叫他给我们从罗布林卡拿武器吗？”全场回答：“不是！”

与会僧人的面孔因痛苦、困惑的愤怒而黯淡无光，好像在告诉人们，他们经历了漫长而难以忍受的苦难后，才刚刚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像其父辈一样，相信人的苦难源自上辈人在转世中犯下了罪孽，他们甚至记不得是哪一次转世，只要忍气吞声地接受现实，以求好的来世。现在，受到政治讨论的影响，他们开始认识到，长期受苦的根源在于农奴制，源自特殊的鞭刑、拷打以及上层阶级强加于他们的迫害。他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改变这一切，相信改变这一切是善举而非罪孽。

翻译不时告诉我们，这三位被指控者并不是最大的罪犯。在过去三个月的整治讨论中还挖出了更坏的家伙，但他们大多都逃跑了，可能都逃到了印度。就拿“叛乱头子”土登次仁（Thuten-tsiren）来说，他在寺中有自己的房产，还有一个“价值上万银元的珍珠头饰”，是有名的“色狼”。给他清扫房间的弟子证实，他拥有大量的外国化妆品，来访的“妈妈姊妹”人数众多，与他过夜的不计其数。

罪大恶极的一个突出例子是钦沛次美（Chinpatsimei），外号“臭嘴虎”。他在哲蚌寺拥有一座三层楼的住宅，十个仆人，其中一名小僧人是他的“同房”。据他一名弟子估计，他的主子“从二十岁至五十五岁，三十五年里，强奸妇女千余名”。钦沛次美壮年时曾掌管哲蚌寺的一个属寺，时间长达六年，他的弟子说，那段时间，“他主子强奸了寺院周边六个庄园的所有年轻妇女”，甚至到六十岁后的晚年，“每当视察其他庄园，都要求供给他上床的农奴女子”。有人指控说，他曾企图强奸其管家的老婆，被那女人拒绝，她丈夫也上来帮忙，为此钦沛次美鞭笞了这对夫妻，给他们实施了“剥皮刑”，致残后将他们流放到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荒原黑河地带。

谈起钦沛次美，人们提到了专供满足上层喇嘛特殊需求的

未成年的小僧人，他们被当作玩意儿，为抢占漂亮男孩，斗殴，甚至残杀屡有发生……无从核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也没打算这样做……只是老听到僧人控诉这类事情，那些曾经是上层喇嘛的弟子，现在出来指控自己的师傅。虽没有深究，但这种故事至少证实了哲蚌寺里的“生活方式”。

* * *

离开会场时，我偶然结识了一个四人小组，是几个乐意聊天的僧人，我们在平台的尽头上发现了一排比较安静、阳光更好的石阶梯。从树荫下的阴暗会场换到这个僻静、阳光灿烂的地方是令人舒畅的。和我们一道过去的还有一位做翻译的年轻漂亮的藏族女子，名叫罗布卓玛（Nobudzoma），她曾经是农奴，逃跑去了中国内地上学，现在是哲蚌寺改革“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她穿了一身灰绿色长裙，露出粉红色的内衣袖子，有着一头非常整洁、浓密光滑的黑发。

我就这样捕捉到独家专访的时机，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年龄是不同的，强巴希瓦（Jambaseva），三十岁，家在拉萨附近，他是这组人里最畅所欲言的一个；罗桑厅巴（Losantienba），四十五岁，他是从四川一路走进来的，有二十二年没见家人了；益西尼玛（Ishennienma），三十一岁，他留给我的记忆主要是他手腕上的那串长念珠；扎西泽金（Tsashi-tsejen），二十五岁，这人我一直没有时间细问，他只回答了我的基本问题。

我从强巴希瓦开始问起，他说七岁就被带进了哲蚌寺，在寺里一住就二十四年。“我家离拉萨不远，我家头人的儿子在哲蚌寺当喇嘛，要一个仆人，所以我七岁就被带进了寺院。我虽被称作弟子，实际上只是他的仆人，为他扫地、煮饭，做清洁，听任他的摆布。”

我问：“他待你怎么样？”

“他给我的是吃剩下的变质的糌粑，就是这种东西，一天

也就两小碗，从未吃饱过。哪儿不对，他都揍我。十一岁时，我脸上长了黑豆豆，因此而挨打，还把我赶出了寺院，但后来我又回去了。十四岁我因看了一场藏戏而挨揍，并再次被赶出去，但我再次回到寺院。我十八岁时被我的主人彻底赶出了门。后来我在寺中找到了另一个栖身之处，那是一个不能站，躺着也得蜷曲两腿的泥石窝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上层喇嘛的，我给他们出劳力用以抵租。原来的主子一看到我就咒骂我，还恶语相加于我的家人。逢走访我家时，他就说我的坏话，而且从不许我探望家人。”

我问：“你受到这样的待遇，干吗还一次次地返回寺院呢？”

“没有主人的农奴是无法生存的”，强巴希瓦回答，“这样的农奴会遭到四处的驱逐，并会被当作犯法而遭处罚。”

强巴希瓦从十八岁起开始以乞讨为生，“有时在寺内乞讨，有时在寺外乞讨”，但从未填饱过肚子。他每天都要去诵经，因为“不去会挨打，去了，会有酥油茶喝。念完经，在主殿可以喝到四杯酥油茶，虽说那是用没开的水沏出来的，而且只有一点茶叶和酥油，但毕竟也是酥油茶啊。在罗色林经院，可以喝到四杯好点儿的酥油茶，但那也仅限于逢年过节时。赶上寺院收到大捐赠，捐赠物大都进了上层喇嘛的腰包，只有少数用于给僧人们加餐”。

“有时念经回来会被打得站不起来，原因是念经或喝茶时出了错。上层喇嘛坐在棉垫上，下层僧人则跪在石板地上，在冰冷的石头上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跪姿一点儿不出错是不容易的！喝茶时，递杯子，端杯子，到喝茶都有一整套的讲究，稍有差错，就会招致毒打。其苏到来，你没看见，没有马上弯腰以示恭敬，也会遭毒打。如果眼睛抬得高于上层喇嘛的膝盖，就会挨打，他们甚至有权因此挖出‘不顺从的眼睛’，当然我没见过这么做的事。”

* * *

接下来讲述身世的是四十五岁的洛桑厅巴。起先他就告诉我，他是从四川步行来拉萨的，原因是“想在拉萨当一名喇嘛”，当我进一步询问时才得知真正的原委。原来他是为躲避四川老家一名活佛的虐待，甚至死亡的威胁而背井离乡的。家乡那名活佛执掌着他一家人的命脉，他要求男孩满十三周岁时去当他的“贴身仆人”，理由是洛桑家已有一个“养家”的男子——他的哥哥，他就必须被送到寺里来。

洛桑厅巴说：“我父母不同意我走，头人就毒打他们，要求他们必须支付十五锭银子才肯放过我。父母没有银锭。只能把我送进寺院侍候那个活佛。正在这个时候，我在锡矿干活的哥哥死了，我妈妈前去祈求放我去顶替大儿子，因为交不出那十五锭银子，他们不放过我，这时，头人差我去送一封信，命我必须准时送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时间准点了，妈妈认为这是头人在找茬杀掉我，吩咐我最好去拉萨当喇嘛，这样可救我的命。我一路乞讨，走到拉萨，那时我十七岁。”

两年后，洛桑厅巴跑回家看母亲，此举无意间走漏了风声。“头人听说后，把我抓去，给了我二百大鞭，戴上手铐，投入牢房达一年之久。那次的鞭伤和手铐伤到现在还留有疤痕。坐牢一年，我妈妈从左邻右舍筹到了十五锭银子，把我赎了出来。那以后，成为长子的我住在家里，靠卖苦力为生达两年。后来我们听说头人再次计划抓我，并杀掉我，所以在我二十三岁时，第二次离家来到拉萨。我在哲蚌寺里出劳力，每月支付十二两藏银租住一个小茅棚，他们给我糌粑，没酥油茶，只能用凉水和着吃，我除了乞讨用的家什，别无所有。因为怕被头人害，二十三年来没敢再回家。”

* * *

已经没有时间询问另外两名僧人的详细身世了，因为还有

好几个基本问题都没来得及问，首先是衣食问题。后来通过整理出来的问卷调查的数据，我得知，下层僧人一年应该得到一百三十五到一百五十磅的口粮和四磅酥油，这些连他们需要的一半都不到。虽然，他们每天在诵经殿可以喝到四杯酥油茶，但与其说那是茶，不如说是水，因为烧几千名僧人喝的茶只放一块砖茶。他们还应该得到一百两藏银，这相当于人年均四到五个美元。实际上他们很少得到过钱，因为常常遭罚款，那点银两不停地被扣掉，以至于下层僧人总是负债累累。

一名堪布所得表面看是一个贫困僧人的三十倍，而实际远高于此。他们所得是没有可比标准的。对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堪布来说，通常拥有不止一家的私人庄园财产，而且掌管着寺院的全部财产，他们经营拉基会，不仅中饱私囊，而且从事出售视察庄园及其他特权的交易。

四位僧人告诉我，他们以前衣衫褴褛，我盯住他们的衣袍，看上去够整洁，他们解释说，现在穿的是平叛后发的。出逃的叛匪留在哲蚌寺内的衣服、料子都由“平叛委员会”没收，然后发给那些穿得最破的僧人们。同时，平叛委员会也掌控了粮食，所以僧人们现在都吃得饱了。

他们说：“其苏叫庄园农奴交出上等粮食，这种优等粮都进了上层喇嘛的仓库，或者变卖成钱。我们下层僧人得到的粮食是掺和了谷糠和沙粒的劣等粮。叛乱平息后，我们打开其苏的仓库，发现了大量的粮食，而且仓库底部的粮食都已变质腐烂。”

哲蚌寺被称作“学府”，我问，你们四人有谁识字？都摇头，只有强巴希瓦试图学过。

他说：“通过自学，我学会看懂一点儿经文，但不能用来看报，因为经文不是日常用语。想多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得干活维持生计。”在哲蚌寺待了多年的“弟子”，有的甚至待了几十年，没有人识字，甚至连字母都不认识。

人们告诉我，僧人头次进寺就会按必干活的年头分等级

的，有些人必须干十年，有的二十年，甚至更多，他们背水，背木头以及干其他扛包的活，还有扫地、扫雪以及修缮的活。在这个阶段，他们是“新僧人”，属于最低级，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升为“合格僧人”，按说可以干些好点儿的活了，然而，要想干上好点儿的活，必须“善待”上层喇嘛，这得花钱，因此他们不得不背负债务……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攀缘，普通僧人才有望爬到高级别，那时候才能获得学习的机会。

他们说，“但是贵族家的子弟很容易获得这样的级别，他们很快就会被提升上去”。花一千银元就可买到一个铁棒喇嘛的职位是“公开的秘密”。他们知道有二十起案子是贫困僧人被残暴的上层喇嘛“鞭笞致残”，原因就是他们送不起礼。一名十六岁的小僧人因对钦帕次美的侄儿“没有致敬”而被杀害。此案报到铁棒喇嘛那儿，他竟然以处罚金宣判这一杀人案，受罚的不是杀人者，而是小僧人的“师父”。

这四名僧人说，“寺院是你无法逃脱的人间地狱。”

我问：“你们是怎么听说解放军的？又是怎么得知那些新思想的？”强巴希瓦作了回答，其他三人表示赞同。

“在新年传召大法会上，我们听说要发动叛乱。上层喇嘛说，解放军要毁灭宗教，杀光老人，他们是‘食人肉的恶魔’，我们要准备和他们战斗。有些人去罗布林卡参战，剩下的都集结在这里，占据东山头，人人都发给了武器。有些人害怕打仗逃跑了，接着我们被告知，谁逃跑，谁的家人就会被投进河里。后来我们听到罗布林卡传来的枪声，据说色拉寺已被毁了一半^①，许多僧人都逃出了哲蚌寺，剩余的人开始挖战壕，准备迎战。

“两天后，山下上来两名有威望的藏族人，他们说，山下已了解放军，叫他们两人到哲蚌寺做解释，所有守法的僧人都将得到保护，宗教也将得到保护，被强迫参战的人不会受惩

^① 这不真实。

罚，那些参战的人只要投降了，也不会有事的。接下来，全体贫困僧人都要马上投降，只有两名铁棒喇嘛和一名堪布把武器藏在了佛像下，准备迎战。你们今天遇到的三名堪布说，‘让我们和解放军谈谈’，所有贫困僧人都支持，剩下的人，没有贫困僧人是不能打仗的。这样选出代表下山去和解放军谈判，结果决定投降。

“接着解放军进入哲蚌寺，从佛像下找出了藏匿的武器，只把藏武器的大喇嘛抓了起来。完后，当兵的就走了，接着派来了‘工作组’。他们安排每个人参加对政府政策的学习。现在我们过得很幸福，再不会挨皮鞭了。如今，每个人都第一次得到了宗教的自由，而且有足够的饭吃。”

我问：“你们吃的粮食是从哲蚌寺庄园来的呢，还是政府补贴的？”

他们回答，是哲蚌寺的存粮，这些粮食足够人们吃六个月。庄园不再给寺院粮食了，因为已被政府没收了。哲蚌寺因为参加叛乱，从今以后，庄园里的粮食不是归政府，就是归耕种土地的庄园农奴。因此，哲蚌寺僧人期望六个月后，能够制定出生存的计划，既有寺院的生存计划，也有个人的生存计划。那些希望离开寺院的人可以自由离开，但政府要他们别急着走，应该先为寺院未来做出计划，然后再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今后，期待有体力的僧人能够自食其力，寺院还将收取信徒的捐赠，但这些捐赠将在委员会的监管下诚实地使用，在该委员会中所有僧人都有发言权，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维持僧人生计，政府将予以补贴，只是不知道这种补贴从何而来，但都清楚，哲蚌寺将被列为“历史纪念馆”而得到维持费，年迈不能干活以维持生计的僧人将得到“救济”，也许会给那些有学问，管理宗教事务的喇嘛发薪水，当然，所有的生活、工作的安排都将民主地做出决定。

我问他们四人各自的打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强巴希瓦说：“现在既然不再有鞭笞和酷刑了，我想还是继续宗教生涯。我也想从事生产劳动，这样既可以自食其力，也为帮助西藏人民，也许我搞灌溉。我还想看书写字，学经文。”

洛桑厅巴说：“我在暗无天日、没有自由中度过了半生，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如今人民站起来了，我想和他们一样站起来，我先要回四川，看望我的老母亲，她已七十七岁了，我已有二十二年没见她了。之后，我再决定干什么。我不打算再待在寺院了，但无论怎样，我都将参加生产劳动，不在拉萨就在四川。”

益西尼玛说：“我以前的生活不如牛马，然而，我还是想过宗教生活，想做一名好僧人，也想参加有用的劳动，还想多学东西。”

扎西泽金说：“寺院的生活特别痛苦，无论如何都不想待下去了，也不想再当僧人了。这里的政治学习一结束，我就离开哲蚌寺，之后去找份工作，我家就在寺院附近。”

* * *

在对两个人物的漫长专访中，僧人为我们描绘的哲蚌寺的形象得到了证实，政府对待西藏寺院政策的总体观念使这一形象丰满了。接受专访的一位是卫璜（Wei Huang），来自西藏新政府宗教事务委员会，另一位是梁昆（Liang Kun），来自西藏工委。

国外制造、广泛传播的攻击言论说，寺院遭到粗暴毁坏，面对真相，这种言论断然被否定。两位说，在西藏没有一座寺院遭到粗暴毁坏，也没有一座寺院的文物或宝藏被解放军洗劫过。（我曾在许多住宅区核实过这种声明的真实性，结果发现所有地方都确认声明是真实的。）战斗中少数寺庙遭到损坏，但都已修复。唯一受损严重的是小昭寺，那儿的战斗曾经很激烈，部分寺顶和一堵院墙被损坏，这些正在修理，但修复还要

花时间。政府注重寺院的修缮似乎值得关注。我很惊讶地得知，百名劳工被调集修缮寺庙，而且由政府支付酬劳，尽管这些损坏并不是战斗造成的，而是长年失修的结果。

他们说：“西藏建筑使用一种叫阿嘎（Aga）的三合土，到了冬天，这种建筑材料就开裂，我们出钱修缮了主殿，还修缮了四所经院中的各种建筑，并修葺了达赖喇嘛在那儿的私人宅邸。”

我吃惊地问：“你们干吗修理达赖喇嘛的宅邸？他从未来住过，以后也不会回来，除了他，别人也不允许用，因为那样会亵渎神灵。”

卫带着责备的眼神看着我说：“这所住宅曾耗费大量的西藏工人的劳动，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劳动，为了以后的用场，必须保持它的完好。”

据我们了解，哲蚌寺的组织机构有各种扎仓或称经院，最高行政官是掌管财务和商贸的其苏，他们组成了拉基会。据卫、梁二人介绍，这是西藏其他寺院组织机构的典范，政府的对应办法也具典型性，引进一个由藏族人士组成的“工作组”，成立一个由僧人自身构成的“平叛委员会”，临时负责政治学习和调查研究。卫说，期待哲蚌寺这样的团队的约在两周后结束各种集会，之后就解散这样的组织，当然要在协助建立起新的寺院行政机构后。以往的宗教领导人将继续管理宗教事务，但日常的行政管理将在一个“民主管理”的机制下进行，在这个机制中下层僧人具有发言权。原有的一些办事处自动废止，再也没有庄园主的位置了，也不会再收高利贷了，因为这种事务不复存在了。

卫璜说：“组织体制将由僧人自己讨论建立，我们需要的是他们遵守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不再允许寺院拥有庄园，也不再允许设立法庭、监狱，不允许对任何人施酷刑、鞭刑。必须尊重下层僧人的‘人身自由’。下层僧人有权参加或不参加佛事活动，甚至有权彻底离开寺院，不过我们希望他们别走得

太匆忙。”

这引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我问：“他们有没有参加或者不参加你们政治学习的自由呢？”听到这个提问，卫璜笑了。

“我们期待他们参加这种政治学习，因为他们曾经参加了武装叛乱，他们的首要义务就是了解国家法律。我们本可以把他们当作囚犯，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采取在他们住处附近举办学习班，召开讨论会的方式，我们会提醒那些不参加的人，但他们要是坚持不参加，我们也无奈。大多数年轻僧人都愿意参加，这使他们首次感受到好日子的可能性。当然，有一些老喇嘛从来都不离开自己的房间，只是打坐，盯着虚无的世界。我们不打扰他们，他们有弟子拿饭给他们吃。”

这倒引我问起隐居者的事情，居士以常年待在山洞中而出名。卫告诉我拉萨城区西头就有这样一个隐居者，他在山洞中一住就是五十年，从没有下来过。“工作队问我，要不要上去做些调查，我告诉他们打扰他的修行，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可以跟他的弟子联系，看看老人吃的够不够，如果不够，就叫他们给他的篮子里加一些。到了冬天，工作组跟他弟子混熟了，那时倒可以上去看看老人究竟过得怎么样。五十年可不算短啊！”卫的语调中含有对老人的怜悯心，对老人顽强的毅力，流露出钦佩，该隐居者创造了拉萨地区的最长纪录，也许创世界隐居之最。

我问，是不是西藏所有的寺院都要经历这些变革？我们记者团也访问了班禅额尔德尼的领地，据说，那里没有实行军管，也没有工作组进驻寺院，似乎也没有什么改革。比如，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好像没有没收上层喇嘛的衣物，没有什么穿的可给贫困僧人的。

卫璜和梁昆两人相互补充，共同坦率而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西藏所有寺院无一例外，不论参加还是没有参加叛乱，都必须遵守法律。这就是说谁都不允许再私设法庭、监狱，不允许再因放高利贷而施鞭刑、酷刑，必须实施民主。在日常事务中，允许下层僧人有发言权。参加和未参加叛乱寺庙的区别在于，没收叛乱寺院的庄园和封建财产，对待未参加叛乱的寺庙，国家予以补偿，实行临时军管，并期待他们自行改革。这些区别虽然很重要，但并不影响所有寺院遵守同一法律的未来义务。

“其次，我们并不想立即强制实施这一切，采取军管的目的并不是要强行改革，况且要那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我们尊重班禅额尔德尼以及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希望给予他们时间，自己实施改革。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西藏宗教绝对权威已给以改革大力的协助。我们不准备派观察员前往其属地，对其寺院改革的响应力和实施速度进行检查，我们把这些留给班禅额尔德尼自己。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寺院的一部分首领正在哲蚌寺了解改革的进程，目的是制定出自己的改革计划。我们也知道，没有改革的寺院将得到僧人自己的及时纠正，也会得到西藏人民的及时纠正，因为这是正当的方式。

“我们军管的任务比较简单，也比较临时。我们并不打算改革西藏所有的寺院。我们以有限的人力开展了六个月的工作，期望再有一个月就能结束这些工作。我们挑出十大叛乱寺院，对它们实行了军管，帮助组织寺院的下属僧人，试图把这十大寺院树为民主、守法寺院的榜样，我们期待其他寺院向这十大寺院学习，效仿他们的做法。仅哲蚌寺一家就有七百个分寺。其余的寺院可以留给西藏人民，留给僧人自己，留给新的民主政府，在该政府中农民和下属僧人都有发言权。如果有寺院依然向僧人施鞭刑，僧人就可以离开。

“我们自己开始这项工作时，并不了解寺院内的生活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哲蚌寺在从事武装叛乱活动，现必须让其恢复秩序。通过与下层僧人谈心，通过政治学习班上的讨论，通

过控诉大会，这座寺院与西藏人民遭受剥削的关系，与下层僧人的关系以及与叛乱的关系，整个暴露了出来，不仅暴露在寺中下层僧人面前，也暴露在我们面前。这一阶段的工作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即将结束，再有一个月我们工作组就将离开。

“通过上述活动，我们还了解到西藏人民恨透了寺院，哲蚌寺在过去犯下了许多罪恶，所以，在西藏有一个普遍要求，要求彻底摧毁哲蚌寺。然而，考虑到哲蚌寺曾经显赫的宗教地位以及享有的名望，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保留它，从它的内部进行改革。作为国家级的历史纪念馆，哲蚌寺将长久得到资助。哲蚌寺能维持多久寺院的状况，要取决于该寺僧人的选择，还取决于那些选择当僧人的西藏人民，他们说了算。”

我问：“你们会禁止往寺院里送小僧人吗？你们允许父母送孩子进寺院接受宗教教育吗？”

回答是，还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好像也不会有人提，他们说：“我们的寺院不对孩子提供教育，不要将西方的教会学校与这里的寺院混为一谈。一些像格西那样的大喇嘛在佛教理论上虽然很有学问，但大多数僧人，即使五十岁了，也不识字。孩子一般不会送进寺院受教育。贵族很少送孩子进寺院，农奴是被迫送孩子入寺的。父母根本就不想那么做，也不想继续那样做了，何况他们现在已有拒绝那样做的自由了。”

卫璜希望下层僧人“别太快离开寺院”，梁昆也肯定地说，多数贫困僧人都“急于离开寺院”，而“我们则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别走”。我问，一个党委会干吗劝导僧人留下来，在西方，很难使人相信共产党劝导人留在寺院里是严肃认真的。

卫、梁两人都答道，“之所以让僧人多用些时间对未来做决定，原因很多”。他们说：“目前寺院声誉因罪孽太重而很差，僧人脱离寺院的愿望空前高涨，然而，一旦成千上万的僧人一下离开寺院，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因为安置僧人住房和就业是很难的，对老年的僧人也非常难，他们许多都不适应离开了，要找专人照顾他们。已建立起的社会组织不应

该突然解散。

“每个僧人都应该考虑好自己的出路，如果有人想回家，就让他回去看看；有人想结婚，就让他考虑一下，有的教派允许，可以和他所在的寺院商量商量；有人想过宗教生活，那就别屈服于暂时的厌恶感。无论怎样，凡离开的人，走之前，都应该为寺院的重建提供自己有益的经验 and 想法。这里是一个人的团体，有相当多的劳动力，有住房，有可供集会的建筑，还有可开垦的土地。总得有人决定寺院的未来吧。那些久住寺院的人们总该有一些想法吧，他们应该和自己的伙伴讨论可以开展什么有用的活动，应该讨论共同的问题，如婚姻、生产劳动，还有这些问题和西藏未来都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既有益于僧人自身的发展，也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同时，他们出生的村庄会为他们保留一份土地，为了给他们时间做选择，农会帮助他们耕种所留的土地。”

这些理由对我似乎清晰而合乎情理，它们使西藏的未来充满希望。

第十一章

农奴自己的第一次收成

九月初，拉萨地区的第一场收割在一片六十英亩的青稞地里宣布开镰。这片地在拉萨东郊南部。山南（Loka）地区的收割正全面展开，林芝（Takun）地区的收割已经结束。记者团的其他成员都前往采访报道山南和林芝两地的秋收，我的报导在拉萨地区，因而先行一步。拉萨的地理位置比上面两个地区的都要靠北，海拔也要高一些，因此秋收也就晚一些。

我们乘车向那片田地进发，泥土小道坑洼不平，车子颠簸着缓慢前行。乍一看，眼前情景并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见路的远处有人在收割，隔着一片荒草重生未经过耕耘的土地。我们下了车，在野草荆棘中找路，向远处那群在阳光下弓腰干活的人们走去。远处传来阵阵歌唱声，当我们快到跟前时，人们的嘈杂声却在变小，在朝远处的山岭退去，他们干活的速度似乎比我们的脚步快。

头顶烈日，脚踩坑洼不平的田地，还要跨许多不规则的水沟，我越来越累。我开始还以为，那些沟槽是用来灌溉的，后来发现它们更像排水的，最后得知这种沟槽既用来灌溉，也用于排涝。当然，农田一点儿都不整齐。这时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跟前，水面挺宽，藏族主人只好脱掉鞋子，打着赤脚，挽起裤

腿，蹚水而过。他们中的一人把我背起来，这好像使我比他还要累。光走路，我都比割麦子的西藏农民累。

我们总算走到了一片开阔地，麦子已经收割完毕，但遍地都是麦茬儿，还是很难行走，加上大太阳，我索性瘫坐在一堆儿没来得及搬走的麦垛上，掏出笔记本、照相机，四处观望收割的情景。在地边，远近不等地分布着百十来个人，多数人这会儿都就地坐下休息。他们开始唱歌，围成圈坐，圈与圈的间隔可以使他们各唱各的调，互不干扰。离我不远处几个妇女仍在干活，她们把一捆捆麦子往一个大麦垛上擦。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们也坐下了。此时，唯一没停下休息的是五六名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帮忙收割的，他们干劲十足，只见他们挥镰扫荡着麦田，为了遮挡太阳，他们个个头戴宽檐圆形大草帽。这会儿，我养足了体力，拍下了他们的照片。他们后来也坐下休息了。

起初，这不大像一场有秩序的收割。田地坑洼不平，根本没有行距，长出的青稞中混杂着大量野草，蔓生植物缠绕、覆盖了青稞，少量的青稞还长得参差不齐。叫我说，那不过是寥寥无几的麦穗在草海中摇摆。我纳闷为什么来这么多收割者？听说这块田地归二十五户差巴人家所有，可来收割的人远远超过了一百名。

我的藏族主人回答，收割者不止是差巴人户，还来了许多帮忙的人，他们来自拉萨的两个居委会，还有解放军。上午他们停下来休息。差巴显然被这一有尊严的时刻所打动，这一时刻他们受到这么多朋友的如此之多的关注，他们非常愉快地接待客人，指给人们要收割的地方，这种事情以前从未有过。

小憩之后，收割者纷纷起身接着干，边干边不停地唱，他们再次割到了田地边上，快得我都赶不上。男男女女，割的割，捆的捆，擦的擦。一位名叫罗布（Norbu）的差巴在我身边停下来，开始给我讲解，我挺客气地告诉他我对这片田地的看法，当然我说得很巧妙，我问，他们期望打多少粮食。

我没想到他竟说，这块地里的收成不是一般的好，他满意地说：“每藏克种子可打十一藏克粮食，这不是一块良田，长满了野草，可它却是我们二十五户差巴人家的口粮地，我们从没有时间给地除草，因为我们必须在领主地里干活，还要为他服劳役，我们根本腾不出时间种自己的地。今年叛乱平息后，我们开始播种。之前我们没有种子下地，直到政府拨给我们无息贷款才买了种子，可是叛乱分子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粮食。我们知道今年粮食收成将归我们所有，我们给地施了两遍肥，除了三次草，今年每藏克种子可打十一藏克粮食。”罗布还补充说，今年他们还将获得好田地里的收成，那田是他们为领主耕种的。^①

我想不到给地除草，也想不到此关系到产量的好与坏，而罗布知道，对今年的产量显然很高兴。我问他，将用这些粮食干什么？他说，拿一些做粮种，卖一些换点钱，给孩子买衣服，其余的磨成糌粑面，这是西藏的主食，这种食品装在口袋里便于携带，随时随地揉成面团就可食用，这基本是一种熟食。

罗布又讲了不少事情，再次说明了他脸上笑容的由来。过去他一家“从未吃饱过肚子”，穿的是破衣烂衫或补丁擦补丁的衣服。今年他们将有足够的糌粑吃，甚至还能吃上一些蔬菜。过去，即使种了菜，也别想吃到。今年政府无息贷给他们粮种，正是在他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叛乱分子拿走了他们的

^① 收成的数字在西藏很难计算，也算不准，人们不是以一块地的产量来计算，而是以种子数量产出的粮食数量来计算，因此，这样计算出来的平均产量是很低的，只有种子数量的四倍。农奴主使用的称粮器分两种，因此一藏克粮食有两种重量，当领主收取农奴租子时，用的是大藏克，重约三十四磅，而向他们出租粮食种子时，则用小藏克，重约二十七磅。一藏克土地指的是播种一藏克粮食的土地，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地。拿二十七点五磅的一藏克来说，该数量的土地过去亩产量为十三点七薄土耳（英文 BUSHEL，是一个计量单位。它是一种定量容器，好像我国旧时的斗、升等计量单位），现在的产量是三十薄土耳，良田上的收成可达五十五薄土耳。这些数字都比西藏平均的亩产量高，不过，拉萨土地肥沃。

粮食，眼看着播种的时节到来。这些田地顺利地播种完毕，如今到了收割的时节，人们可以收割庄稼先熟了的田地，不用像以前那样，先要收割领主地里的庄稼。这么多朋友来帮忙，有多快活啊！不仅如此，人们享有了自由，可以停下手上的活，与客人聊天。以前，诸如洗脸、梳头或洗澡这类事，要是被管家看到了，发现你整洁了，那可就遭殃了，他会骂你游手好闲，并马上给你派活干。

对罗布来说，生活似乎非常不错了。下一个收割季节会更好，因为，下一次播种会有纯净的种子。过去，粮食全进了领主的仓库，粮种在西藏向来不纯，总掺杂着草籽，今年他们将给自己留出纯净的种子。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又来到必须赤脚蹚过的小溪边，这回我告诉他们一种比背着我强多了的过河办法，这是我从登山中学到的，我示范给他们，将四只手握在一起，形成一个座，有两个人以极大的兴趣学着，抬我过了小溪。

* * *

紧随我后，山南和林芝的报导也出来了。据报道，那里的收割更早些，因为海拔都比较低。这两个地方都位于拉萨的东南方，林芝最靠东。两地，尤其是山南，其可耕地达八万三千英亩，林芝的达三万三千英亩，都以“西藏粮仓”著称。山南与印度接壤，拥有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这里的粮食亩产量达十六至二十二薄土耳，有时高达二十七薄土耳，拥有十六万人口。

山南自诩为西藏藏族的发祥地，甚至自称是人类的发祥地。神话里与女魔成亲衍生人类的美猴王〔这一西藏神话早于达尔文（Darwin）数百年〕据说就生活在山南，就在山南首府泽当（Chentang）的附近。比较能证明这一点的是西藏第一位著名君主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结亲，他迁都拉萨之前就是泽当的君王。

拉萨大多数贵族来自山南，和松赞干布一样，他们也在这个“粮仓”中找到了财富，凭借此，他们发了家。他们一直拥有山南庄园，其农奴人数有时多达上万人。尤其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是，叛乱头子个个拥有如此庞大的家产。索康（Surkong）在山南拥有六座庄园，凯墨（Khemey），其庄园在“拉萨东头的村庄”一章里已写到了，我们参观过，也拥有山南的庄园，叛乱分子把山南作为主要基地，利用这里空投外国武器，为康巴人安营扎寨。拉萨叛乱失败后，他们便把山南当作所谓的“第二首都”，准备以这里为中心，在全西藏展开长期游击战。出于该目的，山南被当作粮食供应地，还有与印度接壤的漫长边境线，线上有十六个关卡可通国外，加上山南北面流淌的雅鲁藏布江，既是一道屏障，也是通往西藏许多地方的捷径。

但是，叛乱分子忘记了决定因素。山南农民遭受叛乱分子的野蛮蹂躏，长达一整年，因此帮助解放军消灭叛乱分子的劲头十足。正像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那样，解放军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所展开的劝降“政治攻势”，比以武力逮捕的叛乱分子还多。到叛乱在山南平息时，播种的季节已经晚了，解放军赶紧全力向被叛乱分子抢光了的农民补发粮种。保证将叛乱分子土地上收成分给耕种者，这一激励政策最早就是在山南颁布的。与此同时，解放军还出人力畜力帮助农奴播种。这种合作在山南掀起一场空前的、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土地归耕种者”的政策首先在山南推行。

我们记者团九月初访问山南时，那里的“三废除”运动已基本结束，叛乱农奴主代理人被逮捕，有的坐了牢，还有些经过农民的“批斗会”后，在他们以前的房子住下，接受他们以前农奴的监视。废除了一百七十万薄士耳的封建债务，人均债务十几薄士耳，足够山南人口吃两年以上。封建债务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一万六千名朗生获得了自由，不仅摆脱了繁重的徭役，而且获得了住房和吃的。好几个地方已经开始分土地，有的庄园土地分配已经结束。山南是试点，西藏其他地方



拉萨附近的第一场收割

还没有开展分土地。

分配政策已经出现。以前的农奴通常能得到他们习惯耕种的土地，没有打算实行绝对平等。众所周知，差巴拥有固定的一小块土地；朗生没有土地，是给头人种地的，现在可获得部分由他们耕种的土地，这种地比差巴的要好，所以只能获得一小块。这种分配比较实际，因为朗生没有大家庭，除了从头人庄园里分到的东西，朗生既没有牲畜，也没有农具。此外，朗生最有可能组成互助组，可以很快种好以前给头人种的同一块地。把分配给各自的土地集中起来种，他们会更乐意，这样仅用少数畜力就可以获得好收成。

地主、地主的代理人以及叛乱分子的亲戚只要肯干，也可以分到一份土地。甚至连那些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的人，只要



解放军帮助收割

不是叛乱的首领，也为他们保留了一份土地，等待他们回来耕种。僧人也同样享有一份土地，在他们做出抉择前都会为他们保留。凡不在者的土地都有农会耕种，收获归村庄共同所有。与其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会的负担，不如说这样做巩固了农会的权力，加强了集体管理土地的力量。分田到户的精确数字通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终于确定了。

农户一旦拥有了自己的那块土地，就会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在记者团访问过的地方，那里分田到户刚三周，互助组很快就成立起来，肥料也积好了。在凯松（Ksesong）庄园，人们已积了四万四千磅肥料，以备施肥之用。这里的农民还宣称，他们现在更加注意个人卫生了。

“过去，人们不敢洗脸，因为管家会把这当作炫耀。如今人们一天洗好几次脸，甚至还洗头，洗脏衬衫了。人们可以毫

无顾忌地在田间地头大声唱歌了。可在以前，如果在地里唱歌，头人会呵斥，‘歌声会招至天降冰雹，你敢负这个责任吗？’如今人们想唱多久唱多久，想唱多响唱多响。人们还把新词填进老调里，在地头休息时，人们甚至有了自己的戏班子和歌舞队。”

在泽当的一个庄园里，记者团碰到了划地界的，就这一举动，引来了一群人。

一个记者报导说：“泽当出去半英里，我们看见一群农民，称去分土地，我们随同前往，一路上，我们和一名农会领导成员攀谈起来，他给我们看各户人家分到土地数量的名单。”



收割节上的骑手



着盛装的斟酒女子

这位农民领导告诉我们，这个表通过了好几级农会的讨论才决定下来。先由农会常务委员会拟定预案，然后经整个农会讨论，接着按地界开展农民小组讨论，下来常务委员会按照建议修改预案，最后由农会讨论通过。讨论没有间断地进行了三周。

记者团来到了地头，只见一个委员会成员正在丈量土地，这时农会主席宣布，“本块田地归某某所有”。土地的新主人接着拿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桩子钉进地里，常常还要立一块牌子，写上名字。其他农民向土地的新主人表示祝贺，并帮他钉地界桩。一钉完地界桩子，土地的新主人常常去给下一块土地，给他的邻居帮忙。大约四十多户人家就这样在这片地里分到了一

份土地。其他人将于第二天在另一块地里分到土地。

山南第一例土地分配会是什么样的呢？（既然是山南的第一例，那么也就是全西藏的第一例。）这次土地分配于八月六日和七日在凯墨庄园展开，将近一个月后，记者团访问了那座庄园，已经可见从那时以来的所有变化。这个庄园并不大，有一千五百五十一藏克（二百六十英亩）可耕地，八十户人家，三百九十三口人。村里约半数人家（二十九户差巴和部分堆穷）有固定的石窝棚住所，而且有固定的他们习惯了的可耕地，他们既靠出力，也靠种粮偿还房租和地租。另外半数人家，其中十户是朗生，大多数是堆穷，他们既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固定的可耕地，既没有工具，也没有畜力。该庄园拥有十六匹马，十五头牛，三十一头驴，一百四十七只绵羊或山羊。

记者团报导：“我们去了圈毛驴的地方，发现二十名朗生也睡在那里，那是一个有顶棚，有半截石头围墙的牲口厩。”

一个叫次旺曲吉（Chewang Chuchi）的朗生，二十一岁，现是农会主席。记者与她交谈，了解她的身世。她父亲曾经是养马奴隶，专为主人放马，现在还活着，但她的母亲已去世。她有一个兄弟、两个姊妹。她自己不满十岁就给主人家看牛，满十六岁就成为庄园的全职奴隶，给主人背水、烧茶和煮饭，这位主人只是一位长住代理人。曲珍当然没有报酬，只是每月能得到四十三磅糌粑面、一小点盐巴和“一小块酥油，但必须逢主人高兴时”。每年一次她可以得到粗糙的家纺毛线，够做一条袍子，既没有内衣，也没有鞋子。

她说：“要想得到鞋子，就得忍饥挨饿卖掉一些糌粑口粮”。

她的主人常叫人用鞭子抽她，有时用棍子打，有时用被称作“掌”的硬皮子打，这是一种钉在长棍上的，像鞋底一样的刑具。她神情冷静地说，“所有朗生都挨打”。

叛乱期间，叛乱分子来到主人宅子，跟代理人谈了一会儿，后来代理人把她带到地里，在那儿她遭到十二名叛匪的强

奸。在平息叛乱中，该代理人被抓了起来，曲珍在一次“控诉大会”上控告了他，其他人也控告他，他现在坐了监狱。

年轻的女主席告诉记者团，“过去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今我们站起来了！过去我们衣不遮体，如今我们从主人库房里得到了换洗的衣服。过去我们朗生睡在驴厩里，如今我们睡在主人的房屋。”

这里的土地分配都是在这位年轻女子主持下进行的。首先，为一所新小学留出了十七藏克（三英亩）地，然后，又划出八十藏克（十三点六英亩）地，留给那些在叛乱中出逃的农民，他们有可能回来。所有这些地，包括小学校的地，同时由农会代耕。剩余的土地全都按私有财产分给了以前当农奴的农民，人均分得三点五藏克（刚好半英亩多一点）地，每户约得二或三英亩土地。朗生分到的少一些，但他们得到的是优良土地，是从主人地里划出来的，是他们以前当奴隶时耕种的地。解除了三十六人的乌拉差役，他们都是差巴家庭成员，为了家用的一点点土地而无偿地终日劳作。

原来睡驴圈的朗生现在都搬进了庄园主的住宅，每一家都分到一间房。原来庄园的牲畜、农具、家具也分给了他们，因为他们曾经一无所有。宅子里最好的房子分给了次旺曲珍，因为她是主席，常在家中接待官方来人。她与父亲及两个妹妹同住这间房。她弟弟被送去学习，将成为有技能的人。次旺曲珍家只分到七藏克（零点一七英亩）地，这还不到五口之家平均数的一半。她认为这就够了，因为父亲已不能再干活了，两个妹妹又太小，弟弟又出门在外学手艺。

已建起一所小学，有二十一名小学生，这所学校晚上还办成人夜校，有六十人学识字。

这些就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七日在山南凯墨庄园分土地的情况……这可能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当然，凯墨庄园是最早开展土地分配的庄园之一。

* * *

在林芝地区，收割已经结束。林芝是西藏最暖和的地带，其海拔降到一万英尺以下，因此土壤优良，什么都长得好。树林里野生着不少果树，村庄里也种了不少果树。这里森林茂密，拉萨的木材全都出自这里。林芝甚至有这样的地方，海拔沉入山谷，只有两三千英尺，出产香蕉。西藏产香蕉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和西藏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真可谓西藏江南，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又有谁知道那些香蕉呢！

林芝人口稀疏，原因是交通不便，前往很不容易。这里的可耕地只有三万三千三百英亩，还不到山南地区的五分之二。庄稼收成通常略高于西藏的大多数地区，亩产可达十八或二十薄土耳。今年粮食产量一跃增长到三十薄土耳。原因当然和山南一样，叛乱平息了，农奴知道所打的粮食将归他们自己。叛乱前的几周，这里就播下了种，叛乱平息时，庄稼已有四至十二英寸高了。积极性高涨的农民抓紧除草浇灌，这在以前是没有时间顾及的。

我从新华社赵家烈（Chao Chia-li）处了解到这一切。赵刚从林芝来，他了解那个地区的情况。过去的四年中，他每年都要去那里搞调查，了解那里的进展。他说，拉萨至昌都的公路要经过林芝的北边，当时康巴人进藏帮助发动叛乱，就是从那里涌入西藏腹地的。拉萨叛乱之前，他们在林芝整整掠夺破坏了一年。部分康巴人在林芝住下不走了，把这里当作主要叛乱基地山南的一个疏散地。因此，林芝的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解放军消灭这些土匪，林芝的叛乱很快就被击败，叛匪逃入山南，其中有些可能随山南叛匪逃到了印度。

林芝的农民说，像今年这么好的收成以前也有过，但不多。他们说：“十次有九次的收成都不怎么好。如今，我们站起来了，所以获得了大丰收！”

以前所有的粮食都进了主人的仓库，主人的代理人监视着

收割，盯着打下的粮食入库。通常农奴收成的一半都交了地租，剩下的另一半也基本拿出偿还主人的债务。朗生所耕种的地里产下的粮食自然全归了贵族。今年农民收获了很多粮食，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粮库，以前也没有可存放的粮食。有的人搬到小房子住，腾出住房存放粮食。也有的人进森林伐木，现盖库房。

没有人考虑过卖粮食，因为他们从没有粮食可卖，从来都没吃饱过。赵认为，等林芝地区分了土地，人们就会修建公用的库房设施，到时农民会考虑卖余粮买必需品的事。现在农民看到有这么多粮食吃，非常激动，哪里舍得拿去卖。

林芝收割时，农民也是又唱又乐，赵记录了几首歌的歌词，并译给我们听。我不知道用藏语唱是不是好听，因为翻译成英文后并不怎么样，不过可以知道其中的意思。第一首歌是在一个叫恰拉（Chala）的地方田间创作出来的，那里上百人收割庄稼，装上驴车，往家运粮，他们边干边唱：

恰拉头人高高耸，恰似经幡空中飘；经幡倒在风
暴中，换来阳光照西藏。噢，恰拉来了工作队，它是
恰拉的幸福队，带来毛主席光辉，温暖西藏人民
的心。

另一首歌是一位叫度姆（Dumu）的妇女创作的，她曾经是一个差巴，年年眼睁睁地看着打下的粮食全都拿去还了债，经历了服不完的徭役。常常苦干一年，到头来反倒欠了债，为了换口饭，只好拿牲畜和个人物品去抵押。今年，她家打下四十薄土耳其的粮食，留出全家足够的口粮、种子，还小有剩余。今年，改革宣布，废除了她家世代的终身债务五百薄土耳其，这一数目好像够她家吃十年的口粮。度姆写下一首歌：

过去我们是小树，头人用刀砍它的枝，寺院用斧

劈它的杆，嚼履用锹铲它的根，徭役是刀也是斧，扒了树皮砍树丫，小树就此把命丧。

如今人们是大树，树根深入穷人心，无人胆敢再砍它，共产党浇树，树常青。

赵说，还有一首歌，虽然不是林芝的歌，但林芝人都传唱它，没人知道它来自哪儿，只知它在全西藏都流行，歌词是这样的：

达赖喇嘛的太阳照头人；毛主席的太阳照人民；
如今头人太阳落，换来人民太阳升。

像这样的歌，由田间收割的农民唱，最好听。

* * *

九月的第一周，拉萨迎来了一个为期三周的节日，叫“望果节”，即丰收节。这一节日时逢收割前夕，该节日并未设定在收割的末期，是因为拉萨多数地区的粮食还未成熟，还不能收割。该节日的日期早在三世纪前就定了，是去北京朝觐皇上回来的五世达赖喇嘛定的。那次去北京，清朝皇帝赐予他“达赖喇嘛”的称号，封他为“西域佛法之王，智慧无边的神王，雷电王”，并下谕旨于他，“统一西藏部落”（原文如此。参见26页编注）。历史没有记载为什么五世达赖喇嘛选定此日为“望果节”，也许因为此时为寺院视察收成，决定收取多少粮租的好日子。一九五九年正逢收割的前夕，这个节日降临在拉萨的多数地区，人们纷纷出门，欢庆这一节日。

为庆祝这一节日，寺院祈祷、诵经、点燃酥油灯，罗布林卡对外开放，以迎接人们的野餐聚会。这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允许人民进入这里的宫殿。年轻人载歌载舞，在主要园区的树荫下演出自编的戏剧；老年人尽情观赏雄伟的十三世达赖喇

嘛故宫和壮丽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新宫，畅游“赴极乐世界方舟”。没有人报导他们对这一壮观建筑的观感，他们的感受很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需要进一步受教育，真正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第二天，几名记者应邀参加拉萨西边一个村庄的田间庆典，人们将庆祝开镰和“三反”运动的结束。

我们早早用了午餐，出了城，乘车向西走了几英里，在远处可以望见哲蚌寺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车向左拐上了一条松软的泥土路，一直开到一片宽敞的绿色草场上。好几百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人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到时，只见大多数人都坐在地上，为了防潮，人们有的垫块垫子，或垫块毯子，还有的垫一小块油布，他们全都面向一个盖了天篷、装饰一新的台子，上面有人正在讲话。在人群背后，围绕着会场，支起了十二顶大帐篷，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帐篷，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同，显然多是由对建筑形式有见解的人设计的。放眼望去，这片草坪为群山环绕，有的山峰已覆盖了晚秋的霜雪，有的则笼罩在变幻多端的云雾中。

我们还没有走到跟前，会议就结束了，人群散开。农会委员过来迎接我们，并让给我们一顶帐篷，这使我们有地方搁餐盒和挎包了，万一下雨，还可以在里面躲雨。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漂亮帐篷是叛乱贵族的“度假帐篷”，为了节日的庆典，农会特意借出来的。我开始仔细地打量这些帐篷，大多数都是白色帆布质地的，上面都缝饰着“吉祥符”，颜色是鲜艳的蓝色，其中有一顶帐篷有一个前搭帘，是橘黄色的，呈扇贝形，还有一顶帐篷的后围布是鲜艳的深红色，这些色彩令人愉快。

走近看，人们衣着的颜色好像比在远处看还要缤纷夺目。所有农民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这里所谓的盛装是妇女坎肩式的长袍上露出大红、绿或蓝的衬衣袖子。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人身着戏装，这种服装看上去是专为登台演出或庆典表演而设计缝制的。五十多名骑手集合在一起，准备参加赛马。他们穿

着皮革制服，戴着鲜艳的羽毛，这使我想起了“布法罗·比尔”中野蛮的印第安人，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出戏。我特别注意到一位装扮炫耀的年轻人，他衣裤上的颜色至少有十几种，头戴一顶插着大红羽毛的大圆帽，背着一个装满羽毛箭的大箭囊，箭囊不停地在这小伙子肩头晃动，好几次都差点儿把他的大圆帽撞掉。

姑娘们穿着差不多的节日服装，头戴镶珠子的高头饰。她们围成圈，用古色古香带柄的金属大罐子向人们敬青稞酒、斟酥油茶。约有一半的人，几人一伙，围在一起喝酥油茶、青稞酒，另一半人排成一支长队，敲锣打鼓，排头的人举着红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幅画像，朝山的方向进发。我正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跟他们去时，那位刚才在台上讲话的人过来为我讲解这个节日。

他是拉萨西郊党委会委员，叫高同川（Kaotung-chuan）。该地区属这个党委会管辖。他说，这一庆祝活动是浪卡子（Nangawosi）村举办的。这个村非常大，拥有两千多口人。西藏多数地方，庄园都比村庄大，一个庄园通常有好几个村庄。但是在拉萨附近，村庄往往比庄园大。浪卡子村的村民分属十七个庄园。上午的会议宣布了“三废除”运动的圆满结束，我们到时，会议已经开完。刚才那队离开草坪的人是去视察田间收割的，他们还将在现场给优秀耕种者颁发奖状。路很难走，很难跟上他们。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回到会场来。这里还将举行骑马表演，完后还有摔跤和歌舞。

我问，为什么在队伍头里举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画像？高说，这是地方委员会的主意，他们寻找能使节日更有意义的办法。三百年来，人们都是念经，抬着佛像去田间，今年，人们举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画像去田间会更有意思。人们要让毛主席、刘主席看到收成最好的土地，要在最好的小麦、青稞和豌豆地里，举杯向两位主席祝酒。毕竟，毛主席与这场丰收有关系。接着要用表示荣誉的旗帜插在收成最好的田地里，直到开

始收割才拿走。距开镰还有两三天时间。

高说，这里的三反运动按期结束，所以正好赶在这个庆典上做总结报告。今天上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做这个总结报告。召开了十次大会，控诉了三十三个人，其中有经营庄园的代理人、参加叛乱的领主和哲蚌寺的几个大喇嘛。一名叫措措（Tsu tsu）的代理人是前任县长，曾经杀害了六条人命，其中一位被害者怀有身孕，她因交不起租子，被活活抽死，腹中的胎儿也死了。

一位农民被杀的案子成为当地反响最大的杀人案。这位农民勇敢地杀死了一头豹子，犯下了亵渎神灵的罪，因而被处死。这头豹子曾吞噬了几户人家的牲畜，伤害了人，勇敢的农民诱捕并杀掉行凶的豹子，此何罪之有？可代理人说，“那头豹子是神，一个俗人竟敢对它出手！”因此，那位农民被活活抽死。这位农民是六位“被害者”之一，人们指控代理人群措是凶手。

我问：“三反运动的胜利具体体现了什么？将怎么处置这个代理人及另外三十二名被指控者？”

高说，三反运动的目的是唤醒人民，让人们认清农奴制的罪恶，不仅要让他们认清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且要认识苦难的根源在于罪恶的农奴制；让他们知道自己如今是土地的主人，不用再怕以前的头人了，不用再听从主子的使唤；让他们觉悟到，如今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三反的另一个目的是让人民亲眼看到废除封建债务，因为那是人们一个心病。

“这个村庄今天上午烧毁了所有的债务契约，合四万三千零三十二藏克（两万一千薄土耳）的粮食债务；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的银元债，这个数目相当于本村好几年的总收入。农奴们世代背负着这些债务，越背越重，永远偿还不清，这些债务于今天上午付之一炬。”他指着草坪上那一大堆纸灰说：“这一切干完了，三反运动就圆满结束了。”

高补充说：“被指控者的命运在他们自己手中，农民虽然

指控他们，但并没有判他们的死罪，这是法院的事，农民可以向法院呈递状子。如果被指控者认罪好，有悔过之心，就可能被放回家。相反，如果顽固不化，就有可能被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押犯。然而，即使是有六条人命案的代理人，已够上法庭了，但法院仍将根据事实，实事求是进行裁决。这种杀人罪犯不仅仅是因为凶手生性残忍，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农奴制的生活方式。该代理人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想取悦主子和迷信，所以他有可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在三反运动中，他的案子不属要案。只要人民被唤醒了觉悟，三反运动就算胜利了。”

这时，突然下起了阵雨，我们全体暂时撤进帐篷。很快太阳又出来了。那队人这时也从地里回来了。我们全聚在一起观看赛马、摔跤和歌舞表演。节目是在一条路上表演的，这条路正好从现已腾空了的大台子和一道缓坡中间穿过。人们上午就是坐在坡上开会，现在他们又坐下看表演了。人们特意在前排为我们记者团安放了鲜艳的卡垫。

我向人们问道，表演者穿的这种漂亮服装像是戏装或是在化装舞会上的服装，是这样的吗？他们告诉我，有的的确是从剧团借来的，但多数是私人的，这些是古老的民族节日服装，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些日子过得不错的差巴就有这种服装。一种极其残酷的压迫就是变卖祖传服装换口粮。一些骑手穿的服装是贵族家的，贵族为了在赛马时显示自己庄园的荣耀，而保留这种服装，马夫穿上这种服装为主子争荣耀。

“比赛”开始了。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比赛，路上本就没有专门的空地举行这种比赛。这是一种骑马者比赛，骑手各显神通。有一个骑手把手高高举起，这一姿势引人入胜，就好像他的身体是马的一部分，非常稳固。另一名骑手将整个身子藏在马的一侧，空悬着一只马镫，整个身子的重心全落在一支扒住马鞍的臂膀上。其他骑手喜欢展示自己的速度或勇猛，或在观众面前秀一秀自己的漂亮服装。这些服装上的图案奇

妙，色彩斑斓，红黄蓝相间，十分艳丽。差不多每个骑手肩上都挎一个大箭囊，头戴不可思议的帽子。马匹也被装束了一番，有的马披挂着富于装饰的马衣，长的都快拖到地上了。

五十多名骑手向人群及裁判展示几次本领后，他们开始骑马比赛。在远远的路上设了两个靶子，每个靶子的间距约一百五十英尺。骑手们都设法在疾驰中射中靶子。许多骑手都射中了第一个靶子，但很少有人射中第二个靶子，因为两个靶子的间距太近，骑手还没来得及抽出箭就跑过了第二个靶子。即使抽出了箭，也来不及瞄准、射击、中靶。有两名骑手射中了第二个靶子，受到场上观众的喝彩。

骑术、射箭结束，开始了歌舞表演。业余歌舞队穿着比谁都鲜艳的服装登台了。他们脸上罩着黑色描金的面具，头束大红缎子头巾，下身穿着绛紫色的灯笼裤，身披一块金底套蓝，间杂大红、玫瑰红和白色的缎子斗篷，从肩头垂下。这些色彩和他们的歌声一样无拘无束。他们遵循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狂放不羁的表现形式，但并不乏耐人寻味的和谐。几个舞者戴着用硬纸板做的金色王冠，冠宽好几英寸，他们的出场将表演引入高潮。

终于我们盼到了奖励哈达的时刻，显然哈达不仅用于礼仪上的赠品，赠送贵宾，而且也用作奖品，用于奖励赛马、射箭和跳舞的优胜者。舞蹈演员和骑手站成一个大圆圈，裁判向他们献哈达。有一个骑手，戴一顶饰有大红羽毛的帽子，他不时向我抛眼光，如果我是年轻姑娘的话，会把这当调情。我欣赏他俗丽的装束和活泼的气质。他也似乎被我这位来自远方，观看他们节庆的老太太吸引住了。

裁判给他献哈达时，他离我只有两英尺，他突然转过身来，向我深鞠一躬，接着将那条礼仪性的围巾送到了我的手上，此举多为芭蕾舞中男主角所为。人群注意到这一举动，立即喝彩，很快其他五名骑手也将自己的哈达放在了我手臂上。我站在那里，戴着六条哈达，听着人们的欢呼喝彩。这个节庆

吸收了一名外国人，似乎人人都为此而感到高兴。

一位老农民靠近我，用手触摸我的下巴，细细打量我的脸，问我的岁数，我回答七十三岁，可以听见四处传来对我年龄表示敬仰的低语声。

一位妇女说：“像您这么大把年纪的夫人远道而来，参加我们的节庆，了解我们的改革，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整个节庆的高潮，但这并不是因为我被选中接受荣誉了，而是这些摆脱农奴制不到两个月的农民，他们不仅充分懂得了他们在构建自己的未来，而且懂得了他们的行为对世界来说都具有历史性，他们渴望得到世界的认识。

第十二章

建设“天堂”

“在世界屋脊建设天堂”，这是一条标语。班禅额尔德尼、农场专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翻身解放的农奴都从各自的角度理解这条标语的含义，并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说明了这条标语的含义。

* * *

“西藏人民从现在起将走向幸福”，这是班禅额尔德尼对记者团说的一句话。我们记者团访问了日喀则，从拉萨往返，用了四天时间。日喀则是班禅的故乡，在那儿，记者团与他进行了座谈。班禅再也不在冷清、昏暗的古城堡内接待客人了，这座古堡比布达拉宫的历史还悠久，非常幽暗。他修了一座新宫，装备了现代化的设施，但还未竣工，他接待客人都是在一个夏季用的帐篷中进行，称那是一顶帐篷并不太合适，因为它太大，太帝王化。白色篷布上缝饰着彩色的“吉祥符”，篷布内挂满、铺满漂亮的毯子。这就是班禅一九五九年的办公地。

班禅当时说，“过去我们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机会受教育，只有少数贵族子弟有机会受教育，多数年轻人都被繁重的徭役所埋没，而如今封建的压迫已一去不返，年轻人将走出落后，

走向进步，走出黑暗见光明。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不满二十二岁的班禅额尔德尼从年轻人的未来谈到了这个“天堂”。也许他想到了他的幼年，一个青海农家子弟。他自己的生活当然充满光明，道路当然非常宽广。他身上那套酒红色的毛呢喇嘛袍，质地优良，脖领至开襟处有一道黄色的滚边，围了一条软缎的黄色围巾，脚穿一双锦缎高统靴，手腕上戴块金表，还绕一串佛珠，还有他的新宫，这一切都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他幼年时预见不到的命运。主要的变化是以他为主席的西藏地方政府于七月十七日通过了“民主改革”，这意味着那一刻，作为废除农奴制的首脑，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将被载入史册。三个月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他好像比那会儿又长高了，自然也更稳重成熟了。

班禅与记者团的两名主席先生礼节性地互换了哈达。座谈长达三个小时，形式轻松、随意，涉及的话题各种各样，他边谈边喝酥油茶。谈到了佛教、叛乱、西藏的过去与未来。多数情况下，他的谈话无重点，充分而愉快地支配自我和谈话。

用了一些茶点后，他领着客人去观看专业骑术学员的比赛，这些学员都在一所专业学校受训。班禅是这所学校的赞助人。他向记者介绍了优秀的骑手。这些骑手在飞奔的马上，可以躲在马的一侧射击。记者们还观看了宗教和世俗歌舞表演。十个小时的采访参观后，班禅宴请他们，席上有班禅的父母，老两口五十开外，仍很健壮，他们的微笑似乎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外关于他们的谣传。

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的报纸以头版头条的消息刊登，班禅额尔德尼被软禁在布达拉宫，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原因是他父亲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说他父亲领导了反对北京的叛乱……华盛顿的阿兰给班禅及其笑盈盈的父亲拍了照，希望通过《伦敦工人报》的无线电报发一条独家新闻。在西藏完全通过行星的冷战波，进行无线图片传输，是难以置信的。

班禅当时说：“来自十二个国家的记者能够目睹和报导叛乱以来的西藏实情，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国外曾有过一些真实的报导，但也有歪曲事实的报导。我们希望你们真实地报导这里的事实并辟谣。我们在西藏正步入好日子。叛乱本是坏事，但现在反成为好事，阻挠西藏进步的叛乱分子这么一闹腾，正好给了人民消灭他们的机会。”

三个小时的座谈，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有历史上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佛教教派、宗喀巴在十四世纪（原文如此）的宗教改革以及今天的改革。

班禅说：“历史上的西藏自元朝以后，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日喀则一直忠实于这种统一。最近这次叛乱的真实目的是延续农奴制，如果这一目的被公布，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叛乱了。叛乱分子打着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旗号，蒙骗了部分人民，同时又以威胁手段逼迫另一部分人参加叛乱。参加叛乱的僧人违背了佛教教义。佛教教义不允许僧人动武，那些加入暗杀队的僧人不再是佛教徒，因为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杀害人民。”

班禅说，在日喀则没有发生过叛乱，因此也没有平息叛乱的运动，也没有召开过“控诉大会”。但是日喀则开展了以下运动，废除终身劳役和徭役制，减租减息，给耕种者分田地，中央政府出资赎买贵族和寺院的财产，这些方面日喀则都走在前面。

班禅表达了对佛教未来的希望，表示尊重所有教派。他说，神的教义处处在。佛教有“许多神”，你会觉得这些教义似乎相互矛盾，但只要弄通一处，其余各处便迎刃而解。教派纷繁，不同的教派尊崇不同的神。西藏主要有四大教派。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有时糟到引起武力争端的地步。

“然而，对释迦牟尼的信徒来说，和平是宗旨，它既指远离战争，也指制止人类苦难，这是及时，也是永恒的宗旨。”

班禅说，不需要改革佛教教义，但信仰者的修行要改革，

因为，现行的修行常遭邪恶之念的侵蚀。宗喀巴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改革者，如今需要新的改革。由于农奴制的罪恶，许多虚伪东西混入了宗教。人们要求改革，但不改对佛的信仰。“我们希望宗教将净化一切恶习，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会保护这种形式的宗教的。”

班禅额尔德尼就是这样期待的，期待未来能有一个纯净的佛教，并对西藏年轻人寄予厚望。在建设西藏今天的“天堂”中，他似乎将宗教的宗旨与政治合二为一了，或至少暂时合在一起。

* * *

农奴们在挣脱苦难，获得自由后，看到了这个“天堂”。他们对政府表达的第一个愿望，即希望快速增加食物，除此之外，就是希望接受教育，还有得到生活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了解具体的人间天堂及其可能性，我转向经济学家，询问他们第一次在拉萨搞实验农场的情形。

我问农场场长张楚天（Chang Chu Tien）：“在这个半饥饿的西藏，在这个世界的屋脊上，能建成什么样的天堂呢？就凭获得自由后焕发出来的新干劲，西藏高原能长出足够的粮食吗？能有好日子过吗？”

他回答：“能，而且比较快，在这个农场上，我们已经得到了证明。”

拉萨试验农场在拉萨城西几英里处，离哲蚌寺不远，坐落在一片修整好的河床上。张场长说：“噶厦不让我们用好的土地，达赖喇嘛一九五四年曾亲自向北京提出要建一个试验农场，我们本想开垦布达拉宫以西的那片宽阔土地，因为那儿是一个缓坡，土地肥沃，便于灌溉，毗邻公路，凡进拉萨的农民都能看得见，且从未开垦过。然而，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干涸河床上的一片草地，那里一半地都处于洪涝之中，另一半则是鹅卵石和沙子。光在这片地里填土就花了我们三万个工时和劳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试验农场观赏大圆白菜的收成

力。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挖沟、排涝、炸石、填压优质土。

“我们用汗水换来了成果。西藏的主要粮食作物是青稞、小麦、豌豆和黄豆。我们培植了各种粮食的优良品种，还增种了小米、玉米。西藏原来只有几种蔬菜，我们发展种植了四十二种，其中三十种在露天地里就长得很好，在温室里的十二种也长得很好。有的蔬菜在这里比在海拔低的地方长得好，如卷心菜、胡萝卜和土豆的个头儿都特别的大，这些菜并没因为大而有质的变化，味道极佳。亚麻、大麻和黄麻在西藏也长得很好。”

我随张场长在试验农场转了一下，见到一些个头儿特大的蔬菜，有一整片地，种满了卷心菜，许多直径达四十英寸，重五十磅，还见到一个重五十五磅的大南瓜。我边喝茶，边吃西红柿，个个西红柿都有一磅半重，而其结构并没有变且味道非常好。农场青稞平均亩产四十五薄土耳，试验田的亩产量达九

十薄土耳，这比西藏的平均亩产量高四至八倍。小麦的产量不稳定，一九五七年，农场亩产六十六薄土耳，但一九五八年，只产了三十八薄土耳。

张说，“用我们全部的努力和科学，在如此差的土地上都获得了好收成，如果广大农民都能恰当地耕作，就能获得更好的收成，因为他们拥有优质的土地，我们要让人们知道，即使在较差的土地上，也能找到优势，就不用说在农民较好的土地上了，因为我们清楚，我们能种的作物在乡村里会获得能好的成果。不过，对一个当老师的人来说，如被学生超过，未免感到有些丢面子。”

我问，“你们仍得不到布达拉宫旁边的那片地吗？现在噶厦已不复存在了。”

张答，“我们没再要过。解放军将在那里种庄稼，农民将观摩学习。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所以不可能马上遗弃它。以后我们可能在其他城区再建农场，目前我们的任务似乎就是在乡村，因为农民第一次邀请我们了。早几年他们都不敢跟我们说话，逐渐地他们开始胆怯地向我们索要种子。自从叛乱平息，这方面的要求突然大增，人们的情绪也有了变化。农民待我们亲如一家，向我们要他们需要的一切，如耕作知识、种子、农具。他们和我们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就连宗教方面的问题也来找我们，但我们拒绝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已经向两个县派出了技术人员，他们前往帮助建设更好的农场。一个县派了三名，现已在各县住了一段时间了。我本人有过切身的体会，我低估了这里的人民，我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觉悟会提高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提高了觉悟的他们会有这么高涨的求知欲。”

有些农民从电影上看到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民给地里施厚肥，用拖拉机耕地，就来打听西藏是不是也该这么做。张告诉他们，当然要多施肥，应该改善农具，但使用拖拉机还得等一段时间，因为没有通拉萨的铁路，从一千英里以外把拖拉机运

进藏，成本太高。

有些农民跑来打听，“你们能帮助防止雹灾吗？”

张说，他知道农民有一个做类似事情的寺庙。农民说，“哎，那是迷信。我们听说，有的地方人们朝天空打炮，那就可以防雹灾”。张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大炮还没被证明是成功的办法，人们还没有发现对付冰雹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抗霜冻，对付冰雹目前的办法，只有靠向国家保险业投保。农民对所有这些概念都感兴趣。

有一个地区白色蠕虫吃庄稼，人们马上求教于农场派去的代表，他知道西藏宗教忌讳的就是杀虫，既使遭遇虫害，也不得动杀机。所以，他回答：“我没法告诉你们怎么办，因为要保住庄稼就得消灭害虫，可这是违背你们宗教信仰的。”农民们自己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都指望一位年长者做出杀虫决定，以一种纯净的良心杀掉害虫。年长者说：“如果你们都杀，我也杀，不过我还是害怕。”

张又举了一个例子，人们会在西藏许多地方的道路上看到大堆的石头，这是一种习俗，朝圣者每走到这儿就扔一块石头，念一句祈祷词，渐渐地这儿就堆出大堆石头，这就是著名的嘛呢堆。过往者总要以规定的方向绕石堆一周以示崇拜。最近，在一次洪水暴发中，为了抗洪，农民们把嘛呢堆的石头拿去修筑排洪渠。拉萨工委听说后，马上给当地工作组发函询问。

“你们在干什么？反对宗教吗？”

工作组答：“你们不说，我们还不知道有这回事，是农民积极分子干的。”

工作组说：“经向当地积极分子调查，得知，此举绝对得到了全体农民的一致同意，我们不想让任何一个农民抱怨。”不过，常有一些缺乏经验的“积极分子”，可能有点“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而做事不慎。农场从未跟农民一起议论过达赖喇嘛，但一名农场职工无意中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一伙人说，

“达赖喇嘛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我们本该开他的批斗会的。”

张感到，现在任何特殊的迷信一旦与人们的需要——食物相抵触时，迷信就自然让位于需要。他说：“他们急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已经获得了自由，必将另辟蹊径，设法避开与好收成相抵的信仰。”

“这些旧观念并不会马上消亡。我们在好几个村子里都开办了农田技术培训班。今冬的首要任务是广积肥。西藏的大多数地区都以牲口粪便作燃料。只有等到新燃料得到开采后，人们才好在干牛粪和石油之间作选择。我们还敦促用铁犁深翻地，但我们不知道农民对此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因为旧信仰认为铁毁土。”

我跟张场长聊起了我所了解到的西藏粮食平均产量的数字，以及总收成和可耕土地的面积。

张告诉我，可耕地面积约为三百万亩或五十万英亩，粮食平均亩产为一百至一百二十斤，或十一至十二薄土耳其。总粮食产量为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七百薄土耳其，如果将青稞、小麦、豌豆和大豆磨成粉，粮食重量自然就减轻，我们这里所说的粮食产量是指未经加工的产量。差不多需要这个数量的四分之一作种子，剩下的四百五十万薄土耳其用作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的口粮，人均约二百二十五磅，也就是说，甚至腾不出一磅给鸡或猪的粮食，因此这是一个半饥饿的产量，这些与农民所说的都相符。农民从未得到过肉类和蔬菜的补充，西藏农区老百姓很少有菜吃，几乎没有肉吃，当然牧区例外，牧人吃得上肉，但几乎吃不上粮食。

我问：“西藏人要多久才能吃得饱？”

张说：“如果单说吃粮食，那用不了多久，不久人们就会有足够的粮食吃，但要加上肉和各种副食品，那花的时间就要长些。首先，迅猛增长的将是粮食产量。就说今年秋季吧，粮食产量普遍比去年高，虽是在农奴制下播的种，但耕作和收割是在自由制里进行的，人们除草施肥比以前多，所以产量很快

就上去了。明年会有更大的丰收。因为从今年冬季起，人们将深耕施肥，并且将首次用比较纯净的种子下地。在农奴制下，人们很少有纯净的粮种，因为所有收成都进了领主的仓库，农民能拿回作种子的是混合品，常掺满了草籽。

“用较简单的办法，较好的农具和种子，深翻地，多施肥，勤浇灌，这些都能成倍地增产，这对农民来说并不难，因为他们现在已获得自由，积极性很高。亩产三十薄土耳应该说是很快的事。不算种子，每亩地还将打下六百七十磅粮食，这将是西藏多少世纪以来粮食产量的三倍，西藏人民将会吃饱，这种产量甚至会有余粮，可以喂鸡喂猪了。”

我执意问：“达到亩产三十薄土耳，究竟有多快？五年内能实行吗？”

张回答：“有的农民今年秋季就可实现，我原来以为，西藏平均总产量需要整整五年时间才能达到三十薄土耳。”

张场长无法告诉我西藏有多少可开垦的荒地。我曾经去过好几个有关部门，但没有人能提供给我这方面的数字。他们说，“噶厦不让统计这方面的数字，我们正在收集相关的数据”。根据那些走过许多地方的人说，最佳的推测为，尽管开垦方法极端落后，但优质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可耕地有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但这种增长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力，需要排涝、灌溉以及其他开垦的方式。目前没有必要开垦很多荒地，力量首先应当用于增加粮食产量上，单这一项就会迅速提高西藏的粮食水平。张也赞同这一观点。

现在看来饥饿状况很快就会结束，但肉、奶、酥油的增长还需要时间。家畜的增长是缓慢的，没人真正知道牲口头数究竟有多少，估计有五百五十万至七百万头，这要算上牦牛、黄牛、马、绵羊、山羊的头数，猪不算在内。西藏产酥油，所有的寺院都奢侈地燃烧酥油，仅大昭寺一年就烧掉三十万磅酥油。贵族喝香醇的酥油茶，而农奴却很少看见酥油。

高原牧场的物产过去很少为农区人们享有，这主要是指牧

区的畜牧产品，这是西藏确立的一个长远发展目标。这方面的数据刚刚开始收集，工委宣传部部长方驰辛告诉我，从已调查的地区看，西藏的高山牧场好像是无边无际的，但草质差。牧区比农区更能受益于好的措施，人们需要优良的草籽，好的饲养方法和能挡风雪的牲畜厩。

他特别说到黑河地区，那有十七万一千平方公里的面积，被列为“牧场”，但实际上只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可放牧，每平方公里平均有一点四六头牦牛和二点八三只羊，当然非常稀疏。牧草不足，只有三四英寸高，养分也很低。内蒙古、青海和西康都有非常优良的牧草，这些都可以在西藏播种。牧畜无圈无栏，常被豹子或其他野兽吃掉，或被暴风雪所吞噬。一九五六年，一场突然的暴风雪袭击了黑河，一半牧畜冻饿而死。

方所提供的牧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这占西藏总面积的五分之四还多。其他人提供的这方面的数字要低一些，方可能把农区的牧场数也包括进去了。没有人知道精确的数字。但人们都知道西藏有上千万亩牧场，但却没人经营管理。放牧权掌握在不在那里的领主和寺院手里，他们占有牧畜的方式挺复杂。在繁重的封建税费压迫下，牧民没有机会发挥主动性。草原牧场上的改革要花更多的时间，这是因为牧场处于遥远的地方，还因为畜牧所有权极其复杂。但从西藏未来的繁荣看，合理发展草原牧场，将比在农区实行的改革行之有效。

西藏未来几年将用集体的力量管理草场，有了集体的力量，就能够利用飞机播种草场，人工授精法培育优良畜种。采取措施，使人畜免遭暴风雪的伤害，让牧民过上好日子。这些已在内蒙古和新疆的广阔地域上实现了，这也将会在西藏实现。一个任凭牲畜在暴风雪里死掉一半的社会制度在现代生活中绝没有出路。

兽皮、毛线和毛皮一直是西藏的主要出口产品，上层阶级靠在国外卖掉这些产品，换取外国的生活奢侈品。叛乱分子在

叛乱中宰杀了大量的牲畜。西藏人民希望将来能自己享用更多的毛线、皮革和毛皮。因为上述原因，在今后的五年里不打算增长出口量。从现在起往后的五年里，出售畜牧产品应当是西藏主要现金收入来源。任何大的发展都将取决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究竟哪些方面有大发展的机会呢？

先让我们转向工业和采矿业。西藏有十种手工业，其中包括纺织粗呢，当地叫氍毹呢，织地毯，硝皮，制革，制呢靴，打柜子，制银铁器。建筑材料有石头、石灰、砖和木材，不过，木材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手工业工人过去受压迫，常常沦为乞丐。生羊毛用牦牛驮到印度，加工成毛衣后再驮回来，这样的成品因双程运输而价格昂贵。今后手工业合作社将得到专业技术员的帮助，并将得到国家银行的贷款。有些工业将在现有的手工业基础上发展，但重工业要等待交通运输业的改善。

西藏矿物很多，外行人从那些彩色的崖壁就可以看出。噶厦不允许进行足够的地质勘探，不过我们也搞过一些调查。工委工业部向我作了比较保守的说明，显然，矿藏遍布，从地质岩层看，矿藏的年代并不久远，并不是所有矿藏都已达到可开采的储量，或处于可开采的矿脉上，所以首先需要做的是正确的勘探，其次是改善运输条件，就是说要修通开往拉萨的铁路。

西藏的水力资源极其丰富，但并不稳定，因为水源储量取决于融雪，但是，许多河川满足发电的水源是稳定的。西藏还有许多湖泊，处于海拔较低的地方的湖泊没有冰点。如果西藏人养成了吃鱼的习惯，破除有关的戒律，那么西藏吃鱼是不成问题的，这是一个还没必要提出的问题。

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它是任何生产发展的瓶颈。从中国其他省市长途拉运货物，这在西藏已延续了数百年，严重阻碍了西藏的发展。公元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带进藏的蚕茧和手工艺品，就是慢慢地拖进藏的。直到最近，西藏人常用的

茶叶价格才有所下降，比原来的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因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修通了三条汽车公路，茶叶降价的另一个原因，即以往获百分之百利润的农奴主阶级垮台了。拉萨国营贸易公司出售的茶叶是加了运费的，而降价的根本原因还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如今，汽车运输取代了牦牛的驮运。

无论怎样，用卡车运输也不便宜，要行驶一千三百英里的盘山公路，所需要的汽油也得卡车装运。运货的卡车返回时，很少或根本没有可运出的货物，所以基本是放空返回的。目前，从西宁运到拉萨的货物成本，每磅合四毛钱（相当于十六分），这里面没含放空费，这部分费用由北京补贴了。棉纺织品的运费常比其他货物的高。运送重型机械和矿石的费用高得无人问津，除非十分必要，一般都不运。其他矿物的开采只有等到运输条件得到改进时，才谈得上。

西宁至拉萨的铁路已在设计中，没有人猜得出这条铁路修通的时间……但人人都期望五年内能修通。据说，这条铁路差不多是沿着现在的青藏公路修的，全长一千三百英里，穿越唐古拉大山脉，这道山脉是亚洲一大高山屏障。这条铁路是否建成还取决于中国的钢铁生产，这一生产的增长虽不慢，但对钢铁需求的增长更快。

* * *

从这个快速的调查看，在“世界屋脊”建设天堂的计划已开始拟定，即将摒弃饥饿，不用开垦新的荒地，只需要增加粮食产量。如果需要开荒，也是办得到的，因为排灌耕种的劳动都是有偿的。蔬菜可以迅速增产，因为这只需要劳动力和菜籽。肉、酥油和奶产量的增长要慢得多。如果大昭寺能够用矿物油或电灯代替燃烧酥油，那么每年很快就有四分之一的酥油补充给每户人家，这可以让西藏人民多喝上几杯酥油茶。如果两千多个寺院全部停点酥油灯，便可以解决酥油配给的问题了。一旦宗教允许人们吃酥油、牛奶和畜肉，目前这种食物结

构匮乏状况就会得到改变，这类副产品就会稳步增长，五年后，人们就会吃到充足的酥油、牛奶和畜肉了。

人们的穿衣和住房也会得到发展，即使没有铁路，趋势也是如此，手工业合作社在国家少许资助下，将努力生产毛呢和皮革衣料，但棉纺织品仍将花费较高的运费从中国内地运来。人们将以古老的方式和多少有了改进的工具，采石、伐木、烧砖，建造房屋。人们的衣、食、住将通过各种办法得到发展，这样交通的障碍就阻挡不住人们生活的改善了。

然而，远大的繁荣首先依赖于畜牧业的发展，其次也许是靠采矿业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取决于认真严肃地改良牧草和改善饲养方法，还有加强地质勘探。所有这些的发展还是取决于交通运输业的改善，尤其是修通铁路。宗教使西藏人民丧失对采矿的兴趣，据说采矿是“骚扰土地”，这种偏见在今后五年中，将随各方面的发展逐步过渡，渐渐淡化。

西藏人的思想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天堂”重于衣食住行等物质财富。西藏人民终于感受到了自由！在从机场到拉萨的路上，从那些衣衫褴褛牧民的身上，我们感觉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快乐在觉醒，我们的这种感觉在后面的参观采访中不断再现：在罗布林卡游园会上出现了；我们被夹道欢迎时出现了；村民们十分好客时出现了；“控诉大会”的怒吼声中又出现了……

许多汉人现在和藏族人一起工作，正如张场长对我说的那样：“我们曾低估了这些人民。如今，他们是挣脱了农奴制桎梏，获得了自由的人们，他们的聪明才干在短短的时期内就显现出来。他们真的是非同寻常的人民。”

很清楚，西藏人口将大大增长，长期衰落的状况结束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屋脊上的主人，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将不断加强。在旧的迷信和现代生活的目标之中，他们将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具有编演戏剧和舞蹈的天赋，而且具有实用的逻辑思维，这一点是从布达拉宫上那伙清扫工议论达赖喇嘛金库一事

中得出的；这一点还从农民愉快地用嘛呢石抗洪排涝的正确行为中得出。

他们的土地绝不是一块容易生活的土地，能供给人们的是地球之巅的诱惑，坚硬但能丰产的结实土壤。获得了自由的人们无所畏惧，友好地对待外来的朋友。还记得那位扳着我下巴颏，问我年龄的老农吗？记得那六位彪悍的骑手吗？他们以殷勤的深鞠躬，向我献上六条哈达。他们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他们以神话和劳动，舞蹈和共同意识，还有上千年的文化精华丰富了世界。

* * *

九月九日，我们结束了西藏之行，乘飞机离开。访藏期间，林芝收割已经结束，山南已进入高潮，而拉萨的才刚刚开始。这次西藏之行，我们看了乡村、城市和寺院的民主改革。这段时间正逢农民觉醒时期，我们参加了他们的收割庆典，还有第一次土地分配的活动。我们离开后，这一切怎么样了，只有跟踪北京的有线新闻了。

十月初，一千多名技术人员抵达了拉萨，有地质学家、工程师、医生、护士。新农会为接待这些人员已做好了准备。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汇报，三十六万农奴，两万奴隶都已获得了解放，并分到了土地，打下了自己的粮食。粮食产量亩产已接近十四点五薄土耳，这比以往的平均产量高出百分之二十。他们正在“掌握基层领导权”，即建立农民的乡政府。他补充，“求知欲望与日俱增”。十天后班禅在另一次会议上谴责联合国“非法干涉内政”的言论，这是指联合国曾集会谴责中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该集会是在华盛顿鼓动召集的。

整个十月份，收割向海拔较高的北部转移。仍听得到对田间地头的报导，“收割场上充满了农民的歌声”。他们组成了互助组，互相帮助，合用牲口，进行耕种。庄稼一收完，马上开

始犁地，为下一次播种做准备。他们第一次分拣种子，拾粪积肥。试验农场出了一本关于西藏高原的耕作册子，把这本册子加上经过几年试验出来的良种一并送给乡村农民，这种粮种经过了三千零六十九次的改良试验。

十一月三十日，听到来自拉萨的消息，“所有遭叛乱分子破坏或在战斗中被毁坏的建筑物全部修复。布达拉宫以西新建了一排银灰色的平房。建筑材料，尤其是砖和石灰，已准备运往西藏的其他地区”。十一月的另一条新闻，拉萨老城的“灾害区”现已成为“幸福区”。以前的老城区有三座妓院，四家酒店，十二家赌场，一个鸦片馆，充斥着粗野的叫骂吵闹，一般人晚间都不敢经过这个区，如今这里成为幸福区，再也听不见嫖客赌鬼的叫骂声，取而代之的是清洁的街道，这条街的负责人是一位当过家奴的四十五岁的妇女。

十一月底，从各个仓库里找出了二十万把新农具，这些农具从一九五五年堆放至今。为购置这些农具，中央政府花费了一百五十万元，是送给西藏人民的礼物，但噶厦和贵族却把这些全部锁进了仓库。如今，这些农具重见天日，有步犁、耙子、锄头和羊毛剪。农民们用这些农具开始了冬季深翻土地的工作。十二月中旬我从报纸上读到了，“山南有了新步犁，拉萨和山南地区的大部分农田都犁过两遍”。

一九六〇年元月二十日拉萨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当天成立了新市政委，会议代表有一百多名，他们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基层人民组织选出的，其中包括农民、牧民、商人、喇嘛和上层爱国人士，代表了拉萨广大地区的十七万民众。拉萨由七个县、六个城区组成。

新市长崔科·顿珠次仁（Tsuiko Dongchu-tseren）在为大会致辞时说：“过去的九个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摆脱了多少世纪以来的阴影。在拉萨这一西藏农奴制的中心，民主改革的运动已基本完成。”

概述变化的成果时，市长说：“拉萨所属地区十二万农民

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耕种了七万英亩土地。高利贷这种世代相传、越滚越多的债务被取缔或大大降低，这平均为每户省下了一千五百磅粮食，够一户人家用好几年。五千名无业者已找到了工作，三百名无家可归的穷人已经住进了房屋。肮脏不平的街道已平整清扫了出来，整座城市干净卫生了。和平解放前，拉萨地区无一所公立学校，如今已有了一百五十所学校，七千名前农奴及其子女已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市长在结束语中说：“古老、贫困不堪的拉萨已经成为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

传召大法会，藏语叫默朗钦莫（Monlam），于三月初将至，接着将迎来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为期三周。头一年的这一节日被用来骚乱了，当时来自全西藏的朝圣者涌向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外出，发起反汉人的示威游行。一九六〇年的这个默朗钦摩在新生活中拉开了壮丽的帷幕，大昭寺的祈祷者点燃了酥油灯，换上了许多新的丝绸经幡。三大寺的活佛参加了这一庆典。班禅额尔德尼在这一庆典上讲了话：“过去的一年，我们目睹了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奴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如同异端邪说，因为它违背了“卡玛”因缘说，然而，不必担心，班禅了解自己的佛教，对此他已研究多年。

这番话是不是异端邪说，后来的消息对其作出了说明。二月底的数据显示，农村六十一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这占五十七个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这些县的改革得到了有力的推行。（西藏共有七十八个县，除去已改革的五十七个县，还剩二十一个县，这些县都分布在牧区，牧区的改革将于明年开始。）拉萨、山南、昌都、日喀则和林芝这五个地区共建立起一千零八十多个农会，乡一级的政府成员正在选举中。一九五九年的收割播种于农奴制时期，收获于解放期，产量比以往高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而一九六〇年的产量还将增长，因为土地已掌握在耕种者的手里，人们是在解放后耕作的，各处

都掀起了夺丰收的运动。

* * *

红旗飘，锣鼓响，拉萨地区翻身农奴的互助组成员于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出门下地，开始了自己田里的第一个春播。土地、牲畜和农具终于归他们自己所有了，收成也将是他们的。

拉萨西郊的东风互助组的组员没等太阳升起，没见到高耸布达拉宫金顶上的亮光，就出门下地了。他们为开耕举行了一个神圣的民族仪式，在地头插上旗子，点燃松枝，这似焚香一般的气味使黎明的空气更清新，三头公牛的犄角系上了红绸子和白哈达。互助组组长格桑（Gaisang）向一头公牛敬上一杯青稞酒，他身后的女孩央宗（Yangdron）用染了色的一束麦穗向三位耕农祝福，这一束上了色的麦穗预示丰收。

组长下地破土，宗教仪式从这儿起突然与过去分开了，土地是用取代了古老的木棍的三把新铁犁破开的。一个耕农用一把铁锹一小时所翻的地要比四十个男子用木犁一天翻的地还多。三个妇女紧跟犁地者身后，撒下种子，填土，施肥和浇水。在他们后面有十个人，他们将撒了种子的地分成整齐的小块，以便浇灌。拉萨城西的东风互助组定下的亩产目标是六十六薄土耳，这个数字与试验农场的产量相同。

拉萨城区的前农奴就是这样在第二年里继续建设天堂的。

编 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了。但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她的有关中华民族求生存、谋自由、决死战斗的报导，尤其像《伟大的道路》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一九五九年，已经七十三岁的她，再次以“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一位伟大年史编撰者”，出现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通过诸多实例，真实地记录了西藏民主改革运动，并以其超乎常人的判断力准确地揭示了那一历史时刻的变迁，西藏和西藏人民所做出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人民自己的天堂。

一九五九年至今，历史又演进了五十年，西藏的发展和成就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九五九年，包括一九六五年爱泼斯坦先生在前言里关于西藏人口、工农业生产等等数字的统计，在今天，只是一个比照数字。至于有关街景、人们生活场景的描述，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作者在书末提到的青藏铁路终于在二〇〇六年竣工通行。但作为历史的记录，它们将永远不失其珍贵的资料价值，这也是我们继该书汉译本出版十余年来，重新修订编辑出版此书的初衷。

还要说明的是，书中一些与历史事件略有出入的文字，编审中尽量加了编注。个别遗漏的请读者明鉴。本书的第八章，同时涉及爱泼斯坦前言中的有关文字在编辑过程中，因故删去。篇目的安排也因此自第七章后顺序提前。

在此，特别要感谢的是汉文版序言的作者卢小飞女士。她

在撰写序言审读书稿时，对书中涉及的一些人名作了改正，因为这些人曾经她采访，或是她的同行，她的宝贵的西藏经历、记者经验为本书添彩不少。承蒙她提供线索，我们特别以附录的形式，刊出原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党组书记马宁轩《在驱散乌云见太阳的日子里》一文。

二〇〇九年初

附录：

陪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记*

马宁轩

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引起了民主改革的提前。那时，正值当年民歌所唱的“驱散乌云见太阳”的时日。但是，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引起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大合唱”。他们极力反对平叛、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到底该不该平叛，该不该实行民主改革，只能用事实说话。按照新华社西藏分社领导的安排，当时只有十九岁的我，有幸参加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待以国际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首的十一国通讯社、报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访藏记者和作家的的工作，使我得到了一次认识西藏和学习新闻业务的好机会。

当年八月十二日清晨，四架苏制安尔飞机载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伦敦工人日报》的阿兰·温宁顿等十一国十九名记者从青海省西宁市起飞，中午抵达当雄机场，完成斯特朗所称“照顾十分周到”的“豪华型”拉萨飞行航程后，又乘十三辆小汽车，经过一路颠簸，傍晚到达了布达拉宫对面楼高

* 摘自马宁轩《在驱散乌云见太阳的日子里》一文。

两层、院中鲜花盛开的交际处宾馆。

在这里等了很久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宾馆服务员立即上前，抢拎他们的提包，说着刚学会不久的“WELCOME TO TIBET”迎接他们。天色虽已微暗，但我一下认出了早已仰慕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已七十三岁，头发全白，拄着拐杖，略显疲惫，但精神矍铄，脸上露出顺利抵达的喜悦，目光中深藏着追求新闻的执著。当时，我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敬，尽管她是古稀之年的老太太，但以无畏的精神和事业心登上地球的“第三极”，也许她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上唯一一位进藏的高龄女记者。

尽管我在北京学校里学过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课本中涉及西藏的章节，自己更是生在斯，长在斯，在脑海中对西藏从小有着直观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但真正与西藏上下接触，较全面地了解西藏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还是从接待这批外国记者开始的。

斯特朗和外国记者们先后在西藏工委的接待室里采访了张经武书记，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楼里拜访了当时筹委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日喀则正在新建的班禅新宫前的草坪上搭起的豪华帐篷里拜访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拉萨采访了新成立不久的南城区居委会和居民，蔡公堂乡的农协会和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农奴、奴隶；在山南泽当，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了在西藏最早开始实行土改插牌的一户户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土地主人的农奴。除到拉萨的第二天，要求外国记者们休息外，整个采访活动一个接一个，算得上东奔西跑、翻山越岭、紧张繁忙。斯特朗老太太拄着拐杖，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但她没有间断过一天采访。就是在采访的休息时间里，也随时蹒跚地走到院里，仰望巍峨的布达拉宫，用眼采访，看平叛的炮火是否毁了建筑物。她看到达赖喇嘛的寝宫、佛事殿等布宫所有建筑物完好无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真不愧是国际著名记者，正如大家所知，一九四七年，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与斯特朗进行了著名的谈话。毛主席论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论断在当今世界上可能多数政治家

都知晓。我通过这么一位资深记者在西藏采访活动的直接观察，了解到她的业务才华。她的采访针对性很强，她的采访十分深入，她的采访寻真求是。当时国际上的反华论调集中起来无非就是“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平息叛乱是“侵略”、是“毁灭藏族”等等。而从斯特朗对西藏权威人士或是对典型人物，以及对平民百姓采访时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来看，其目的正是想客观地回答“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谁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为什么要撕毁？”“平叛该不该？”“对于百万农奴来说，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好不好？”这些提问，是当时世界舆论一些十分关注的问题。关于“西藏是否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特朗无论采访阿沛·阿旺晋美，还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都一致谈了如下见解：历史上，吐蕃与唐朝的关系从公元六四一年算起，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那以后吐蕃一直向唐朝进贡。修建大昭寺的一个世纪后，西藏的另一个王子与唐朝的另一个公主联姻了。之后，唐朝皇帝唐穆宗于公元八二一年，在拉萨大昭寺前立了“甥舅会盟碑”。“大约在一二五〇年，也就是在离现在的七〇〇年前，忽必烈汗将西藏纳入中国行政版图”。还有忽必烈汗封西藏高僧八思巴为“西域佛土法王”。第一位清朝皇帝赐予五世达赖喇嘛“达赖”的头衔和世俗权力。班禅·额尔德尼的头衔及其世俗权力是第二位清朝皇帝赐予的。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仪式也都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六年，西藏地方政府还派代表出席了分别在重庆和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代表大会。

至于谁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班禅、阿沛的回答是：中央认真履行了协议内容，进藏执行协议的中央代表、人民解放军官兵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忠心爱戴。而噶厦六个噶伦中有四个噶伦采取两面手法没有执行协议。发动三月武装叛乱就是彻底撕毁协议的表现。其原因一是要搞“西藏独立”，二是要维护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斯特朗问：为什么要平叛？张经武等人的回答是：“为了制止民族分裂，为了维护祖国统一，

为了结束千百年来农奴主对农奴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为了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和西藏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

为了了解农奴制度，斯特朗深入到田间地头农舍，采访农民。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极度落后，农奴的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数字观念淡薄，全凭记忆，采访中需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核对农奴所承受的乌拉差役、苛捐杂税、高利贷和还不完的子孙债的剥削情况。斯特朗在拉萨东郊由原来的蔡庄园和公堂庄园组成的蔡公堂采访农奴协会和农户，整整用了一天，算了一天的账，有时一个数字反复核对四五次，直到没有问题为止。她的耐心细致，很快弄清了差巴、堆穷、朗生等不同类型农奴的社会地位和所受不同压迫剥削的情况。参加叛乱的公堂庄园主、西藏的大农奴主之一晋美家族，仅在这里就拥有八十五户堆穷和朗生，他们耕种着两千五百藏克（一藏克约一亩）土地，当秋后有了收成时，由于要交地租、借贷的口粮、高利贷等，使百分之七十的收成进了晋美家的粮库。农奴除了为庄园主支劳役外，还要给地方政府支差役，甚至遭受意想不到的苦难。斯特朗和她的英语翻译与我在乡农会副主席、过去的差巴德吉家采访时，听了她和丈夫彭措次仁的苦难史，尤其是彭措次仁被庄园管家指控偷了领主女儿漂亮的马鞍而先后被关进庄园的地牢和布宫脚下的蝎子洞，惨遭皮肉之苦的故事。斯特朗还走访了过去的堆穷和朗生，对农奴制度的基层组织形成和阶级关系进行了解剖。

对农奴制庄园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后，斯特朗又用一整天的时间采访了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了解了该寺院内部组织结构、阶级关系、财产占有、对领地内农奴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寺院设监狱、实行刑罚等情况和触目惊心的寺院上层的罪行展览，使她又深入了解了寺院作为三大领主之一的真实面貌。斯特朗在无力爬上布达拉宫高而陡直的阶梯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硬要上布宫采访，这种敬业精神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来月的采访时间

里，对西藏延续了几百年的庄园、领地、农奴、农奴主代理人、贵族、寺院、地方政府至达赖喇嘛的金字塔式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有了颇深的了解，她还在与农奴、奴隶们的促膝谈心中，了解了他们获得的新生，从而用客观鲜明的新旧对比，写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这本目击记。